患難餘生記

彭真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患難餘生記

韜奮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患难余生记

韬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一六六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一九八〇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一一〇〇二·五〇一
定价：一元三角

出版说明

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一八九五——一九四四），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真理，走向革命，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经过革命实践，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了共产主义真理。

一九四四年韬奋同志逝世时，毛主席为延安各界追悼韬奋同志大会作了光辉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一九四九年，为纪念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周总理作了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正是由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韬奋同志把一生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十分恶劣的政治环境中，顽强地战斗，始终坚持革命的立场，至死不变。他和他所创办的进步文化事业，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摧残。敌人屡次以杀头来威胁他，他就以多次的颠沛困苦的流亡生活来作答复。『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绝无妥协的余地，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高贵的品质。

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疯狂迫害爱国民主力量，迫使韬奋同志于一九四一年秘密离渝赴港，复刊《大众生活》，继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一九四二年韬奋同志回到内地，国民党密令通缉就地格杀，在这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韬奋同志不得不秘密地从广

二

东辗转长沙、武汉、上海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在苏北解放区亲眼看到我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更加强了对革命的信心。一九四三年，韬奋同志由于身患癌症，病势转剧，只得离开苏北解放区秘密转移到上海治疗。在一年多的病痛折磨中，韬奋同志仍然战斗不息，顽强地写作。他热情地说：『我虽在重病中，也还一定要写，要把我这次看到的这么许多好的东西都写出来。把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千万读者。让他们看到那里是我们新中国的希望』。他还说：『等我病好了，一定到延安去。我要用这支笔再好好为人民工作几十年。』可是，病魔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最后一部遗著《患难余生记》竟没有来得及写完。

解放以后，为了永久地纪念韬奋同志，经周总理的批准，于一九五六年在上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一九六五年，反革命分子张春桥利用职权，强令停止开放韬奋纪念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妄图否定周总理领导下的国统区的革命文化工作，对韬奋同志和他所主持的生活书店（以及后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进行了种种的诬陷，残酷迫害同韬奋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同志。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馆得恢复工作。为了纪念韬奋同志，我馆特从馆藏文物中，把仅存的韬奋同志的一部手稿《患难余生记》予以影印，使广大群众可以看到这个珍贵的真迹。今后，我馆和三联书店将陆续编刊韬奋同志的著作和有关图书，以介绍韬奋同志的斗争史迹。

上海韬奋纪念馆　一九七八年六月

第一章 流亡

這本書是在流亡的痛苦中寫的，所以我首先想略談流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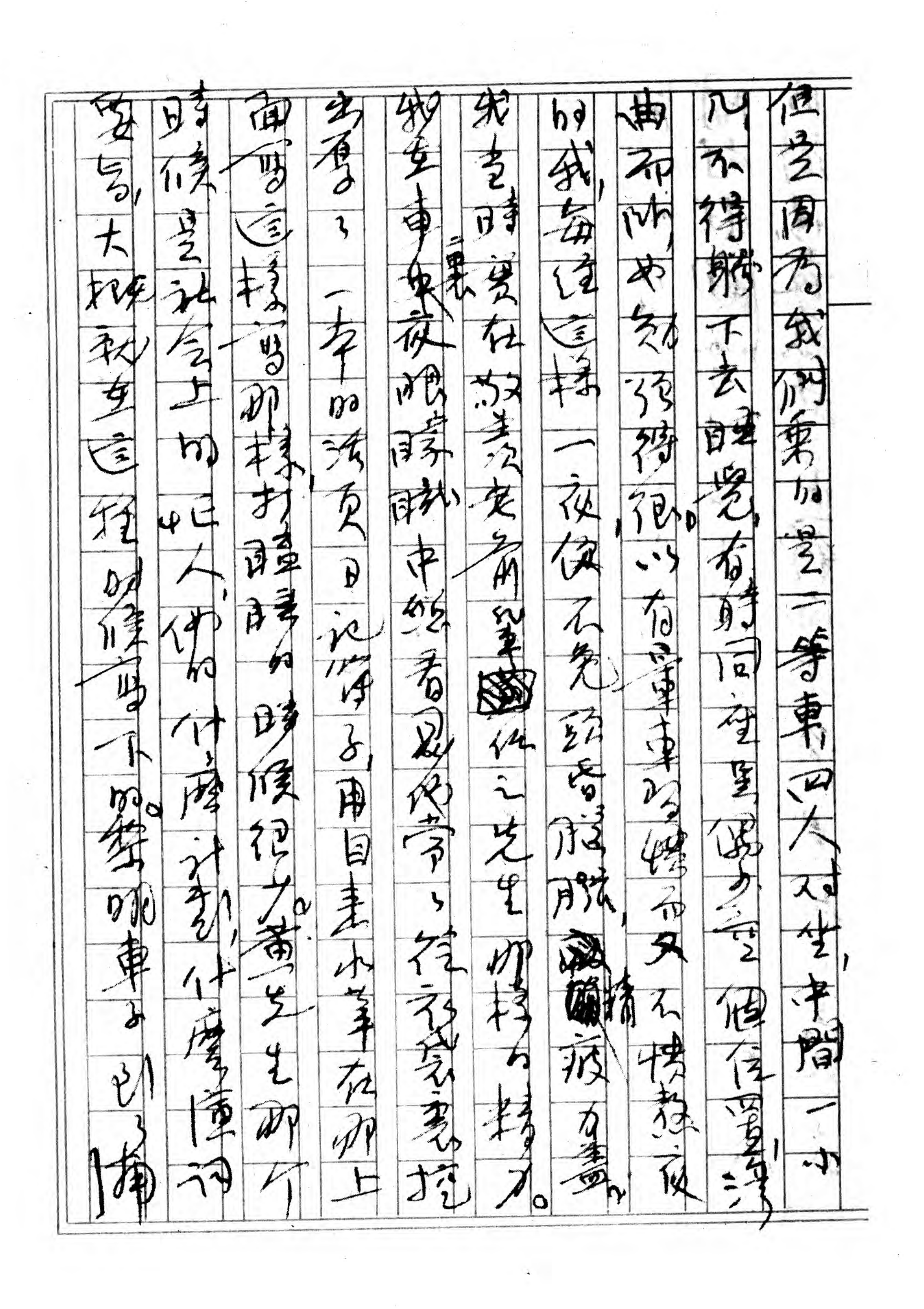
我這個人就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很富於流動性似的，好像是很動似的。第一次流亡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從上海被迫出發，由大西洋流動出去，一九三五年由太平洋流動回來，算是地球上剛繞了一周，流動了這麼大的一個大圈子。隨後十年來，除和我在救國會的同志在蘇州嘗些鐵窗風味不能算流亡外，有第二次流亡，第三次流亡，第四次流亡，第五次流亡，第六次流亡，好像我樂此不疲似的，

流亡包含流動，在實際上我很怕流動。

我怕流動，倒不是因為我嫩惰。

第一因為我的職務關係，我差不多出了學校就踏上編輯之路，編輯刊物的出版是有定期的，而在中國這樣的觀光環境裏，真正認真辦事的機關衙門事多人浮，不易盡職守。我雖怕流動，在職務上需要流動的時候，也只得流動了。例如初期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担任職業指導股主任的時候，時該社主任即黃任之先生，主任之下分股辦事，我不久即改任編輯股主任，主持教育與職業月刊，職業教

前家書，後來東方雜誌生活週刊就為着職業指導運動，偕同楊衛玉先生（當時任該社副主任）跑了十來省的路，不過比較都是短程，而且是交通便利的區域。第二因為我有暈船暈車的毛病。這種毛病到不算很利害，但有時卻也夠麻煩。在中華職業教育社任事時，有時因該社在南京開年會，有時應（當時）東南大學的暑期學校每設有職業教育組，請擔教社同人任講師，我臨時由火車[illegible]任之先生於晚間趕往南京。當時由上海往南京乘夜車是最經濟的辦法，夜車於十一點鐘開車，第二日晨六七點鐘到



但是因為我們乘的是一等車，四人對坐，中間一小几，不得躺下去睡覺，有時同室雖空出個位置，但位置清曲，而所以也就彎得很。以前單車的時候，而又不甚熱，夜的我每經這樣一夜後，不免頭昏腦脹，精疲力盡，我這時覺得欽羨定前紀念仙之先生那樣的精力。我在車裏，夜裏眼睛睜著，中然看見他常常從衣袋裡掏出厚厚一本的活頁日記簿子，用自來水筆在那上面寫這樣那樣，打瞌睡的時候，很有黃先生那個時候是社會上的紅人，他的什麼計劃，什麼演詞發表，大概就在這種的條件下，那些車子上引了補

様，我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随他下車，好像生病初愈似的，但是他老先生却精神抖擻，步履如飛，總走在我的前面。依理我這後輩應該照顧他老，但是無論路上卸下，因以前當過軍，軍械都是由他老一手包辦，所以只要說了之後我安然坐上車，跟隨他進城。

其實就中國一般情形說來，交通不便，許多人鬧，也是使人怕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中國有句老話，說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朝難」。既有些洋氣十足的朋友每每破口就罵中國人不知道旅行的益處，不能像外國人那樣喜歡旅行，增廣見聞，增加

知識，甚至認為這也是中國人的一種劣根性，什麼「民族性」使他們根本就沒有認識中國人所處的是什麼環境。我在國外走了一遭之後，才覺得這種責備是含有莫白之冤。以我這樣怕動的人，在國外的時候卻也善動，動的是環境給與我的動的種種條件。

我在國內很怕流動，但是有職業上所需要時卻也不能避免，甚至有不得已卻不得不流亡，那更會有比較重要的意義和尋常職務上所需要的流動不能相提並論了。請讀我第一次流亡。

* * * * *

第一次流亡，一方面是由於生活困難的力量突然猛進；一方面是由於參加蔡孑民先生和孫夫人所倡導的民權保障同盟。

關於生活困難的始末詳情，我在經歷及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兩書中都曾述及，在這裡不想多談。單說起來，生活週刊最初是由中華職業教育社所創立，旨在宣揚職業教育和職業修養。後來由於時代的需要和內容的進步，漸漸推廣到討論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對於民族解放

的倡導及反抗主義的一般攻擊，才不遺餘力。基於前列兩者所說的宗旨，有獨立經營的必要。可感謝的是中華日報社諸先生慨然允許其獨立，由先後周刊社全體同人組織合作社，獨立經營，務求成為自由文化一支獨自的生力軍的先後書店，即將脫胎於此。

當時先後周刊風行海內外，銷路日大，不僅在交通比較便利的城市可以隨處見到，即在偏村僻壤及遠在異域的華僑所在地，也隨處可以見到。更為有趣的是不但很多學家作了熱心讀者自動介紹

所而且討厭還有傳代的父親歸天氣了，還要接下去！

當時的生活是在這樣蓬勃的局勢之下，在實際上每期銷數也不過十五萬份，但其數字在外部卻用出版業者的一切清洲手腕，但在中國婦女傳記舊人有女作家蘇雪林女士把這件事實向胡適之先生揭發，胡先生不信這樣出版界卻是說：生活每期不過二萬份而已，是為無足輕重。視其一書事實，勝於雄辯，不值得事實在當時因以爲此年來重一部分愛載無以補為情

讀者投書」的信任起見，我們曾將鄧向審詢及數度
收據影印出證明。從這個判斷了，八年當時的
政府如與胡適之先生有着同樣的意見，它的生命
也許還可以發展，不幸生活部被他們重視起來，
尤其是蔣先生，在生活前六年的時候，作亂下去
論林出版部。
本誌十一上海一銷售只是佔全部一小部份，
最大部分是要由郵局寄往外埠的，所以禁止郵
遞，無異是到扼殺該刊上一種嚴重的打擊。怎麼好
呢？查當時生活日報對於政府只有在政策上批評的

態度，並沒有反政府的態度，所以首先經解釋說會下手，由國民黨的童國元先生來關心，安定事業的蔣經國先生兩次致電蔣先生解釋，蔣先生兩次回電拒絕，堅定要禁止郵遞，蔣先生並非常和我們表同情，也無可如何。我們還在無辦法之中想出辦法，之先生認識蔣廷黻，由先生（雷震）乘他往見蔣先生之便，托他代為疏通。蔣先生拿出一疊今年合訂起來的自由中國刊，那上面把批評政府的地方都用紅筆劃了出來，他認為批評政府就是反對政府，所以絕對沒有商量之餘地。這樣看來，郵遞這條

路是要斷絕了；郵運斷絕，什物也就不能寄給正緣了；

但是一方面由於讀者羣眾因情而相協力量的偉大，一方面由於這時所謂特務工作還不及現今的猖獗，尤其是對於文化事業；郵局等還沒有了無理的禁止，但是交通機關如鐵路輪船、民航等等地方，隨處都有許多同情熱心協助的讀者朋友，一大捆一大包地運輸去賣，銷路不但不因此減低，反而從前增加起來，並且延長了兩年的生命，直至我出國之後若干時候才被封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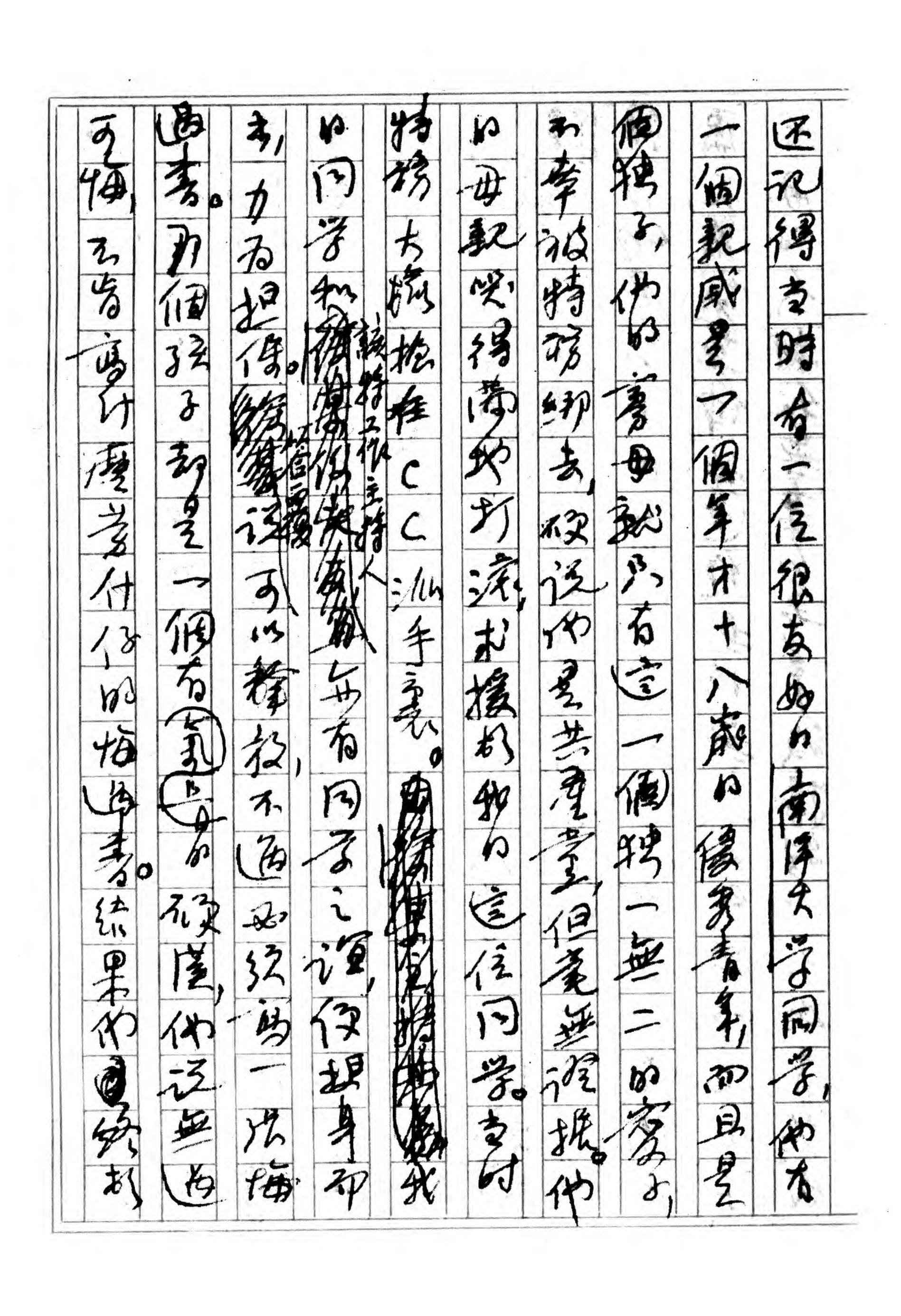
封閉之後，摯友杜重遠先生接着又辦新生週刊
且說生活週刊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維持着它
的英勇公正前進的態度，但是在當時白印就在團
結抗戰民族運動抗戰的前線，念茲在茲要與書達的
嫉視，無寧說是意中事。
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當時時代的進步運動
是不能脫節的。但是由於環境的壓迫之的艱危的
程度也往往隨着增加。
火上添油，如上所說，我一面又參加了孫
國先生和孫夫人所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

＊　＊　＊　＊　＊

提起那時的民權保障同盟，也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一種枝流初步運動。民主政治不能離開民權，說到民權，除了選舉權罷免權等等，為中山先生所謂四權之外，最主要的大家都知道而且常常聽到的是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和生命的自由權，而人民生命的自由權，尤為基本的基本，因為生命的自由權如果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什麼都無從說起。因此，各國憲法對此都有明確的規定。即就中國說，僅有的基本法為臨時約法，以

以及刑法捕人罪人均須經過法律的手續，即由公安或其它機關拘捕，也均須於二十四時以內送交法院依法處理。此外為公開審判，律師依法辯護等，都是防備違法殘害人民生命的又一些手續，在法律上也都有明文規定的。

但是在蔡孑民先生和孫夫人等發起民權保障同盟的時候，所謂特務已經橫行，他們避開法律，用綁票方法秘密捕人，酷刑逼供，摧殘無人道，隨意處死，有冤莫伸。在這種無法無天的黑暗情況之下，有用的人材和無辜的青年被犧牲的不知多少，我



还記得當時有一位很友好的南洋大學同學，他有一個親戚是一個年才十八歲的優秀青年，而且是個獨子，他的寡母就只有這一個獨一無二的孩子，不幸被特務綁去，硬說他是共產黨，但並無證據，他的母親哭得傷心地打滚，求援於我的這位同學。當時特務大隊總隊長CC派手下。我的同學和該特工主持人並無同學之誼，便想身部去，力為担保。說可以釋放，不過必須寫一張悔過書。那個孩子却是一個有氣節的硬漢，他說無過可悔，不肯寫什麼什麼的悔過書。結果他竟然被

不明不白地被槍決了，他們的母親還呼天搶地，哭得死去活來，你們想想，我的這位同學還是一位和平中正的好好先生也氣得切齒痛恨，怒髮衝冠，但你們何想想：這只是我所親自看見聽見的一個小小例子。類此例子，比這例子更悽慘萬倍的，更不知有幾千幾萬，真不可勝數！

民權保障同盟便在這種情況之下產生。特務的這些橫行，草菅人命，用綁票的方法，用私刑的拷打，都是在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半進行的，後來在內地發生「失蹤」的新鮮名詞，是的，這種名詞還未

寫声明）民权保障同盟就是要揭露这类黑暗的违法行为，依法加以援救。

蔡孑民先生负党国重望，对国家民族贡献甚巨，于培植的优秀青年及人材，尤不遗余力，扶持青年人，向来主持正义，国际闻名。由他们两位出任正副会长，该同盟的力量更为增加，在国际宣传上也更为有力。当时中国特务要在上海租界捕人，不得不向该巡捕房会同，英美的政治虽也不见得怎样高明，但对于法治二字总比亚洲的特务重视一些，所以他们的黑暗行为和事实经民权保障同盟揭露之后，

對於他們多少也要增加些麻煩。此外該同盟也時常根據事實，直接向有關當局交涉。尋常老百姓向他們哀求保障，他們可以厚着臉皮回答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人，你又將他們奈何；可是由黨國元老主持的該同盟，把握事實提出交涉，卻不能像對尋常老百姓那樣易對付了。

這種情形在當時國家當局方面，有一部分人當然滿不高興。他們雖然膽大妄為，但對於黨國元老如蔡孫，究竟不敢下毒手，於是決定先從該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先生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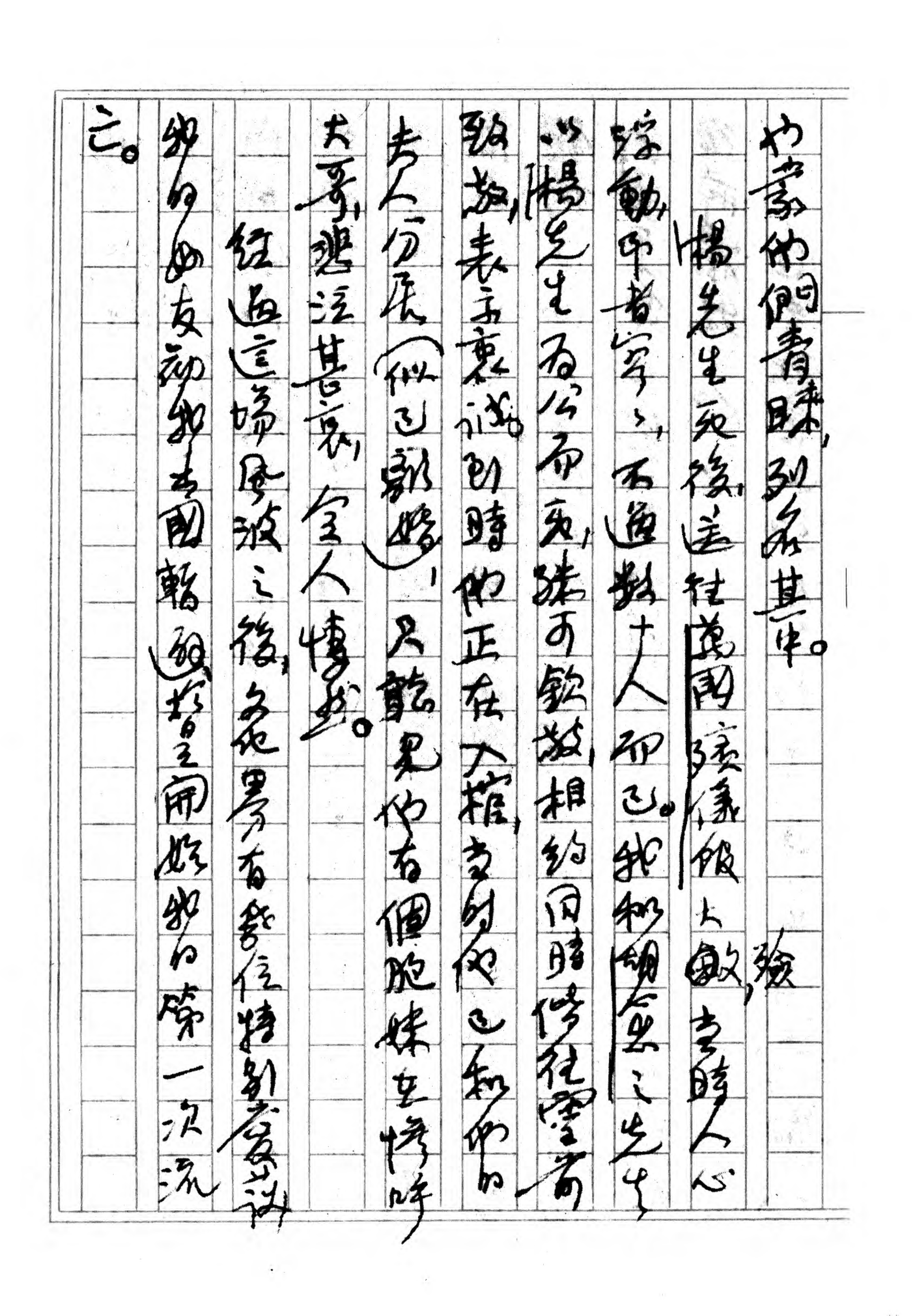
當時民權保障同盟總會在上海，開會時總是和上海分會所聯席會議。每次參加者有蔡先生、孫夫人和我的英文秘書史沫特萊女士，還有林語堂、楊杏佛、胡愈之諸先生，我也忝陪末座。每次開會總是由蔡先生主席。因為有西人參加，還有一位是西報記者，忘其名，因中文欠佳，每由林先生當場翻譯英文，詳細紀錄者。開會時最有趣的是魯迅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吸紙煙。他們兩位吸紙煙都用不着火柴，一根剛完，即有一根接上，繼續不斷地接下去。

楊杏佛先生是總幹事，決議案的執行大半由他負

重在他，他又很熱心幹事，所以會勝任的進行組織搞出。平日私人行為也許不盡滿人意，但是他為保障民權為保障民權運動而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從這一點說，他的死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他在事前所得到的警告，隨着事後發生。他有一天剛和他的十一歲的兒子小佛上汽車，暗殺他的鎗彈四面飛來，他用全身包圍着他的兒子以衛護他，結果他的兒子幸得保全生命，而他自己卻被亂彈所犧牲了。

隨着謠言四起，有各種黑暗的傳說，謝人


也家他們青睞，列名其中。
楊先生死後，送往萬國殯儀館大殮，當時人心浮動，弔者寥寥，不過數十人而已。我們曉得楊先生以楊先生為公而死，殊可欽敬，相約同時偕往瞻前致敬，表示哀誠。到時他正在入殮，當時他已和他的夫人分居（似已離婚），只能見他有個胞妹在慘呼大哥，悲泣甚哀，令人慘然。
經過這場風波之後，各地曾有幾位特別愛護我的好友劉我書國輔（致遠）指出前次我的第一次流亡。

出国不是一句空话所办得到，必须有相当的经费。幸而有几位好友在国内拍胸膛，先筹集三千元，叫我弟弟先走，随后他们再设法接济。我在国外仅就视察所及，多写一些书，以作报偿。

第一次流亡是我历次流亡之中最安适的一次，因为中国人往欧美旅行或视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都必须勉强摆着相当的场面，例如乘轮船至少要乘二等舱，要到上岸时便要费些许多麻烦，往往甚至要居在什么岛上的拘留所里，好像锒铛入狱一样！在各国视察所花，各项费去，

是否也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由於環境的相當部

份，又因為比較便利於我的機會，尤其是[illegible]得的相當[illegible]

這都是（當）人（所）想而不勝其依戀的。但是我在

當時如被逼迫出關，不得已也不會有出國之行。

關於第一次流亡中初步及研究所得，我曾經

有薛琪瑛譯第一集（倫敦在出版英國）第二集

（倫敦在出版德國）；及第三集（全部出版蘇聯

此外還有薛琪瑛譯，全部出版美國，回國後在

蘇聯看守所中完成的。這些本書是我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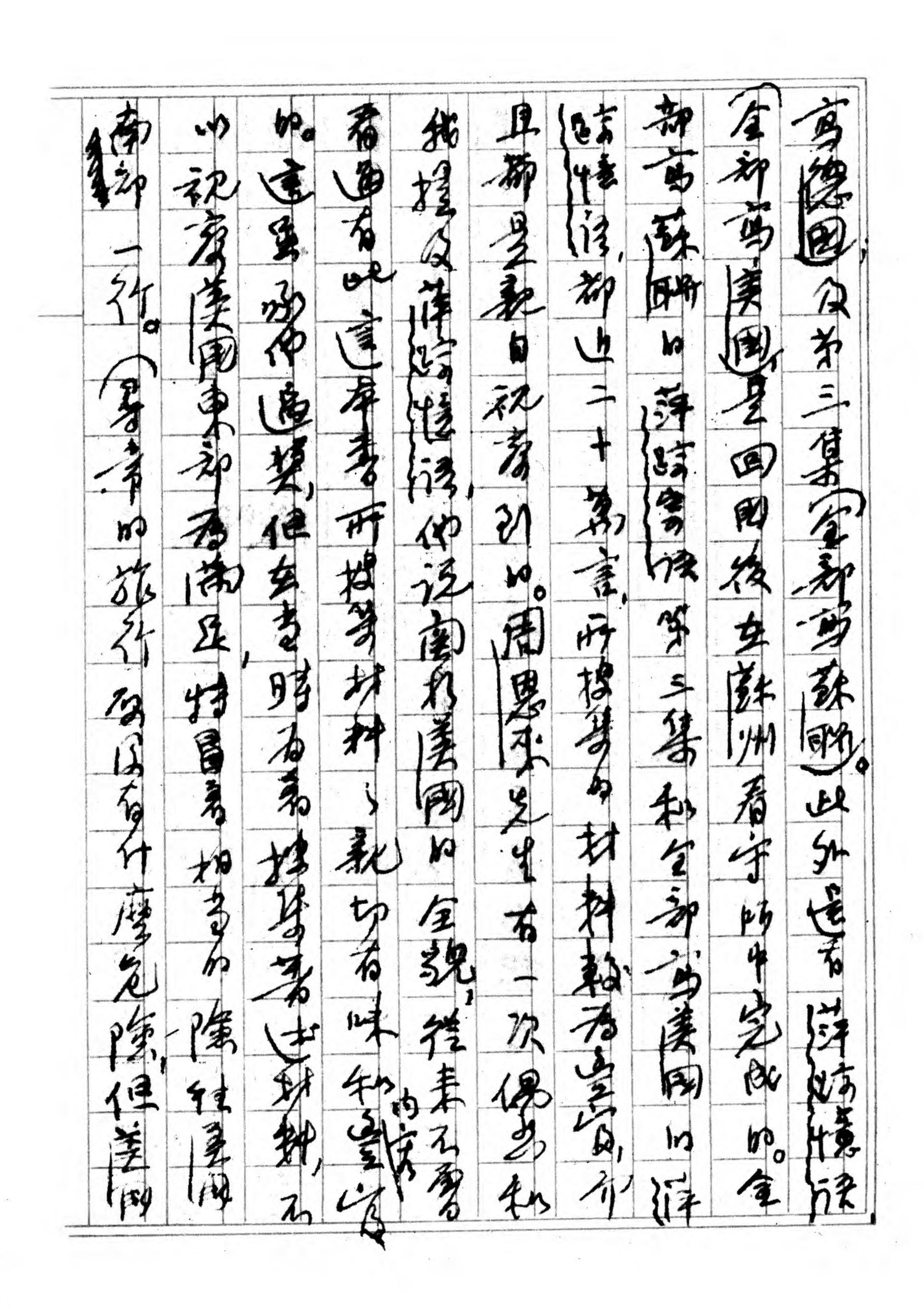
二次流亡時對於護者諸友要出載出而勝來[illegible]

在這[illegible]不同想[illegible]

附帶說一件小事使我感到大有趣味。於一九三三年來美國，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旅行於美國西北部達科他州 Dakota，在那裏經過一個小城市，看到本地當天一份日報上的社論題目，赫然為中國民族保障的良好模範，內容說明民族在一個共和國裏的重要性外，即十分讚揚中國有個民族保障同盟，說中國允許有這樣一個機構產生並允許其活動，真不愧為中華民國，擁有像這等向上為共和先進國的美利堅合眾國大感其慚愧，極力

建議应该以中華民国的民权保障同盟为民权模範，也来组织一個民权保障同盟。我看完了这篇社論，一面为中国幸幸，因为得到那样的讚揚，同时却又笑不可仰，深深觉得惭愧，因为能知道在中国的民权是在遭受着怎样的摧残！该报的主笔先生大概只能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历史的前半段；倘若他知道了後半段的历史，也许要感慨系之，不再那样捧场了。

关於第一次流亡中视察及研究所得，我曾经著有萍踪寄语第一集（偏重在写英国）；第二集（偏重



寫德國，及第三集（全部寫蘇聯）。此外還有〈洋琪情談〉（全部寫美國）是回國後在歐洲看守所中完成的。全部寫蘇聯的〈洋琪密談〉第三集和全部寫美國的〈洋琪情話〉，都近二十萬言，所搜集的材料較為豐富，而且都是親自視察到的。周恩來先生有一次偶然和我提及〈洋琪情話〉，他說寫美國的全貌，從來不曾看過有此書。這本書所搜集材料之親切有味和內容豐富的。這是他作遊美遊記，但在當時有意搜集著述材料，不以視察美國東部為滿足，特冒着相當的危險往美國南部一行。（美帝的旅行向沒有什麼危險，但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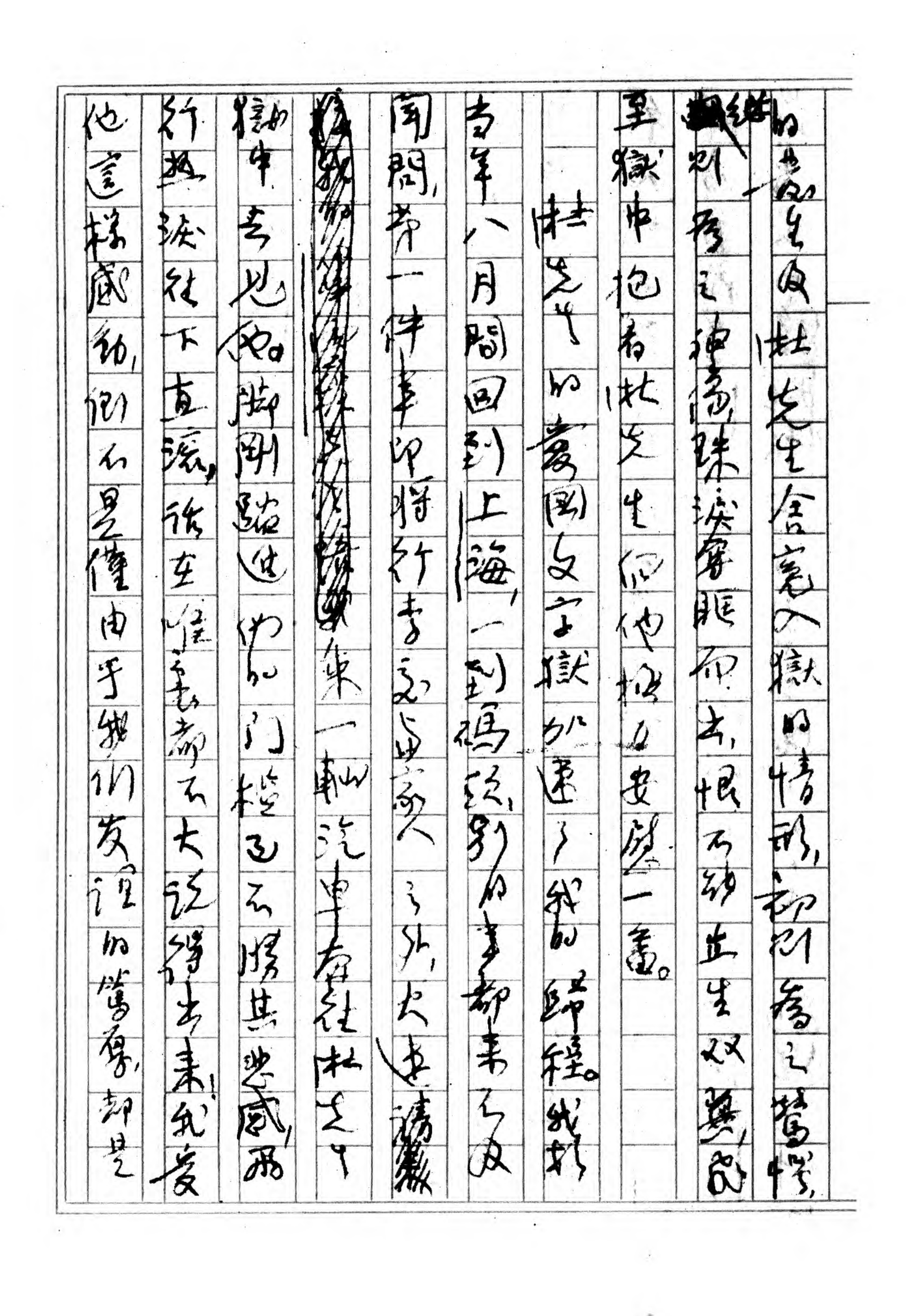
南部反動勢力相當大，要去實際採訪，搜集真實材料，却有相當的危險。除東部南部外，还往北部西部視察，不但視察城市，而且深入鄉村，所以自問是很費一番苦工的。

上面說過的四本書，算是我第一次流亡对于讀者諸友畧盡報告的職责，在這裏不想有所贅述了。

* * * * *

現請略述第二次流亡的前因後果。

我在上面提及過，我出國後生活週刊即被封閉，筆友杜重遠先生即接着創辦新生週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這好像我手上拿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時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環境的艱苦而搶前一步，重新把這火炬拿起，繼續在黑暗中燃着向前邁進。我在海外聽到這個消息，真是喜而不寐，我從心坎裏深深感謝杜先生。但是我於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在美國旅行到芝加哥時，突然在芝加哥的著名的論壇報上看到一段電訊，說「新生事件」



的意見及杜先生含冤入獄的情形，都引為之憤慨，繼則為之神傷，殊深欽佩而去，恨不能立生双翼，飛至獄中抱着杜先生，向他慰安一番。

杜先生的愛國文字獄，加速了我的歸程。我於去年八月間回到上海，一到碼頭，别的事都來不及聞問，第一件事即將行李交与家人之外，火速雇[illegible]來一輛汽車奔往杜先生獄中去見他。脚剛踏進他的門檻，已不勝其悲感，兩行熱淚往下直流，話在喉嚨裡都不大說得出來！我受他這樣感動，倒不是僅由于我們友誼的篤厚，却是

由於他的為公眾犧牲的精神。

杜先生身在獄裏，他所創辦的新生也夭折了，我於是籌劃創辦大眾生活周刊，當時是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五周年，深切感到有繼續東北問題[illegible]，加上日本大舉[illegible]方案，救國運動和妥協陣線兩方面的鬥爭日趨尖銳；第一階段，也就是停止內戰以團結抗戰的主張和寧願妥協不致停止內戰的民族自殺，這兩方面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愛國的熱火在每一角落裏每一個愛國同胞的心坎裏燃燒着，當局集盡力壓抑，而有鎮壓禁止之勢。大眾生活便在這樣形勢之下，擔負着揭起光芒萬丈的火炬，作為



千萬愛國者的代言人和計劃者。——它的產生正在震動寰宇的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和全國澎湃，佈出更大之聲勢的勢不可遏的救亡運動的前夕。

《大眾生活》每期銷數達二十萬份，打破中國雜誌界的紀錄，風行全國，為每一個愛國青年所愛讀，為每一個愛國讀者所震懾，不是偶然的，因為它是與當前時代最能適合的運動——救亡運動——聯結在一起的。參加救亡運動的重要作家和熱心青年，他們的重要著作多半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這個代表

時代性的刊物，它的內容是和當前時代的進步主潮息息相關，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是當時上海許多朋友及各界愛國人士圍繞着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所迅速形成的風靡全國的救亡運動的核心，是和當時政府的所謂「睦鄰政策」處於矛盾的地位。在政治比較上軌道的國家，民間的愛國運動原可作為政府外交的後盾。但在中國則情形往往相反。他們不把民間的愛國運動視為是對外來侵略者的同仇敵愾，卻視為是反對政府！當時政府中有些人老羞成怒，要採取，

有些人则表面上虽不敢直接反对妥协投降，但却藉口「准备」、「分裂」「先安内後攘外」，将三运动者对于直接反对妥协投降者围剿以迄致痛击；对于「准备」论者，认为要真正达到准备卫国土，必须立即停止内战，全国团结，一致对外，这样才是真正安内的办法，达到目的以「安内」，而结果还是要走上妥协投降同一道路。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显明得很，七八年来的团结抗战证明了这种理论的错误证明，实则还有一些民族败类们在时、甚至生破坏团结的阴谋。但在当时这种

主張却被當局認為大逆不道，

當時上海成為東亞附上領導全國救亡運動

的中心，而在南洋的前生先生，據說根據他的事業

教先，對於這個中心地點最注意兩個東西：一個是

李公樸先生所辦的擁有五千多個青年學生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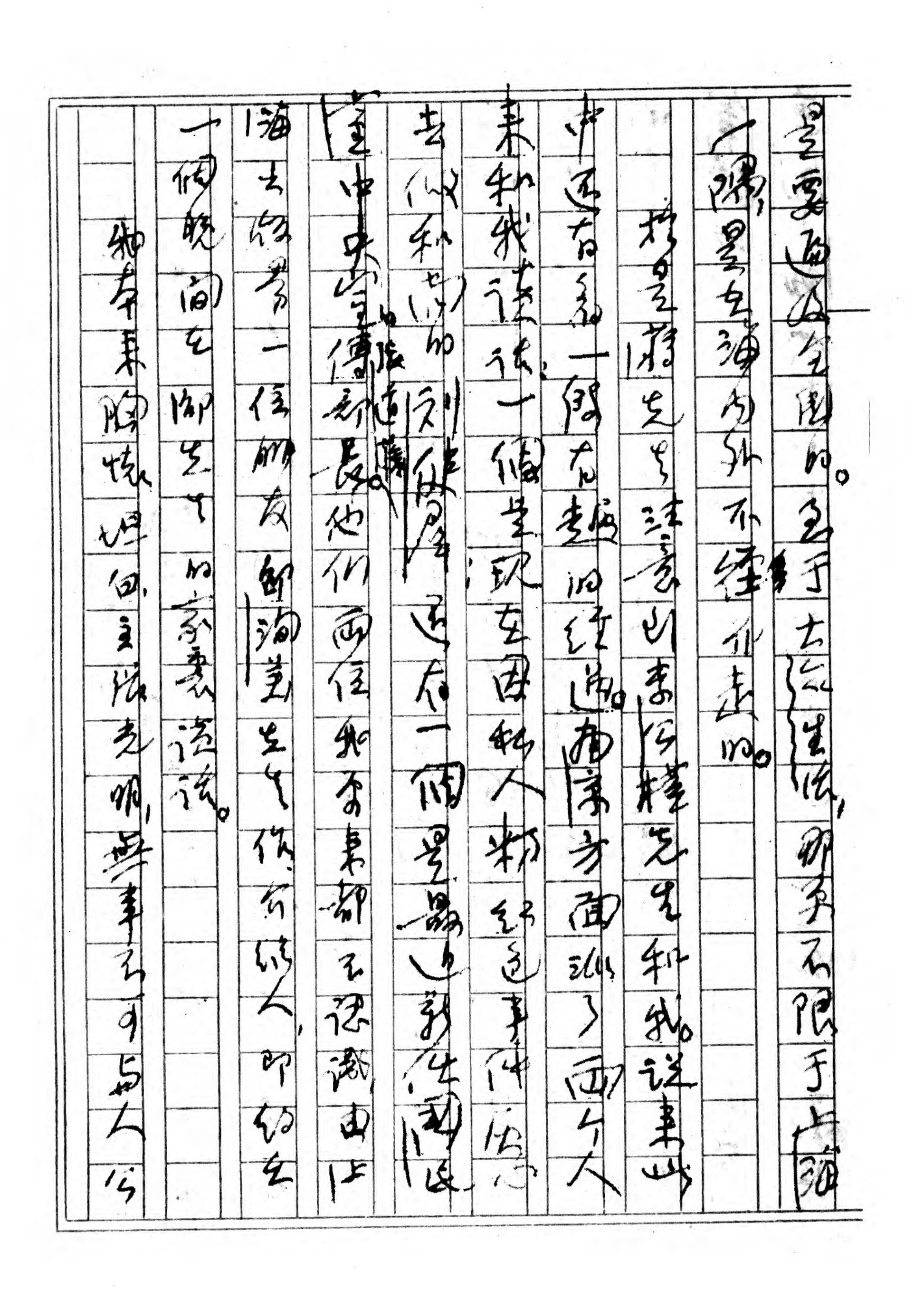
個補習學校，還有一個便是被讀者每期有着二

十萬份銷路的大衆生活週刊。那個補習學校的發

展青年是當時上海民衆運動一股強有力的生力

軍，使該校成為民衆運動的一個大本營，所以這

黨認為上海一隅，和上海的民衆運動就在共產生的影響



是要通及全國的。至于去的生活，那更不限于上海一隅，是在上海以外不經介紹的。

楊是蔣先生注意此事後，楊先生和我說來此中途有過一段有趣的經過。廣東方面派了兩個人來和我談話，一個是現在國私人物紹這事件忠去似和他的劉健群，還有一個是最近新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張道藩）。他們兩位和我素來都不認識，由上海去的有一位朋友鄭洞蒼先生作介紹人，即約在一個晚間在鄭先生的家裏談話。

他本來胸懷坦白，主張光明，無事不可與人公

開談談。鄭先生回信謂晚人的好意，盛意太不

使喜負。我在一個晚間去訪問鄭家，鄭

先生和劉駿二氏都已先在，我們在客客氣氣的氣

氛中開始談話。錢當隆以前是在清國學校術團

畫的，他很會說話，而且說得很多，他一個人就說了二

小時之久，我靜心傾聽，始終不得要領。倒是劉錢

屢說話，實為懂而饒有奇趣。他言的是蒙古社的書

記，據說他是中國皮而甚有的個性，就是他根據意太剛

衣蓋的樸型而起草的。他那時剛剛蓄著光頭，兩個眼睛

圓圓大大的，說話的聲音很宏亮。他說的話也不少，

關於抗戰問題，你發揮了一大套「領袖腦袋論」。中國的國土在繼續內戰和不抵抗主義的情形下一天天縮小，是不是該立即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的保衛它？只簡單問一句，中國應不應該抗戰？如那時還不去抗戰，到了什麼時代才去抵抗？這些問題，在闊和尚看來很簡單，全憑領袖的腦袋去決定。一切都在領袖腦袋上，領袖的腦袋上怎樣說，應該怎樣！我們（指全國人，連紅黨也包括在內）一切不必問，我們該問，只要隨着領袖的腦袋走，便可以萬無一失！

他声如洪钟似地虎虎而读，高擇這種妙論津津有味，我有時微笑假瞧，觉得真是闻所未闻，聽到我古奇读看到他那樣天真，感到一種奇趣，不，他还有奇读，汩汩而出。他说领袖的脑壳自有妙算，保佣主路男不果而绝付服役，还要八妙々不休的张聊，好像领袖要静静地睡觉，你们這些像蚊子嘴々在周围炫接不休，使他老盛不悉，只有一揮手把這些蚊子完全撲滅，保看他圈有麼天真有趣，把全圈的村已運動和將圍剿，消灭，轉々地那上一蚊子嘴々的只要一揮手々就可以一下子完全撲滅了，我聽到這種

有趣的奇談，除由衷嘆笑出聲狂笑之外，尋不出甚個
的妙喻。他見我只冒笑笑，也許以為我已心悅誠服了，
更肅然道貌——乃對我宣稱，「老實說，今日前所在
數一個×××，從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將來專門
給祂的腦袋好用，一旦發生結果，什麼國家大事都一
概知道，那時有來，今日的教的×××不為何死亦
已！」
　他把死來恫嚇我，但卻說得那樣有趣的！這不能
不使我繼續地笑。我說救亡運動是全國家國民眾
的共同要求，絕對不是一二人或少數人的「腦袋」

所創造或捏造出來的，所以即使講減一二「脫黨」
一這類捏造也是無事實的「脫黨」，不是剛[illegible]
新為所謂的神聖不可侵犯的信徒的「脫黨」，大
有合併聲明之必要。一整個校之運動還要繼續
下去，直至完全勝利不會停止，這都應作了結
者一。當時附帶对你聲明，不參加校之運動則已，既
參加校之運動，而表示力許生死前你個人生死早置
度外之，這是对于你的以死相博作為革命的表露。
民國的愛國運動，僅被作為政府的外交後盾，不
必即視為反政府的行為，這是希望你作了解者二。

政府既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
一致御侮，否则即前言诸备，实属南辕和北辙，还是
希望他们了解者三。我们希望此两党之领导全国抗
战，我为民族领袖，委员长蒋领袖但对于到达之所
主张的「领袖服从」论却不赞同，因为领袖的
伟大正在能领导群众「服从」的大众，而不在于领导群众「服
从」无视群众服从而自为「孤家寡人」，这是他们了
解者四。
话是这样讲了许久，甚至到了晚间一二点钟，却是
生室中生产，仍是要抓个人和招待客人的地位，只

是時時微笑地靜默着把你的書經，從從容的走然是剛開動作，我也只是把要地交故一些上述加意見。我們都始終客客氣氣，沒有面紅耳赤過，筆則剛健舉一說起鈕神腦筋，就兩個眼睛圓睜得特別大，聲音特別洪亮，好像特別興奮似的。時間談得太晚了，我趕去火車站，叫了一輛野雞汽車，急駛回家。上車之後，我獨自一人在車裏大聲而笑，因為好像在做夢，又好像看了一齣什麼喜劇！原來說呢你們兩位跑到上海來和我談談政治，談判，何以說沒有什麼重要的有關問題的話提出來談，

[illegible]，而語無倫次，一切如論模生，前後即一腿而散，竟無法理可言，直令人摸不着頭腦。（真正大家都有一个「腦殼」！）

但是讀者諸友，不要以為我在說笑話，因為仔細想想，列傳屋的「經驗腦殼論」雖說得奇突，直至現在，國區裏卻有一部分人還是把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的「經驗」。他們把偶像對于經驗的絕對服從，盲目服從，當人說在那邊走左傾很不象樣出卓越的藝術，這話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但若有幾分意義的話，毛病就在上述的「經驗腦殼論」以是

以国民党中其他人物也许不会像刘健群那样天真直率。

这种领袖观便是独裁的领袖观和民主的领袖观的根本差异。民主的领袖观是要领袖接近群众，重视民众，服务民众，即重视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舆论的表现；独裁的领袖观便恰恰相反，只有领袖为首，服务其余千千万万的民众最是等于治者服务；前者需要真正的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后者便是最优秀的民众服务的要素所，后者便需要民主意识而惟使完，因为学等他们所视的民众服务于一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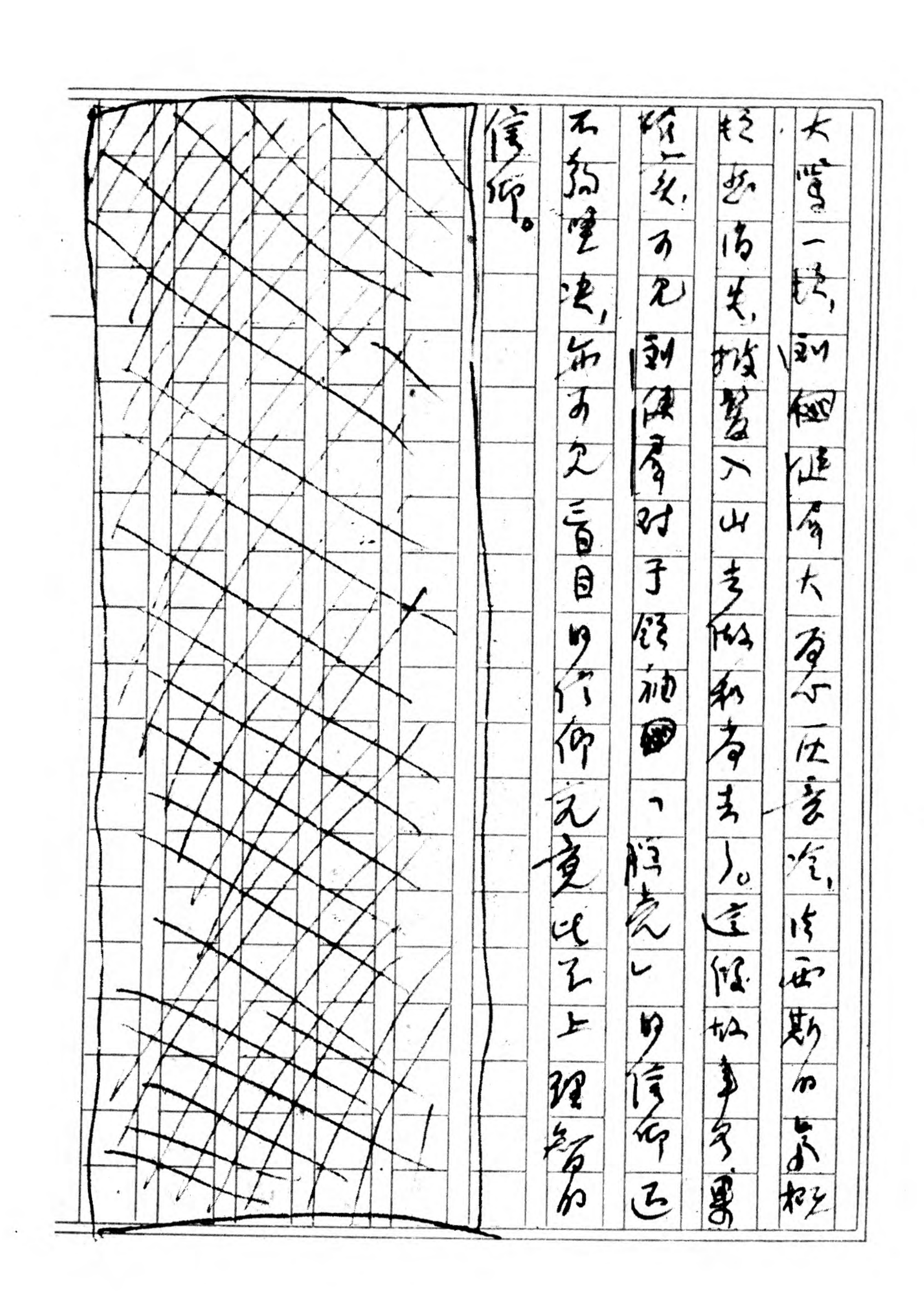

什麼意思，而且他認為這要妨礙他的獨裁。
說從這裏又開說了說，言歸正傳。且說劉備而
住回到南京，對于我的數告也許還不算很壞，因為
據香港的消息，知道了有意將我從南京抽回
當面一談。由杜月笙先生出面，對我表示，他願意
親自陪送我往見蔣先生，並於瞻見後親自陪送我
安全回上海。這是杜先生的一番好意。當時杜
但有個地方說云，是上海話上不高興，給子的但
感到，然是這話的實質，好像就是這樣、
表也不清楚是怎樣、是什。我由傳人生大的

這也許就是法西斯主義的領袖。不久以前在報上看到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對德國人民演講,有幾句妙語,他曾說,「我們只要看一看領袖(指希特勒)的面孔,便知道他是悲天憫人,志在拯救世界。」(原文不在手邊,大意如此)我看到這句話,也不免失聲而笑。怎樣的面孔才是「悲天憫人」又能「志在拯救世界」?是不是哭喪着臉的面孔?講到希特勒的面孔,有人說他具有一副流氓面孔,流氓和「悲天憫人」,相去更遠了。美國的電影明星卓別林曾作劇,去他諷作的「獨裁者」一片主演,把老希的面



孔去的一個小丑的面孔，小丑的「悲天憫人」主子們是假的吧！但是無論如何，在法西斯主義者看來，他們領袖的面孔，總是與眾不同，在面孔上就含有「悲天憫人」和又「老在挽救世界」的，這可稱為領袖面孔論的。不過我們的博士還未曾進一步指出為什麼領袖有面孔，其他的人就應該一概不要臉罷了！

其一貫宗旨：領袖的面孔也罷，盲從領袖的腦袋也罷，盲目的服從，絕對的服從，理智的服從，即新到和為命論，他固然私人粉紅色事件，被他的老、在新生實動論一番，新生活了之後，把[illegible]呼到周[illegible]



大赏一转，则国际会大有不一样变化，比西斯的家柱轻易消失，被驱入山去做和尚去了。这段故事要修改，可见制度对于领袖国「脑袋」的信仰还不为重要，而可见盲目的信仰无意比不上理智的信仰。



＊　＊　＊　＊　＊

張濤遺書了，簡潔地說，言歸正傳。且說劉張兩位回到南京之後，對于銀行款告也許還不算很壞，因為接着傳到消息，知道林先生有意約我往南京私下見面一談。由杜月笙先生出面對我表示，他願意親自陪送我往北平見林先生，並於晤談後親自陪送我回上海。這是出于林先生的一番好意。至于上海有個地方協會，是由上海工商界組了的組織，但謝分，林先生是該會的重要份子，好像就是該會之長。還記不清，他書是住之先生私邸，住之先生[illegible]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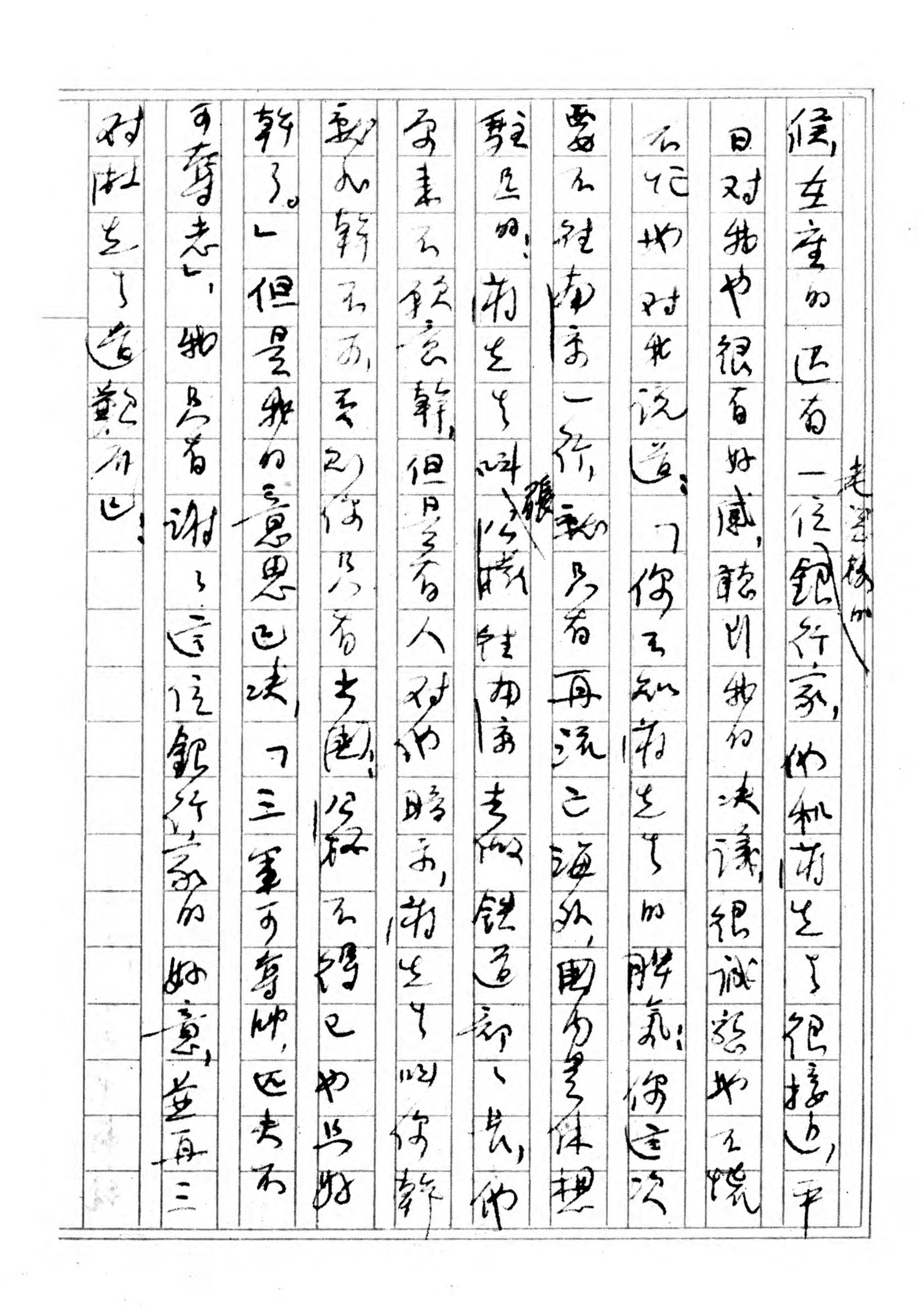
介绍而认识杜先生。当时杜先生在上海社会上的势力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又是蒋先生最亲信的一人，有许多国民党的朋友觉得由他出来保证安全是再保险没有，乃请他陪我往南京一行。杜先生很豪爽地拍着胸脯说道："有我杜某陪你同往，又陪你回来，安全绝对没有问题。"他一面这样说，一面即电南京接洽好日期，南京方面戴笠奉命于某日到火车站来接我们。

我当时是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所以除我自己考虑之外，还要征求该团会的部


位同志的[redacted]意见，因此[redacted]在未决定以前，对于杜先生之约之时未置可否。在讨论期间，竟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估计不致有何意外（指杜逆之起），使可勉强一谈。有些同志却认为不妥，因于杜之逢动的态度既不能隐忍迁就，即有意外的可能。经过大家再次会议讨论之后，决定不去。

我把不去的决议告诉杜先生，同时使知道他所约的日期即星期日清晨，当晚即乘火车赴沪，对于我的不去，很不痛快，认为是失约。[redacted]当天下午在中汇大楼（杜先生的办公处）和杜先生谈话的时

侵，在座的还有一位（老汇丰的）银行家，向机前生了很接近，平日对我也很有好感，听见我的决议，很诚恳地不忍不忙地对我说道：「你不知前生了的脾气；你这次要不经过一行，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国内更是休想驻足的；前生了叫你张以藏经理局去做银行部长，他实来不肯离开，但只有人对他暗示，前生了叫你辞职，不辞不而至，到你只有出国，以后不得已也只好辞了。」但是我的意思已决，「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只有谢了这位银行家的好意，并再三对他表示道歉而已。



後來振澂先生說，翌晨戴笠去南京，果乘車往車站來接我們，接不到人，只得丟了汽車而回，那天早晨適有傾盆大雨，泥濘道路，半途車子翻覆，弄得全身污泥，實在对不住他。在你們看來，我大概是一個最不識抬舉的人！

別的不成問題，最成問題的卻是上述某銀行家所說的話，我既拒絕，有些熟悉實際情形的朋友僉認為我不宜再住在家裏，于是我只得隱藏，請到再說三海外的計劃，我剛由海外回來不到四五個月，負債未清，在經濟力上也無法再作海外之行，但

是香港的朋友都認為我們逃走不可。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較近的香港，這樣促成了我的第二次流亡。

* * * * *

當時西南也在要求中央領導抗戰，也是救亡運動蓬蓬勃勃的一個區域，香港雖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在地理上和西南很接近。我到香港之後，便創辦《生活日報》，同時恢復《生活星期刊》。（《星期刊》就是《週刊》，所以採用這樣累贅的名稱，因為《生活週刊》已被封禁，改用另一名詞，在多少地方行才不受阻礙。）當

時的香港，各地園地都常荒涼，和香港抗戰以後的情形相差很遠，當地日報每日銷數最多的不過五六千份，生活日報一出版即每日銷到二萬份，也震驚了香港的出版界，但是當時的香港究竟不宜于全國性的報紙，日報雖銷到兩萬，在時間性上已不免落後，而郵費又奇昂，因此生活日報每月虧本，虧到四五個月，無法再虧下去，只得自動停刊。同時也因為救亡運動需要我再到上海，在事實上也無法兼顧。

當時的編輯部人員都相當充實，有金仲華、惲逸羣、王紀元、及柳湜諸位先生參加。人力相當充實，而

後來胡愈之先生由法國回來，也加入了我們的陣營。

財力卻不夠雄厚。生活日報要在上海發起，原定資本三十萬，作兩合股份公司性質，歡迎讀者踴躍投資，可是一個月已募集資本十五萬元以上。那時國民黨中央黨部聞而[illegible]，就派員與同人討論，想單獨投資十萬元，後來因知道是兩合公司，要多投資而仍無法操縱，只得作罷。生活日報要不順利產生，後因[illegible]的政治的壓迫，實際上辦不起來，[illegible]全投資讀者的對營即本報的信用[illegible]，特存銀行的股款本利全部歸還。除了[illegible]階[illegible]時，因作試辦性質，仍由生活書店理事會決定資

助，结果在经济上是遭到相当的损失。

但是由于本报同人的努力，在推进抗日运动的效用却有着相当的影响。当时民族统一战线已在积极酝酿中，而要迅速形成民族统一战线，最主要迅速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换句话说，因内不经和平统一，作为团结抗战的基础，更有的内战固然不应进展，更不容许有其他内战的发生。为着中央与西南两机组织发生的敌对地位，而我们报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持论和当时香港以及西南某些时论不同。他们有的站在拥护中央的立

场，便主张中央用武力讨伐西南；有的站在袒护西南的立场，便主张西南用武力反抗中央；总之一不幸而开火，无论谁打谁，新的内战又起，这对于全国团结抗战都是不利的。我们站在全国团结抗战的立场，反对双方的内战继续下去，也反对任何新的内战又发生出来；不管它是国共战争也好，中央与地方战争也好，都是有利于我们民族的侵略者，都是全国团结抗战的莫大的障碍，都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主张中央应接纳西南抗战的请求，同时西南应力避与中央武力的冲突，我们的这种主张，



會在當時言論上作有力的表現，堅持到底，毫不動搖。

我們當時不但對于西南問題有這樣的態度，並推廣這個原則到整个的救亡運動，就是在團結御侮的大前題下，各方面都應該消釋前嫌，為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問題共同奮鬥——也就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我們和住在港的朋友商為著這个問題，討論了幾天幾夜，結果草成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團結御侮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條件，由我親自帶到上海再和沈鈞儒章乃器諸先生及救國會諸同志作詳盡

的檢討，經過港地幾位朋友多次的商討和修正之後，最後由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諸先生和我四個人共同負責署名發表。這本小冊子最初產生于香港的生活日報，最後由上海印行普及全國，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熱烈的反應。這是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的時候。

除上述的那個小冊子外，關於我辦理生活日報的詳細情形，我曾有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的經過一文載在拙著經歷一書中。在港發表的比較重要的文字，後來印成一本坦白集，並把團結禦侮的最

（當時陶行知先生適因赴美經港，對小冊子內容亦曾參與商討）



依很多的要求，那幾件收在讀書附錄裏以便翻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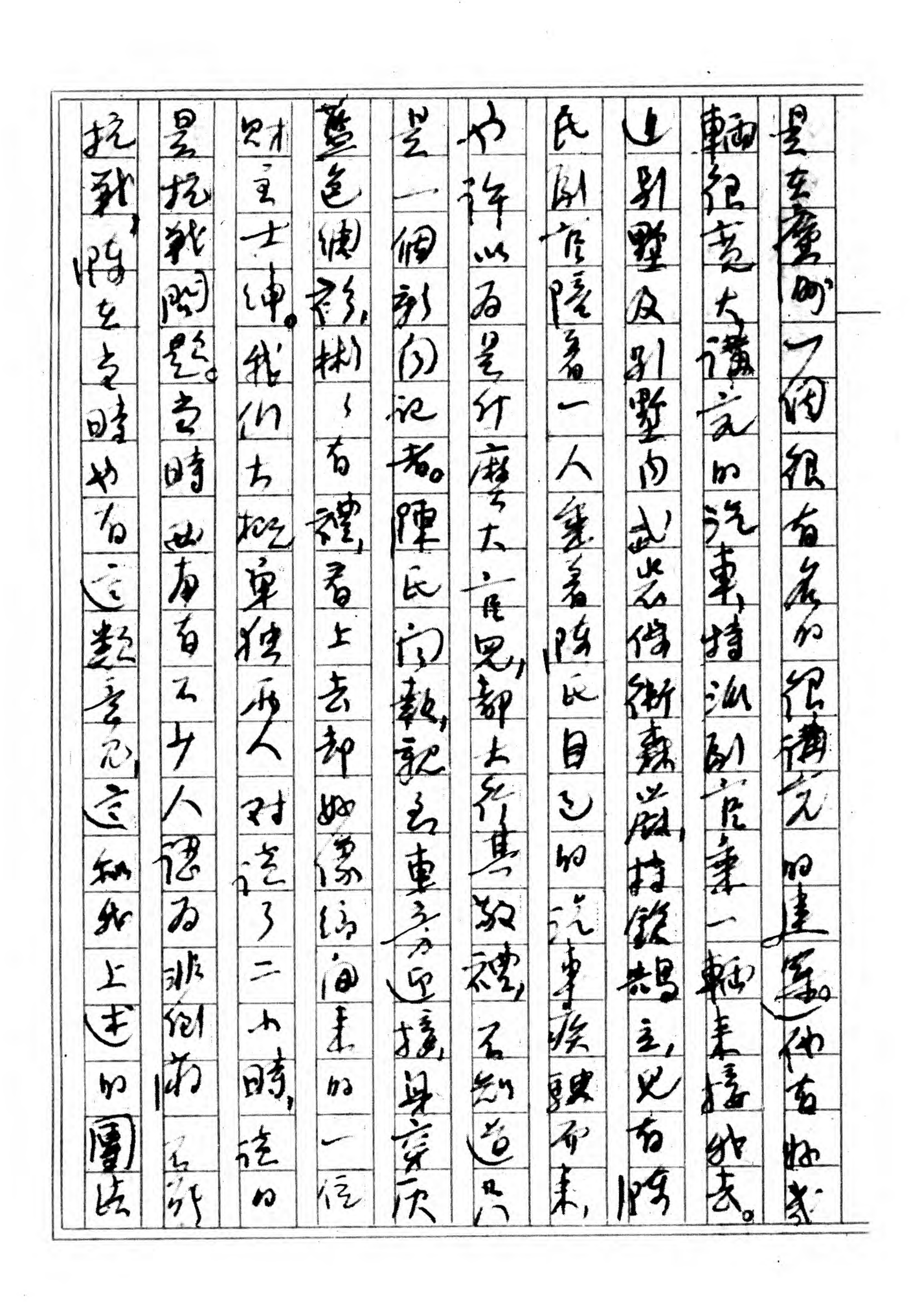
這些，都算是我第二次流亡期間讀書請教的報告。

* * * * *

在港求教的時候，正是陳濟棠氏在廣東做廣東王的時候。我和他原無一面之雅，他聽見我以香港求教，特派當任經濟部次長的議宜之先生由廣州到香港來約我去讀讀。陳先生，我在英國時曾見過幾面，那時他在牛津讀書，我在倫敦及旅行到牛津時都在友人處見過看過他。我當時知道

他是廣西派人物，大概政界人物在海外的時候，頭腦都比較的清楚，所以我們還談得來，並沒有過什麼深談。陳氏派他來約我，也許因為知道我在英國的時候認識我。我站在新聞記者的立場，跟新港港的左近大小廣州當局的意見談談，意思是說要一行的，所以便借回港之便赴廣州，我很想趁此機會，所以這次另三人到梧州，去夜談話，第二天即經回港。

到廣州後，承陳氏派副官招待，住在一個很講究的旅舍休息一會，當晚即往陳氏所自建的花園別墅。（似是這樣的名稱，我是小花園，已記不清，總之


是在廣州一個很有名的銀行家的建築，他有好幾輛很貴大講究的汽車，特派副官乘一輛來接我去。這別墅及別墅內的武裝保衛森嚴，特敘賓主，只有陳氏副官陪着一人，乘着陳氏自己的汽車疾駛而來，也許以為是什麼大官兒，都大行其敬禮，不知道只是一個新聞記者。陳氏聞報，親在車前迎接，異常慶慕色儒雅，彬々有禮，看上去卻好像從前來的一位財主士紳。我們大概單獨兩人對談了二小時，談的是抗戰問題。當時也有不少人認為非倒蔣不能抗戰，陳在當時也有這類意見，這和我上述的團結

德鄰的意見無出入，我便盡其所知，詳為說明。臨行時，何由他的副官集諸車站送，他親自送到車旁親手代關車門，行一深鞠躬禮而別，好一位謙恭下士。

第二日，何由謙宜之先生陪送我乘火車回潘陽，臨行時他說：「陳光經覺得文人生活艱苦，以你因言的話，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謝了他的體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辦報辦刊物，向來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錢為鐵則，所以請他代為婉謝。

後來李宗仁氏到廣州，也約去談了一整天，當



崇禧氏到广州，也给我说了大半天他们的抗战情绪都非常高，但因为西南和中央的矛盾对的地位，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我对于国内外形势及全国的统一团结的维护的意见，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李白二氏，我以前也未见过，但是我们在一起很愉快，我们一见如故，尤其因为他们主张抗战论调，与我接近，是以对李更直率，白较深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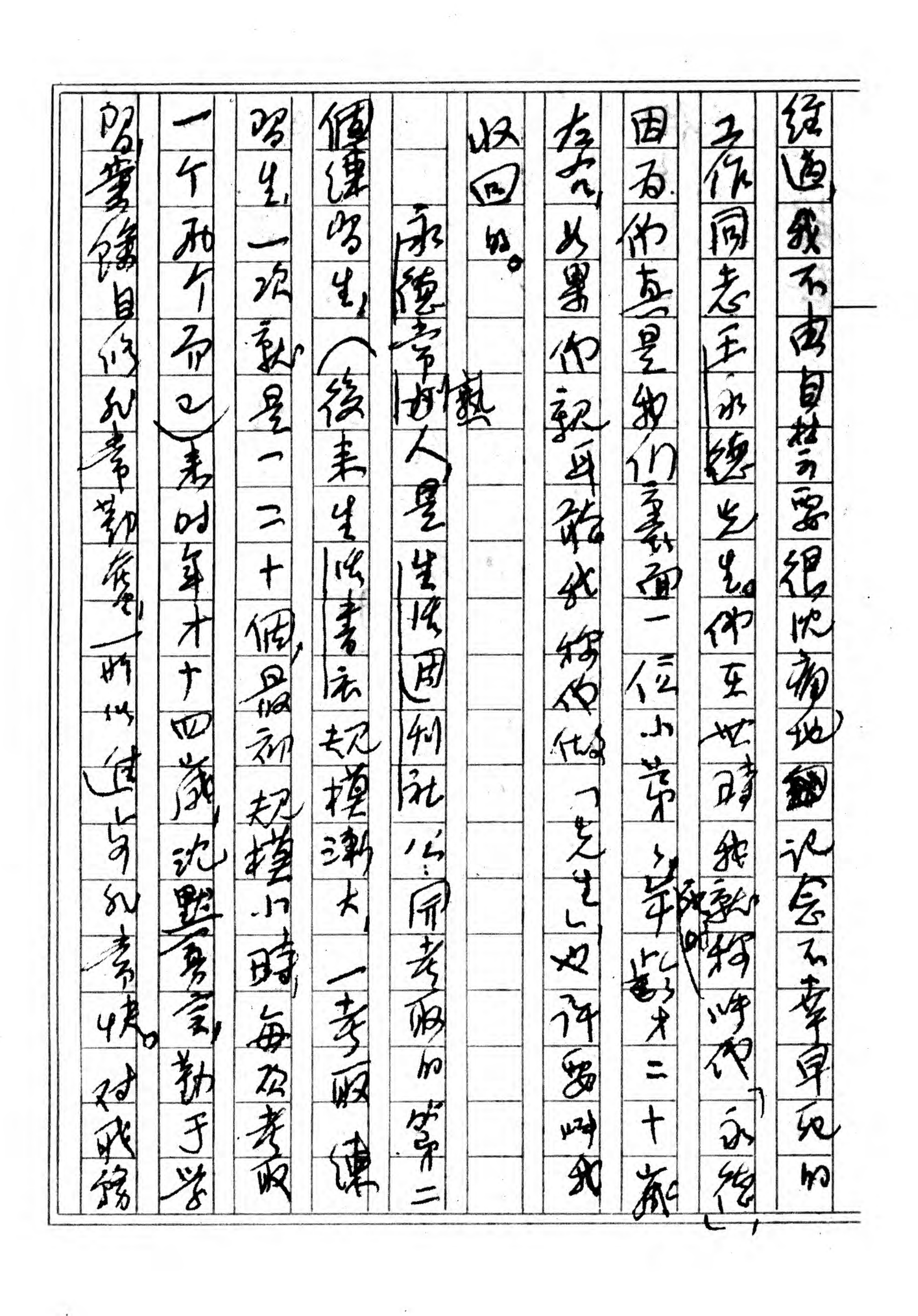
后来幸而由于全国民众的实际要求，全国舆论的呼声严紧，使不但西南问题终于和平解决，即国共纠争也得到和平解决，于是内战终于避免，民

族統一戰線得以形成，抗戰才得實現，這正當是某些少數陰謀派所疾首痛心，卻是全國愛國同胞所額手稱慶的。

這決不是一二「腦袋」和少數人的「腦袋」起了什麼神秘的作用，而是全國民眾的意識要求所反映。能符合這種反映的主張和言論才有力量，反則無論你為何自信神通廣大，無論你怎樣想力闢倒車，都是徒然的。

* * * * *

想起在第二次流亡中在香港出版的刊物的



经过，我不由自禁要很沉痛地追记念不幸早死的工作同志王永德先生。他在世时，我就称呼他"永德"，因为他真是我们里面一位小弟弟，年龄才二十岁左右。如果他现在能够我称他做"先生"，也许要叫我收回的。

永德常熟人，是生活周刊社印所排版的第二个练习生（后来生活书店规模渐大，一考取练习生，一次就是一二十个，但最初规模小时，每次考取一个两个而已）来时年才十四岁，沉默寡言，勤于学习，业余自修，非常勤奋，所以进步非常快。对于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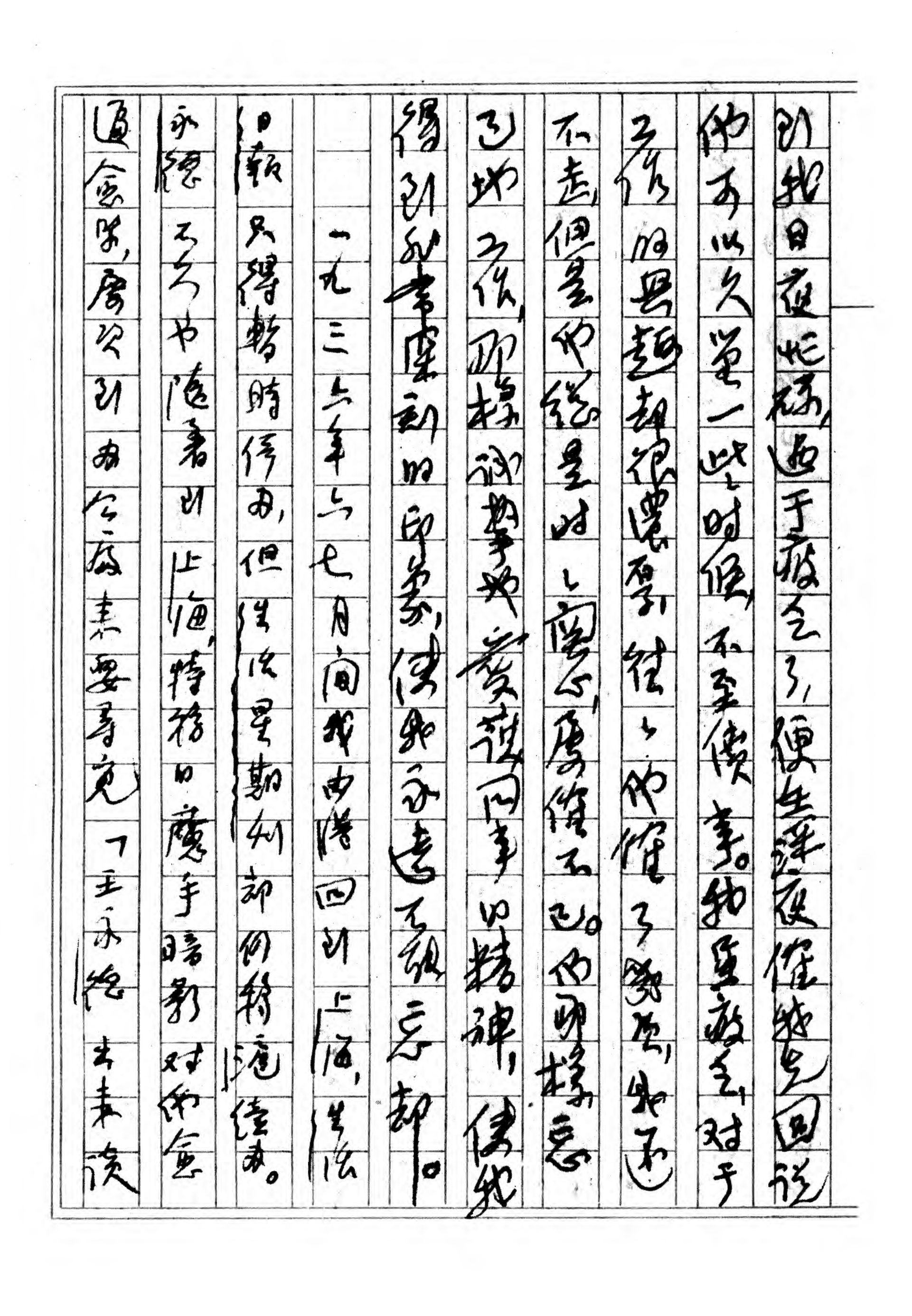
忠誠切實負責任心。我女大任生活的時候，他就担任助理編輯，同時相助я理文牘。你看他那樣年才十幾歲的小小個子，他的學識由于數年間的自修，已趕過一般大學畢業生的文化水準，他的文章經驗由于數年間的訓練，也已豐富純熟。各處讀者來信很多，有幾信同事找我料理，他也是一個，每日幾信由我親自閱看以後，只擬答覆要旨，他寫信已很純熟，常識尤為豐富，每日揮筆作覆數十信，在不聲不響中弄得妥妥貼貼，視為常事。有種青年一貫犯一種毛病，即知識



稍有進步，即產生驕之氣，遇人家學上由此阻礙了自己的再進一步。幸經剛剛相反，他急求進步，急不自足，虛虛心。他對事能從各方面看，能有充分的諒解精神，因此他的待人接物都有很合理的態度。因此許多同事對他都很敬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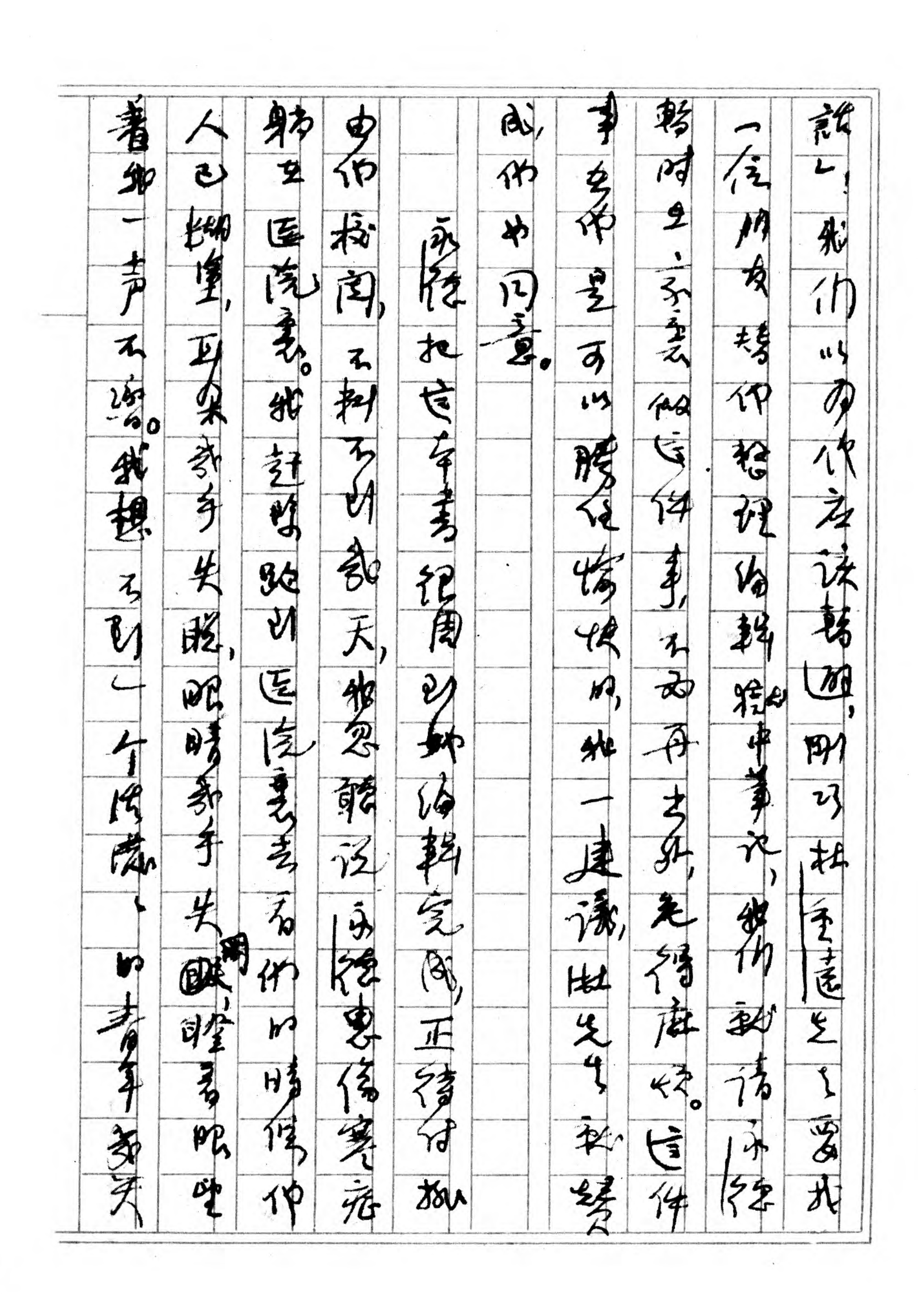
這樣進步可愛的一位青年，不知怎樣竟被特務所注意，特務魔手的暗影已漸漸向他籠罩過來。我知道他在上海有這樣的困難，所以趁香港办报的時候，就叫他隨後也來香港。生活日報開办之後，他就担任生活星期刊的助理編輯。談

利由我手編他的知識和办事能力比前更進步，而尤其使人感動的是他忠誠於職務，不怕麻煩，不怕勞苦的精神。我們在德文報時因資本有限，自己還不置不起排字機，是租用大眾日報的機器，把字房也是租用他們的。當時晉德撿字工人的技能不及上海，而印刷機又舊，和別人合用，所以相差很大。為着生活是期刊的編輯印刷，我們兩人常經共同工作到深夜，還不要到印刷所中親自照料一切，象我的樣樣也要熬深夜去印刷所中照顧。他自己只知工作，不怕勞苦，卻常常能會到獨的辛苦。[illegible]



到我日夜忙碌，达于极点了，便在深夜催我早回睡，他可以久坐一些时候，不至偾事。我虽疲乏，对于工作的兴趣却很浓厚，往往他催了几次，我还不忍不去，但是他总是时时留心，屡催不已。他那样忘已地工作，那样热挚地爱护同事的精神，使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却。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我由港回到上海，《生活日报》只得暂时停刊，但《生活星期刊》却仍继续。永德不久也随着到上海，特籍日魔手暗影对他念道念咒，虑到我的公务太要寻觅「王永德」先来谈


说：「我们以为你应该暂避，所以把重远先生要我一位朋友转你整理编辑的狱中笔记，我们就请承综暂时主持，要去做这件事，不必再出外，免得麻烦。这件事你是可以胜任愉快的，他一建议，杜先生就赞成，你也同意。

承综把这本书细周到地编辑完成，正待付排，由你校阅，不料不到几天，我忽听说承综患伤寒症，躺在医院里。我赶紧跑到医院里去看他的时候，他人已糊涂，耳朵也失聪，眼睛也失明，睁着眼望着我一声不响。我想不到一个健康的青年就突


不見就那了這個樣子，同時想到你進來的悽涼身世，不禁的悲從中來，含淚附近你的耳朵問你道："你身体覺得怎樣？"她是大大，你認識我嗎？"我這樣問了好幾遍，你才睜轉着模糊的眼珠，含糊糊呼我一聲"先生"，接着我問："那些先生的書還去了沒有？"你德白翁書信心，于此可見，是在這病苦的狀態中，你對于未完全完成的任務，還是念念不忘的。

這個有着光明前途的青年的可貴的生命終于無法挽救回來，臨終的那一天，我和許多同事都親自送你入棺，失聲痛哭，步行送着你的靈柩到

蘇州河旁，看他的雪櫃擺上一隻文件，準備執
似情地收殮安葬，我們抓到着對他勤的致敬，惜外
而别，從此他和永遠的聶耳永訣了。

永遠的聶耳雖然早死，他的精神是不死的。
他所嚮往的是進步文化事業。進步文化事業是集
合許多人的心血努力而一點一滴地造成起來的，
凡是在這裏面参加過或用過力量的人，對于進步
文化的結晶果便是盡了他的一部分的力量，他的
成績便融合在這個果實裏面，不會白費，即令不幸
中途放下他的武器——文化戰士的武器——死者無

敬同志會繼續不斷地幹下去，相信更不會因噎，即繼續性也不會中斷的。事業，這意義的事業是進步文化事業，有益于大眾，有益于革命的文化事業，即有這樣的進步文化事業的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一同進步的努力一要義說，同時也是時代進步的推動力。

從這個意義說，魯迅的精神已是不死的了，魯迅他在世的時間太短，給他可做的機會太少，如果他能多活幾年，必能成為一個更完備的更熟練的文化戰士，此當都屬無疑，這未嘗不是進步文化前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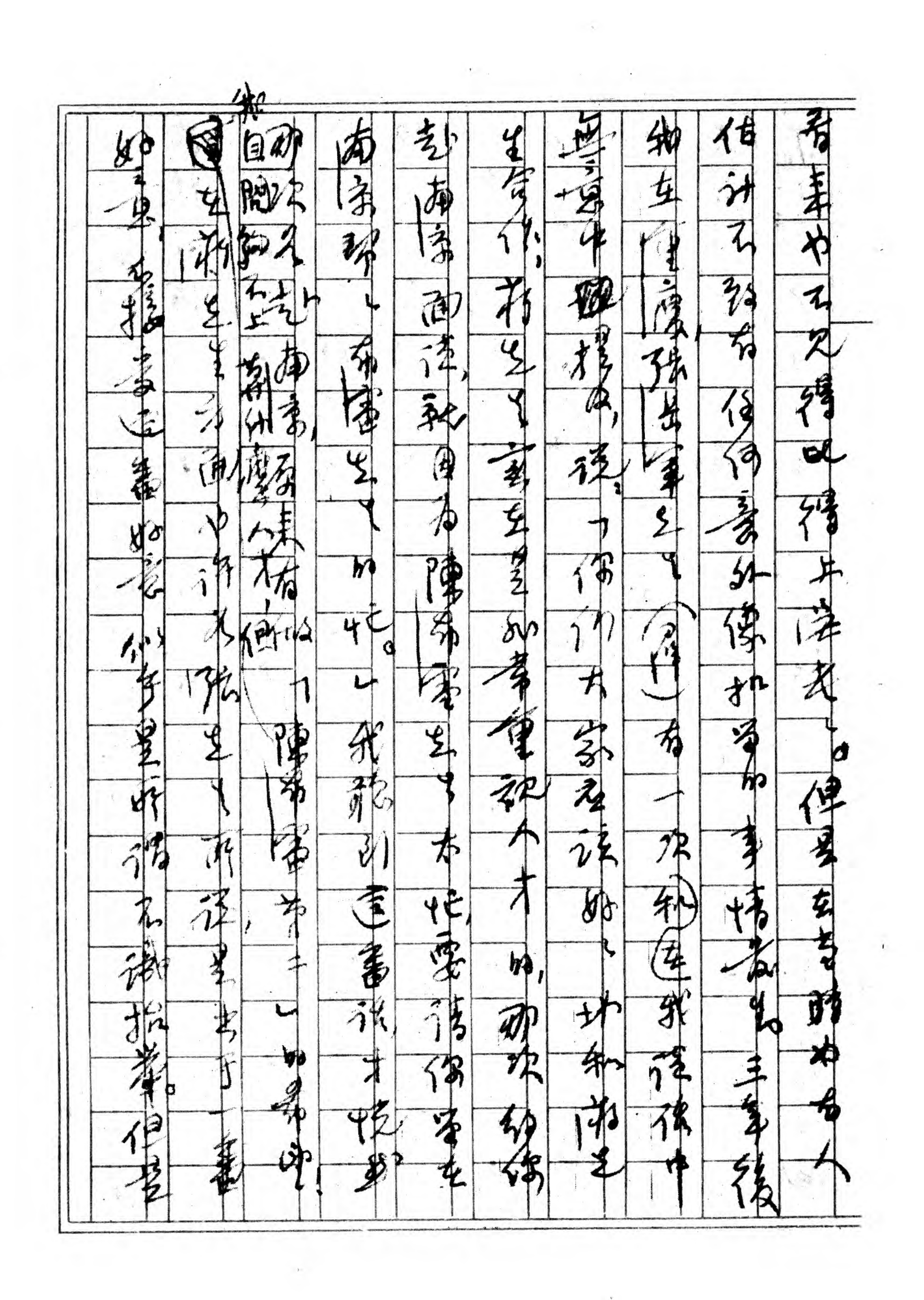
一個損失。我為着這個文化戰士的失折，想起他的苦鬥的精神，他死後我在編輯室裏獨自辦公的時候，為着他哭了好幾回。但誰都回想，這樣的失折，是是由于病，而黑暗勢力的逼迫摧殘，逼得他心神不安，也是使他短命的原因。我為他哭有什麼用？他的武器，不得已而放下，我應該更堅決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黑暗中和黑暗勢力作繼續不斷的戰鬥。我遇到困難而不退怯，畢竟陷於顛沛流危難之中而不屈不氣餒，在這樣的時候，我每想起為着進步文化和艱苦奮鬥至死不屈的同志如承德

的革命精神，一直到今日，還有一位先烈同事在警中黃牛，一位先烈同事在牢獄中，一位先烈同事在「失蹤」中……這些多位戰士的奮鬥精神，犧牲精神，常使我在悲憤懷抱的心境中增加千百倍的勇氣和決心。當這極端時候，我一面自問，一面自我鞭策自己應去的任務，而同時也我深深覺得對不起棄去他們，我應該在這上面所說的更堅決地奮勇舉起我的武器，在黃泉中對黑暗勢力作繼續不斷的奮鬥。我應該戰至最後一滴血！

我深信永德的純潔，忠誠，英勇，熱愛，同志愛，將永遠留在後死的許多同事中，將永遠感動激勵後死的為這事業而努力的許多同志。就這個意義說，永德的軀體雖死，他的精神也是不死的。*

關於第二次流亡的前後情形，大略已談過了，最後還有一個小小有趣的註腳。

林同濟先生挺身出來，探險伴我到南京一行，目睹不去的決議是否正確，在三年後無意中得到間接的證明——證明當時不去是對的。原來大家認為自林老校「復鐘」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位傳說却也難說。以老老羅隆基先生等四老不是也曾經相關朋友們遊說，邀請潘璞先生到南京嗎，後來李先生還不是們國務潘先生扣留下來，把他在國民黨裁潘先生看來，絲毫不上比李先生，林先生在那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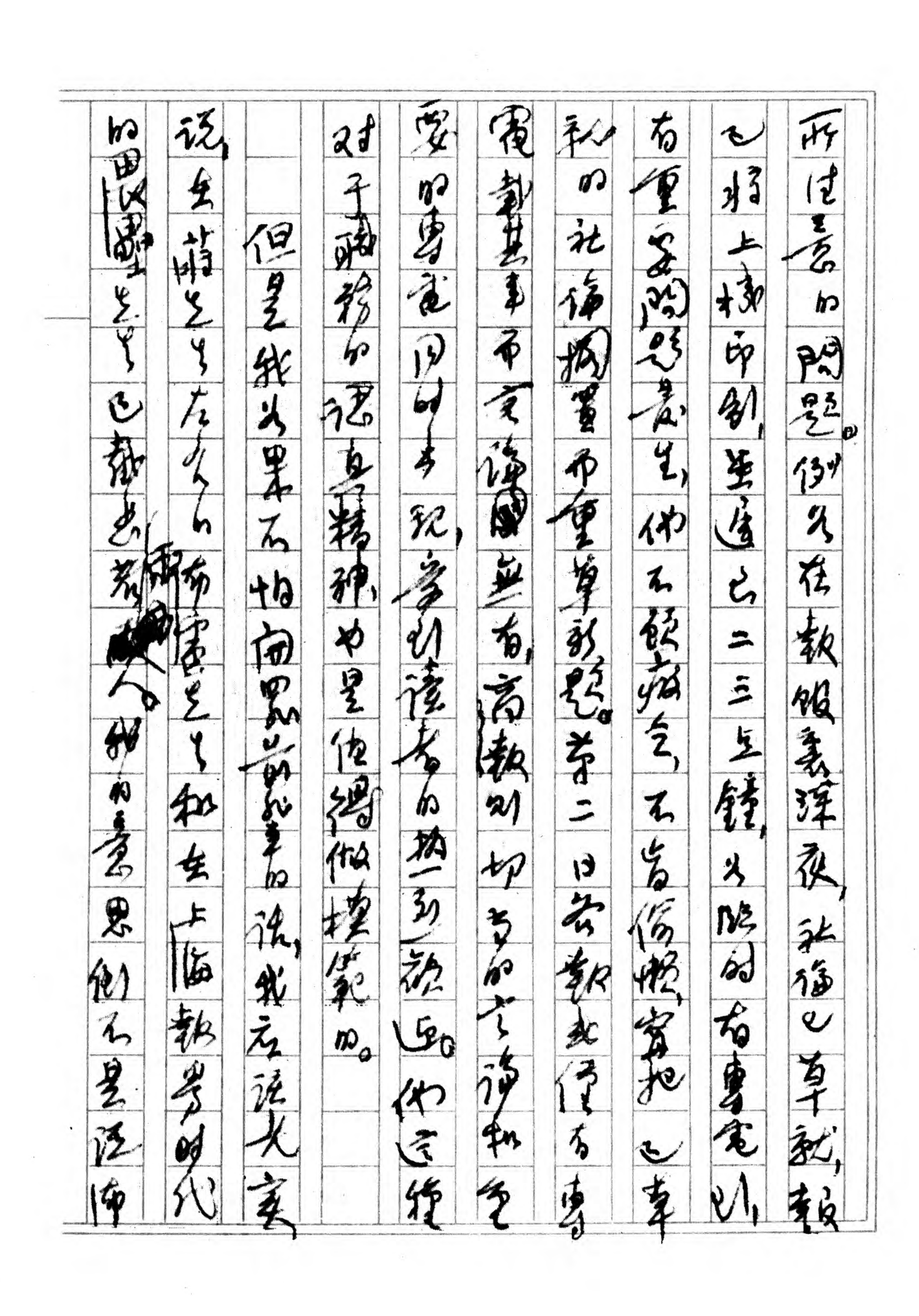

看來也不見得比得上洋老」。但是在當時的台人
估計不致有任何意外像抗戰的事情發生，三年後
卻在張先生來了之後，有一次和我談話中
無意中提及說：「你們大家應該好好地和陳先
生合作，蔣先生是非常重視人才的，那次約你
赴南京面談，就因為陳布雷先生太忙，要請你當面
南京那邊，布雷先生又那麼忙。」我聽到這番話才恍然
那次赴南京，原來有以「陳布雷第二」的意思！
因在蔣先生來函中許為張先生之所謂果出于一番
好意，我擬去盡量婉謝，以年輕學淺不識抬舉。但是

和我當時在救亡運動中的工作者來，和我當時在
進步文化的崗位者來，誰都看得出這些都是扎實或軟
弱的。而且如果是真正的扎實，這只是清楚地做階
下囚而已，一經「指導」，當做工作，假使叫我（當時我所說的）去幹
鄰人政策的文章，就是「抹殺」救國運動的文件，我將怎
麼好呢？所以結果比真正扎實更糟糕。

「陳希曾第二」：陳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前
輩，對這個名詞作何感想呢？我說陳先生是我所
敬重的前輩，這不是空話，有文為證。我在往法國
上海途中，一本專論陳先生事跡的文章，把



他的爱人介绍给有志的青年朋友。当时他担任上海《时事新报》的总主笔，程沧波助他写社论，潘公弼先生担任总经理，我担任秘书主任，我们两人都很谈得来，我人友谊都很好。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建立起来。他当时不但富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而他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惟求所欲表。他对文字修养很讲究，可谓一句不苟，而对于每日的社论题目，尤能抓住当前最核心的最为人



所注意的問題。例如在報館值夜，社論已草就，較已將上版印刷，遲至二三點鐘，如臨時有專電到，有重要問題發生，他不顧疲倦，不肯偷懶，寧把已寫好的社論撤置而重草新題。第二日發報，便有專電載其事而社論並有，高談別切當的言論和重要的專電同時出現，多少讀者為之擊節讚賞。他這種對于職務的認真精神，也是值得做模範的。

但是我如果不指出他的缺點的話，我應該老實說，在蔣先生左右的布雷先生和在上海報界時代的畏壘先生已截然兩人，他的意思卻不是[illegible]



陳先生不語去兩先生太太，而其說也入了路異以

後即是清楚地做教導人，而不能以有眼光有膽識，

[redacted]符合人民需要的新形勢，將先生陳先生（陳先生說根據人民需要和新的推進修改。）

個人的力量是個人的人際關係的力量，是明確說明我們

陳先生的個人友誼的力量是好的，（是為我們今日談

到政治問題不光背道而馳，格格不相入）但是以陳

先生所發的地位價值，個人獨善其身是不夠的，

以講到後半段歷史的陳先生，我們要真實地說（辨），因我

不能做一陳布雷第二。因此我說那裏不能靠

的決議是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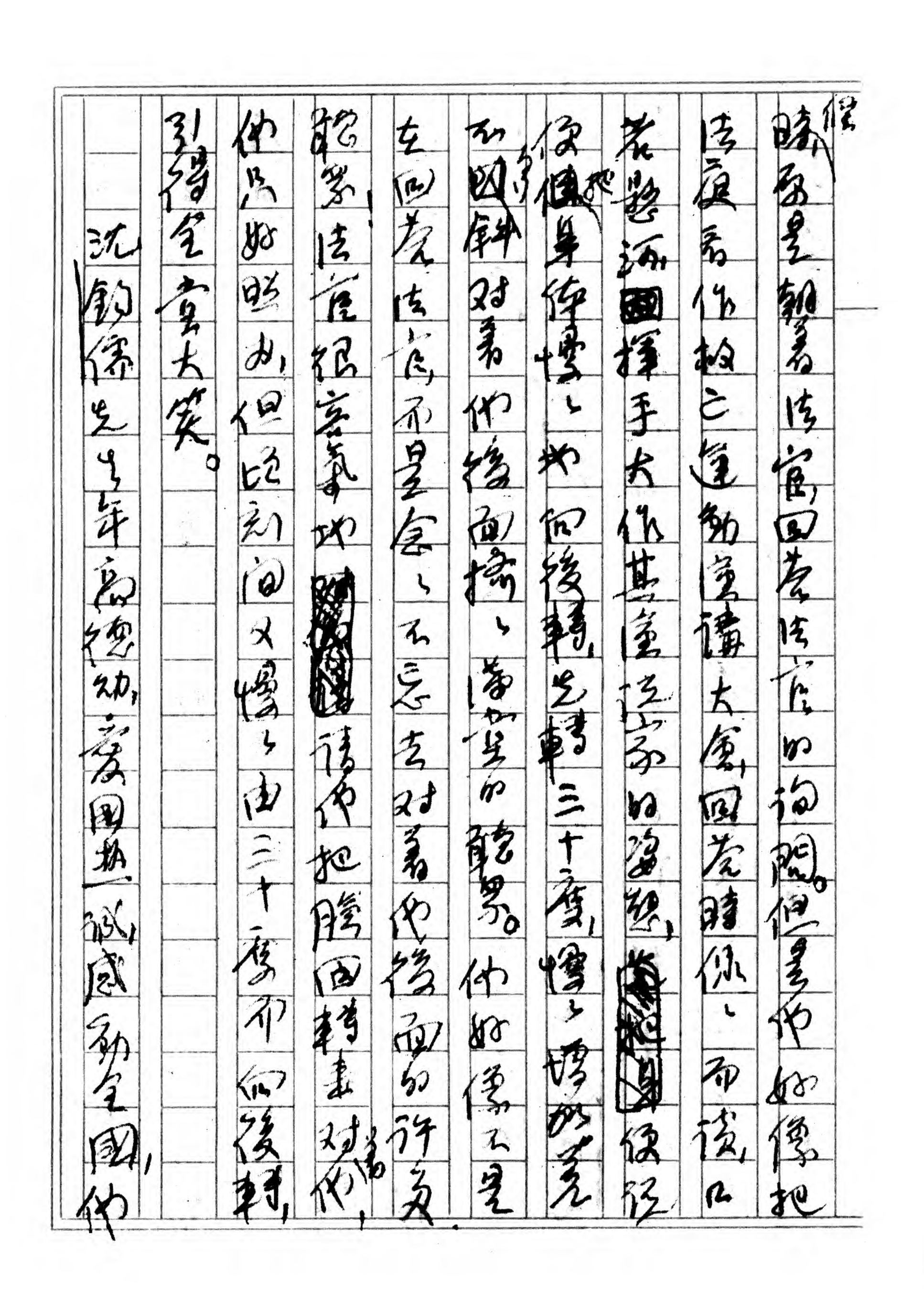
* * * * *

接着我應該談到第三次和第二次流亡之間，還有一段揷曲，那就是和救國會數位同志在蘇州八個月的鉄窗生活。關于這一段揷曲，我在獄中所著的經歷一書已有相當的敘述，沙千里先生還著有七人之獄，其中也有不少珍貴的歷史材料，可供參考，所以在這裏沒有複述的必要，不過經歷所述止於檢察官起訴的時候，關於以後的情形使我有所記述，關于開審的情形，在當時全國各報中都有記載，這裏只想敘述一些有趣的零星事實。


當時我們幾位為着救亡運動而冊入囹圄，在個人方面的利害都看得很輕，總是注意于如何開展救亡運動以達到救國的目的。因此對于公開審問，認為是宣傳救亡的一種機會，一點不肯放鬆，大家對于那位蘭檢察官的罵着良心有意識袒護納的罪行，都在獄中準備好嚴厲駁斥的材料（聽說那位蘭檢察官翻為這次完全聽着黨部中的老爺們牽着鼻子走，盡力諂媚之能事，竟以了官，我們在該律師道賀）尤妙的是李公樸先生，他好像在學校時代準備演說競賽似的，不但把所備的材料念

得烟熱，而且還要去學子裏大鍾其嗓子。他的身体本來很單弱，嗓子本來很壞，再經一鍾，更要震動屋瓦。在開車的那一天，我們在候車裏，都能够聽他在法庭上嘩啦々々，大家還不禁失笑，他被審問後跑出來，第一句就急々地問了我的嗓子怎樣了？對你們講我說你放心，一面千聽罷一堂人々都聽得清々楚々，他聽了才用手拉々他嘴旁像脈般的那一大把鬍子，把心放下，好像如釋重負似的！

王造時先生是一位名教授，又是一位有名的演說家，他在法庭上[illegible]！云在法庭的被審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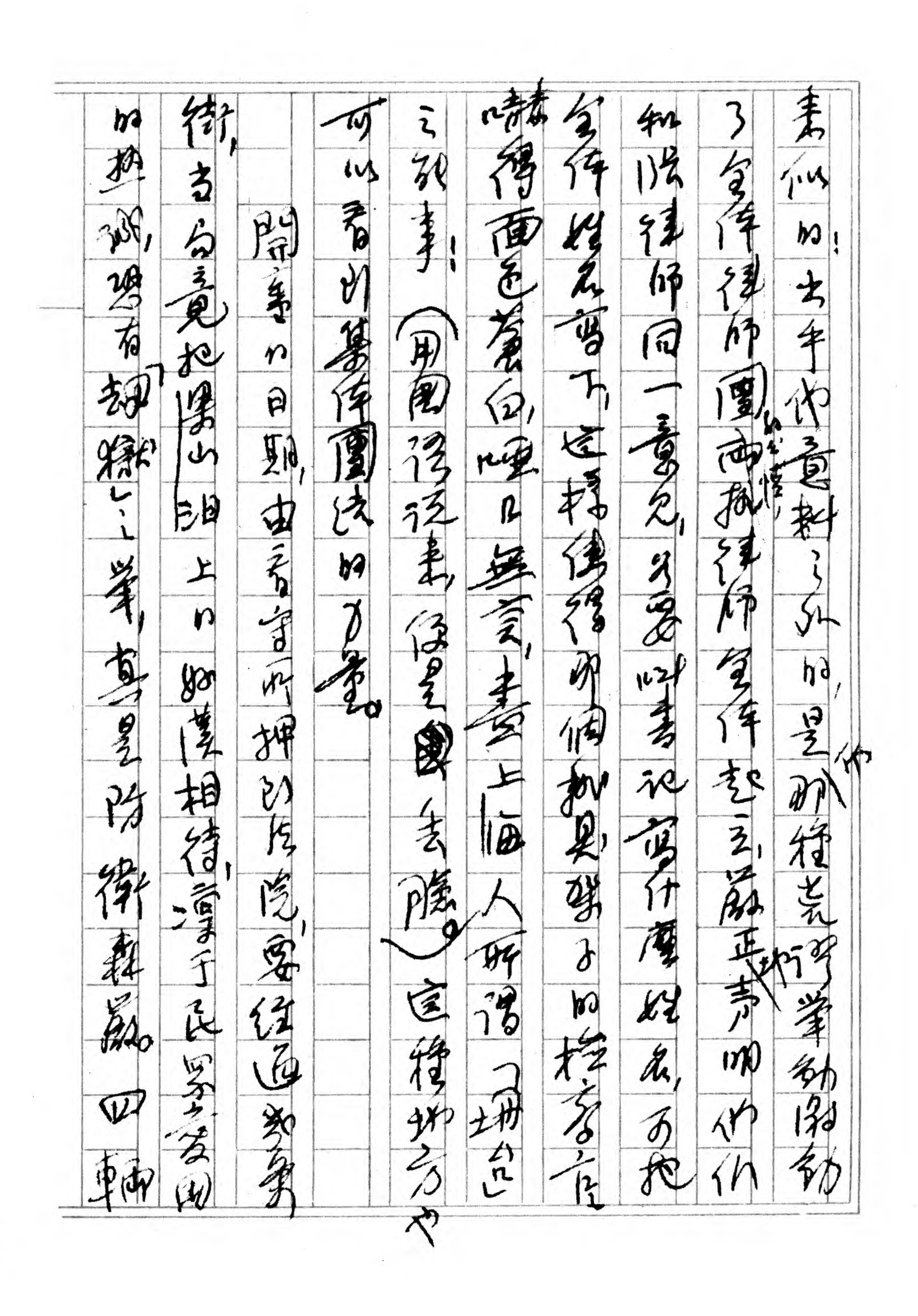
睛們，就是朝着法官，因為法官的詢問。但是他好像把法庭看作檢舉運動宣講大會，因為時係、而談，只若懸河，揮手大作其宣傳家的姿態，[redacted]使說便把身體慢慢地向後轉，先轉三十度，慢慢增加着到四斜對着他後面擠擠攘攘的聽衆。他好像不是在向着法官，不是念念不忘去對着他後面的許多聽衆！法官很客氣地[redacted]請他把臉回轉來對着他，他只好照辦，但是剛回又慢慢由三十度而向後轉，引得全堂大笑。

沈鈞儒先生年高德劭，愛國熱忱，感動全國，他

那一副美髯，和他那謙虛的仁者的岸然道貌，確實配合在一起，尤使人肅然起敬。董開我們的那位保山總算也還有一副好心腸，（至少和那位樓霞不同）他看見沈老先生久立作答，大概心裏覺得不免慚愧，便很謙恭地請沈老先生就坐（他的後面有一隻椅子給沈老先生坐），老先生簡短和其他被告（同志）們共甘苦，不肯獨坐，好給法警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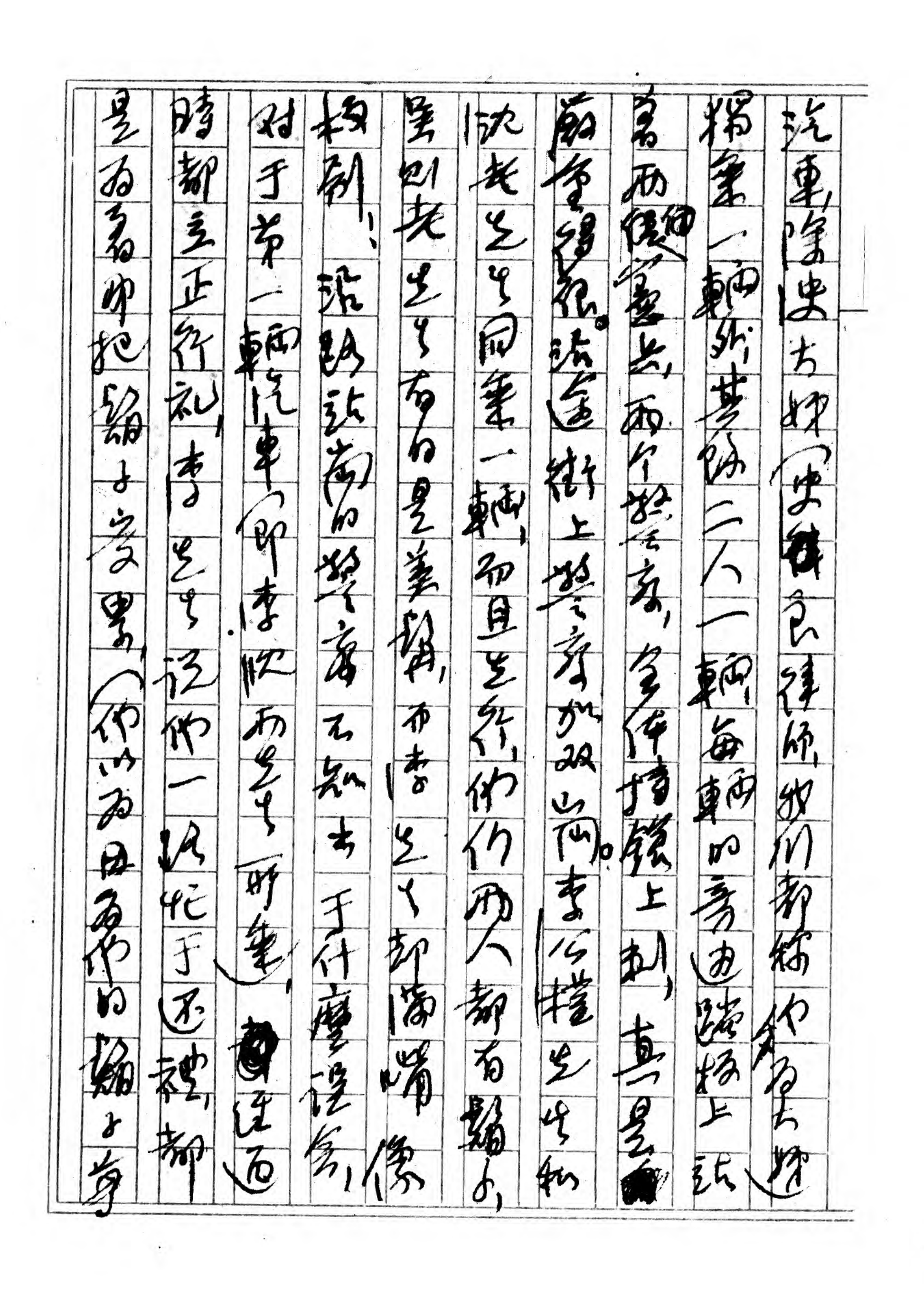
當時我們七人，每人有三個律師辯護，都是上海名律師，自動擔任義務辯護，三七二十一，共有二十一位律師，成為一個律師團。開審的那天他們都穿著

律師未穿的「道袍」，（極像道士穿的道袍，故借用），分成兩批坐在聽眾的前面，面對着信眾。那種現象真好像一群道士在那裏念經拜懺似的。那個黑暗良心周納法隆的檀家居士坐在法座旁邊，卻大擺其臭架子，各位律師把他所說的問題駁得體無完膚，啞口無言，陳志讓律師當日為沈長老之的講話人，不知說了什麼直率的話，那檀家居士老羞成怒，如大雷霆，說他侮辱了檀家居的尊嚴，大聲問他姓甚名誰，陳律師也嚴正地照答，他竟條使官署叫書記把陳律師的姓名記下，好像有什麼神威隨後可以拘捕去



素似的！出手作意料之外的，是那種荒唐舉動躁動了全體律師團的行徑，而採律師全體起立，嚴正聲明他們和旅律師同一意見，只要以書記寫什麼姓名，可把全體姓名寫下，這樣使得那個抓果子的檢察官素博面色蒼白，啞口無言，素是上海人所謂「坍台」之能事！（用國語說來，便是丟臉。）這種地方也可以看出集體團結的力量。

開審的日期，由看守所押到法院，要經過熱鬧街，當局竟把梁山泊上的好漢相待，讓民眾去圍的擁擠，想有翻獄之舉，真是防衛森嚴，四輛


汽車，除史大姊（史良律師，我們都稱他大姊）獨乘一輛外，其餘二人一輛，每輛車的旁邊踏板上站着兩個警衛，兩个警察，手持鎗上刺，真是[illegible]威風得很。沿途街上警察加雙崗。李公樸先生和沈老先生同乘一輛，而且先行，他們兩人都有鬍子，黑白老先生的是美髯，而李先生卻滿嘴像板刷，沿路站崗的警察不知出于什麼誤會，對于第一輛汽車（即李沈兩先生所乘）[illegible]經過時都立正行禮，李先生說他一路忙于還禮，都是為着沈老的鬍子之累（他以為因為他的鬍子尊

蔚！但你们同时却大拉其辫子，认为这把辫子不可不留！

抗战国策既经决定，我们也于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前夕移解到了上海，参加抗战工作。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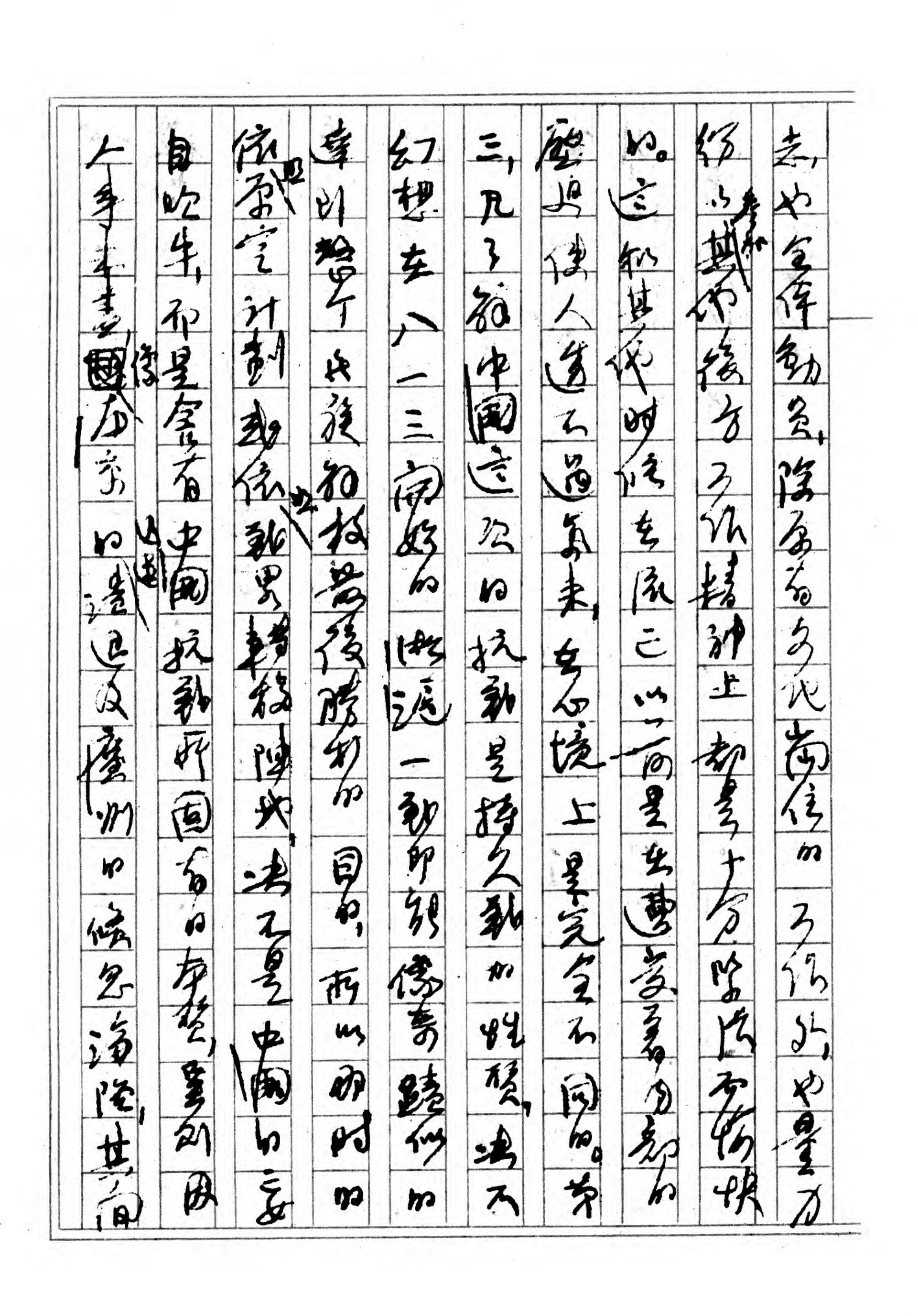
现在要谈到第三次路线了。

第三次路线的心理，和第一第二两次以及以後几次都迥然不同。以後的暂且不谈，上面所谈过的第一次及第二次的路线，显然都和政府当局为敌

矛盾因素存在，是由于各方面的過失所造成的。

第三次合作已是在八一三抗戰發生以後二七年月，國軍因戰略關係而退出武漢，轉移陣地，我們的各地工作及後方工作也隨着國軍轉移陣地而轉移陣地，其情形頗與第一及第二次不同。第一，此時政府的抗戰國策已定，且已付諸實行，全國已經和平統一，兩黨問題業已和平解決，即國共第二次合作正開始實行，全國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同心協力團結禦侮，參加救亡運動的許多同志，不惜冒危險投前線，唯一目的在於民族統一戰線，

實現團結禦侮而奮鬥，到了這個時候，團結粗具規模，尚有許多困難尚待克服，有待于更艱苦更忍耐的努力奮鬥，但就抗戰而論，政府和人民已打成一片，光明的前途，實已顯露其曙光。第二，在八一三淞滬戰爭開始以後，軍民聯席會議，各抗日團體代表與黨政軍當局的經常的聯席會談與合作，民眾運動的相當開展，前後方工作的相當聯繫，都使人感覺到精誠團結一致禦侮的開端，雖則其間還有許多做得不夠的地方。我一面聯絡同志創辦抗戰三日刊，一面參加上述各種工作，即生活書店的許多同


志，也全体动员，除了有多代尚信的不能外，也是力行以参加越南的后方不能精神上都是十分紧张而愉快的。这和其他时候在底层已以前是未曾遇到过的历史使人觉不到苦来，在心境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凡了解中国这次的抗战是持久战的性质，决不幻想在八一三前后的战局一战即能侥幸转似的幸以为每个民族的抵抗必获胜利的目的，所以那时的依照宣计划我们就是转移阵地，决不是中国的失自吹牛，而是含有中国抗战所固有的本质，要知因人手不足国际家的情况及广州的失陷，其間

這些之處是有着不少，令人不勝慨嘆的。由於中國抗戰的整個過程是持久戰，在某種情形下，新四軍轉移陣地，不但不是可恥而且是必要的，所以我們在八一三淞滬戰爭堅持三個多月以後轉移陣地，而隨着深入，也只是為了作的轉移地點，而仍因為內部敵後的通與而深入，其着落是決定完全不同的結果，其作的深入的意志也不是消極，也是在鼓勵積極努力奮鬥，那末這次的深入更當有鼓勵積極努力奮鬥的意義了。

昔日有「英美法擁護存在的」上海相努力存在，旧

軍早已橫行淞滬，而藏身租界的抗日份子無不設法脫身。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離滬乘輪赴港，由法租界碼頭上渡船，由日渡船至輪船間途有一大段水路，又有日本軍官乘小輪接送檢查，我的姓名難保不被人查出，未被注意，上輪之後，見徐仲沛先生和我的妹婿諸彥之先生，我們三个人同一船，他也不寂寞。到港之後，先後到者已有多人，如陳伯莊、錢俊瑞、楊東蓴、沈茲九諸先生等已到，我們住在一个旅館裏，商量路程。

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移到武漢，所以武漢

武漢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決定由廣西經衡陽往武漢。當時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先生適往印度視察，李白二先生在前線督師，桂林由夏威先生留坐鎮。剛巧白先生的隨秘書因事在港，正要回廣西，我們知道隨夏年諾先說託我們這一批人要經過廣西，請電李白請示，李白復電囑予招待，即由隨秘書陪我們同往，這給與我們以不少的便利。

　　幾年的流亡生活，在途中總是要在隱藏的狀態中，這一次人數既多，又是浩浩蕩蕩地公開進發，在流亡生活中可謂別開生面。途中大概要了半个

月經過的情形，我寫有連載的十幾篇文章，總題叫國殤壇，在抗戰三日刊上，後來收在再版集，在這裏不想詳述，值得特別提起的是當時廣西許多男女青年學生——自初中至大學——的求知精神和誠懇態度，以及青年作家們的氣概。

我們由香港乘小輪出梧州，除在香港的招待外，最忙的是回覆青年朋友們的要求。我們除對他們作大規模的演講外，我們同行的一批朋友全班上演話劇的男女青年以數千計，還不夠，我們住的旅館裏客堂裏走廊裏，乃至門口，都擠滿了

無數的男女青年，你們急於要找出許多思想上的

問題，抗戰的問題，難以數言向說，以自己（在反飢餓的）找尋切身

有關的某些種種問題，向我們提出商榷。這許多可

愛可敬的青年朋友，實在使我們太感動了，我們這

一批朋友都一一接談，談至午夜尚不能完了，第二

天早晨（天剛）天未亮，又來了人，我尚未盥洗，下床向門一望，已見房

門口站滿了十多人（勤奮的）。我只得一面洗臉，一面（往往）談話。青

年朋友的誠摯精神實在太令人感動了！

我們經過張家口這幾天，都有這樣的情形，孔桂

林因公事務多，新為忙。我們這一批朋友，我們自己（這一點）

「馬戲班」這並不是說我們會做什麼「馬戲」，卻是說我們形成的一羣，金仲華先生講國際問題，陳休實先生講思想問題，錢俊瑞先生講農村經濟問題，楊東蓴講戰時教育問題，沈茲九先生講婦女問題，我講團結抗戰問題。到一處有許多青年朋友和我們商榷這個問題，討論那個問題，熱鬧得什麼似的。在桂林有一天我和[illegible]先生應廣西大學學生之約，本來預備每人演講一小時至一小時半，但是因為全場幾千的男女同學非常熱烈，大家繼續不斷地提出許多問題來詢問，從一點鐘講到六點鐘，全場空氣始終熱烈異常，

我和徐先生也就意興奮，精愈發好像不覺疲倦。後來談話教務長先生因時間太晚，同學們要吃晚飯，才宣布散會，並說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談。

當時應邀的青年有這樣黨勤與會的求知精神，面為青年的本色，而應邀者向对于教育文化及指導青年的比較開明的路線，也值得我們的欽佩。

當時我們和許多青年談話中，他們表面思想水準較高的，对于應邀者黨部的某些表示不滿，說他們不能了解青年，甚至有壓迫青年思想的行為。他們有我說出各方面講述信念、純是黨勤相隔，

有人說你是意在藐視我們，他們當然不致無故
多加猜疑。不過有一次我聽到職先生講農村經濟
問題，說到農民生活的慘況，有些以相當改善的必
要。至於對中共則有相當改善民生（包括農工階層民生）
的必要。這原是常理，並不足奇，但聽說這位先生在
背後已透有微言，國府認為先生有煽動階級鬥爭的
嫌疑。以這樣政府的眼光來領導青年的思想，則也不要
青年的不滿，都是意中事。這位先生大受屬之微，後
來聽說他的CC派對壓迫青年思想有意奉加屬
之攻擊。這個傳說如果屬實，我們不禁為之痛惜。


当時這位委員多次相陪，說出我們「身戲班」多次「表演」之後，覚得我們所講」經過青年的都重在提出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重在團結全國禦侮，对于中央有着善意的態度，对于国民党也有着善意的態度，好以为異，他說這樣的態度，在他也是可以接受的。我們间接說出這種說法，也「随以为異」，因为我們的態度好像是這樣的光明磊落，大公無私，他何以在相陪多次之後才「好以为異」呢，其意为何可「異」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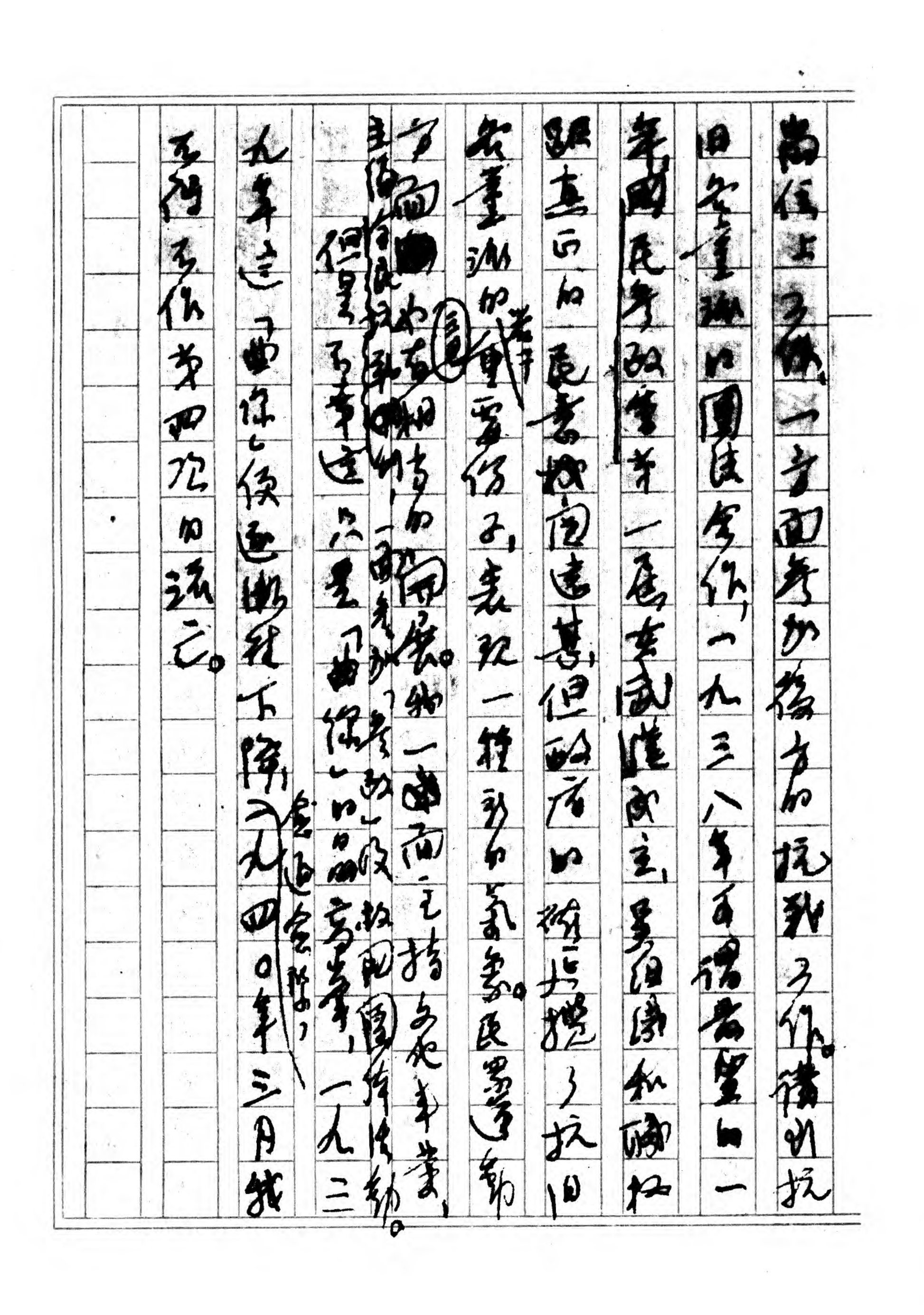
平心而論，国民党当以善意对待抗日各黨派，

抗日各党派亦每每以旧意识对待国民党，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皆以旧意识对待抗日各党派，抗日各党派亦每每以旧意识对待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所谓旧意识，就是不去按照一小个或派以私论，也不是统统以为政宣要务，而要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在政策上不须顾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希望。人民希望团结抗战，即不应维护少数人破坏团结，间接即破坏抗战；人民希望民主政治的实现，即不应拖延推宪，甚至反民主，提倡封建专制主义；人民希望进步文化的发挥光大，即不应压迫思想，开倒车，摧残进步文化。

這樣不但能造成全國各抗日黨派的精誠團結，協助力合作，將國民黨本身也在進步的大道上向前邁進，有著光明燦爛的前途。這是國民黨之幸，也是中華民國之福。真正愛護國家民族應該這樣勉勵國民黨；真正愛護國民黨的也應該這樣促國民黨。

* * * * *

我們這個「香港班」大概于二星期之後達到了武漢。我們仍集体地住在漢口交通街（交通路）全城文具公司樓上。我們一方面各就自己的文化


尚在上海工作，一方面參加籌備抗戰工作，積極抗
日各黨派的團結合作，一九三八年被選當選為一
年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參政員，為堅持民主，與和平救
國直至後的民主運動甚，但政府以抗戰大捷了抗日
各黨派的若干重要份子，表現一種新的氣象，民眾運動
方面，也有相當的開展。他一方面主持文化事業，
主張各民主黨派的團結，一面參加了參政的政治團體活動。
但是不幸遭到只是了曲保的兩方面業，一九二
九年遭了曲保，便逐漸往下降，一九四0年三月他
不得不作第四次的流亡。

第二章　離滬前的政治形勢

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如把政治的進步當作「曲綫」畫來看的話，那末可說這「曲綫」是開始漸漸向上升，雖經儘管迂迴曲折，而漸漸上升却是事實，而其主要的象徵或經緯則為團結和民主。在紙上面已經說過，中央和西南似乎嘗至鬥爭上的內戰危機得以消除，那隱性的內戰亦得以清除了，全國團結統的局面由是建立了起來。這是屬於團結的象徵。在全面抗戰初期，政府即迅速在南京設立國防參議會，延攬抗日各黨派的素孚領袖參加，共商國事，雖此種機構，但因這是要向着民主的初步走去却

是一種好現象。到武漢後，規模更加擴大，內容更加充實，因此將國防參議會取消，成立第一屆國民參政會，更在民主道路上又前進一步，是以國民參政會的組織和職權距離真正民主還很遠。這是關于民主的象徵。

其次，所謂團結並不限于內部的消極的停止，所謂民主亦並不限于國民參政會一個機構，凡是關於民眾運動，包括民眾團體的組織與活動，關于文化活動，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以及教育政策及經費等，都應該和團結及民主發生關係。



当时却由孙先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对于各他的政策和态度，的确较后来的开明得多了。

所以我说，当时的政治「曲线」是「渐渐」向上升的。但是我也说过，一九三八年是政治「曲线」的最高峰，一九三九年便很不幸地渐渐往下降了。到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后的数月间降到最低度，在各协防谈判中有重新扩大内战以破坏抗战的企图。（后来又经过了这悲剧，下文要说到）

自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起，到一九四一年的四五月止，这三四年间的一段有关中国政治的

「曲線」下降的實際情況，我在拙著抗戰以來一書裏曾有比較有系統的論述，所根據的材料比較充實豐富。我在那本書裏特別注重客觀的事實，其客的材料，自信是出以冷靜的態度和科學的心情，何在揭發常與國民黨能虛心存着，容納諍言，使國民黨從開倒車的錯誤中轉到進步的大道上。國民黨是直至翻政的路線，只到從開倒車的泥沼中轉到進步的大道上，中國的政治「曲線」係只會直線上升，而不致下降，這不僅是中國之幸，也是國民黨之幸。我的那本書也許不免直率，但却是本乎這個動機

而寫成的。（是我在一九四四年三月第四次流亡到香港後寫入的）

我希望那本書能做本章的參證[redacted]（資）料，有詳多事實，我係不想在這裏再作詳細的論述。我在這裏只想說明[redacted]和國第四次流亡之前後的政治形勢和由政治「曲線」下降而影響于進步文化的情形。

* * * * *

一九三九年，政治「曲線」逐漸下降，華北發生國共間的「軍事摩擦」，大後方發生國民黨和各級舊官僚的「文化摩擦」，甚至「文化摩擦」這



但是詞還不能改，因有軍事還可以武器對壘一打，要壁壘的方面還有武器可以用來抵抗一下。講到大後方的逃亡文化，一邊則用民權的壁壘，即就只有受壁壘影響了，在壁壘後來道不算來的時候，逃亡的初抗議都無用，壁壘者是可以任所欲為，例行逃跡的。

參抗　舊黨派自然有團體，兩黨有武器，所以「軍事摩擦」只限于團體兩黨。周旋于這件事，何在敵民以學識經長的理想在國民參政會中執筆等事時抵抗國民權「摩擦專家」的單面執筆，

大放厥辞，質对方將領的無數報告的事实，完全抹煞，一字不提。這種偏私的態度，引起了中共參政員的激烈抗議。這種情形，也引起了國共兩黨以外的參抗日主張的健康，因為在此抗戰時期，横的說一致对外，內部的「軍事摩擦」不可擴大，徒然消耗自己的力量，有利敵人，这对抗戰是有不利，是很糟糕的。他們再三加以考慮之後，覺得要提出「議案」，達到和衷共濟的目的，還是要在民主路線方面着手，於是在第三屆國民參政會開會時，決意提的提案首先商議憲政，由國民黨以外的參抗日

7、

臺派的主張。

國民黨能聽這個消息，覺得它是中山先

生遺教中所固有，沒有反對之餘地，而搶先一步地

提出，特由國民黨在去年的黨中的臺灣[illegible]兩由千九

位國民黨員所提一個臺獨黨政的提議案，只

是措辭與界不同，是要分裂國民黨在民國廿年

所以前的國民大會長期不需修改。這樣一來，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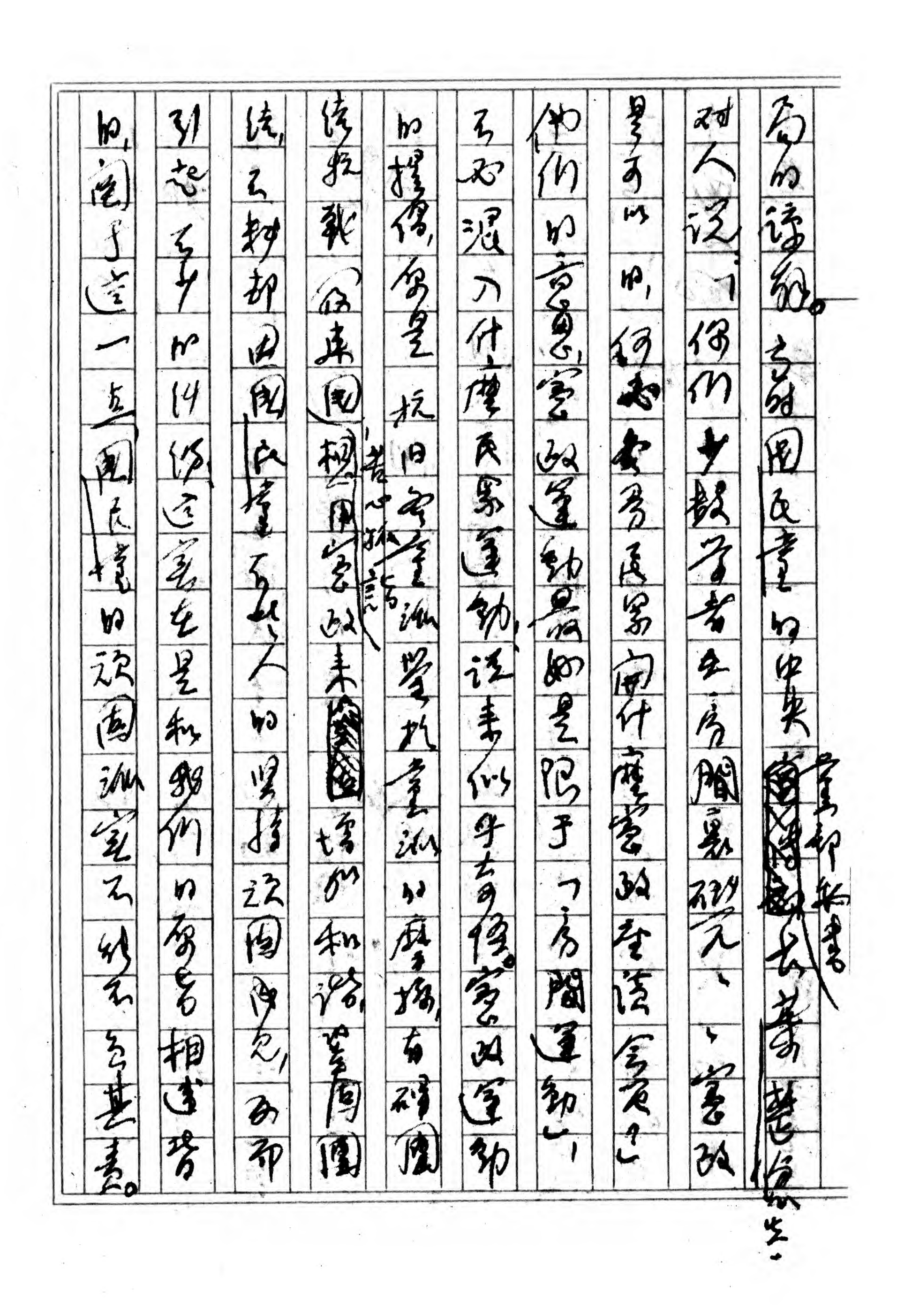
從舊的[illegible]國民大會[illegible]的大部分國民大

會代表，都是贊成未來的[illegible]

樣代也是在國民黨與其他臺派人士所一致

敘述的內容，有許多和抗戰以後的情形全不相同。時期不同，時代進步，所用的辦法可加重考慮，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國民黨當局却始終完全無覺悟，在各方面所舉行的憲政座談會中對於上討論者所保衛的國民大會選舉法組織法！

此外，國民黨以外的各抗日黨派認為在實施憲政以前，應展開憲政運動，由各黨各派實行憲政座談，給與中國民以教育的機會，也只有人民都能夠來關心憲政，憲政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不是少數人的玩藝兒。這一点又得不到國民黨當



為的諾言。方對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葉楚傖先生對人說：「你們少數學者去唱點研究、憲政是可以的，何必要勞民眾開什麼憲政座談會之他們的意思，憲政運動最好是限於「少數運動」，不必混入什麼民眾運動；說來似乎有理。憲政運動的提倡，原是抗日救亡運動與救亡運動的加深擴大，有積極團結救國苦心孤詣，原來國內憲政來增加和諧，鞏固團結，不料卻因國民黨要人的堅持這個見解，而卻引起不少的誤會，甚至是和我們的原意相違背的，關於這一點國民黨的諸領袖實不能不負其責。

* * * * *

関于戰時首都各界憲政座談會所謂的笑話，相在抗戰以來一直中國報紙都有述及，在這裏不想再談了，但有一件事未曾提及，可在這裏附帶談談，那便是中央大學的學生所舉行的憲政座談大會。

當時像我朋友從西安到重慶，看到重慶報紙上有什麼憲政運動的消息，但不見下續，因為你說在西安的及西北各地的報上根本就看不到有憲政這些字樣，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可見當時國民黨當局對于這一運動封鎖的嚴重。但是憲政

西安報紙上新華日報上都看到重慶憲政運動的熱烈情形

運動究竟是根據中山先生遺教的光明磊落的事
情，所以在執政當局及其附近的報，去的地點迄不能
完全加以封鎖，至多只能隱瞞或實行抑壓了控制
的而已。在這種情況之下，民間的團體如學術
機關還時有陰陰澹澹的什麼憲政座談會也隨
隨會出現。最高學府的重慶中央大學便是一個例子。
中央大學前以學生要請邵力子去演講，他去時是
國民參政員，對于憲政運動是非常積極的一份子，
在他所主持的言論機關也常發表過不少擁護憲政
的言論，有些學生想批評，學校當局似乎不便過加

拒绝，但是所谓「三青团」的份子依着了慌，所以同时决定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王世杰先生也来邀请，后来因为王先生断然在那天有别的事，便由副部长潘公展先生出马。潘先生本是老朋友，在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学生联合会有个小型日刊，由潘先生主持其事，我也在编辑部帮忙，他时常要我们这班小家伙编辑写些文章，所以很相熟。后来他在政敲的时候，我也在上海时事新报的编辑，甚至教育同人，彼此友谊很好。我们现在见了面，在私人友谊上还是客客气气，殷勤细待，但是因为政治的立



上有了差異，私人友誼也就降到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地位。那天的情形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他明白，知道我是積極主張民主政治的，同時也明白，知道我是積極主張抗日各黨派應該為着抗戰建國而精誠團結，協力合作，但不應該發生摩擦以消耗國力甚至不存心要一一消滅異己而引起許多無謂犧牲的。我現在不想回述他在憲政講壇上講了許多話在實際上是在反對憲政道路，消滅憲政道路，而極力擁護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我只想樣子他在他的獨裁快結束的時候，實在同睜了眼睛張大了喉嚨，痛仁而勸[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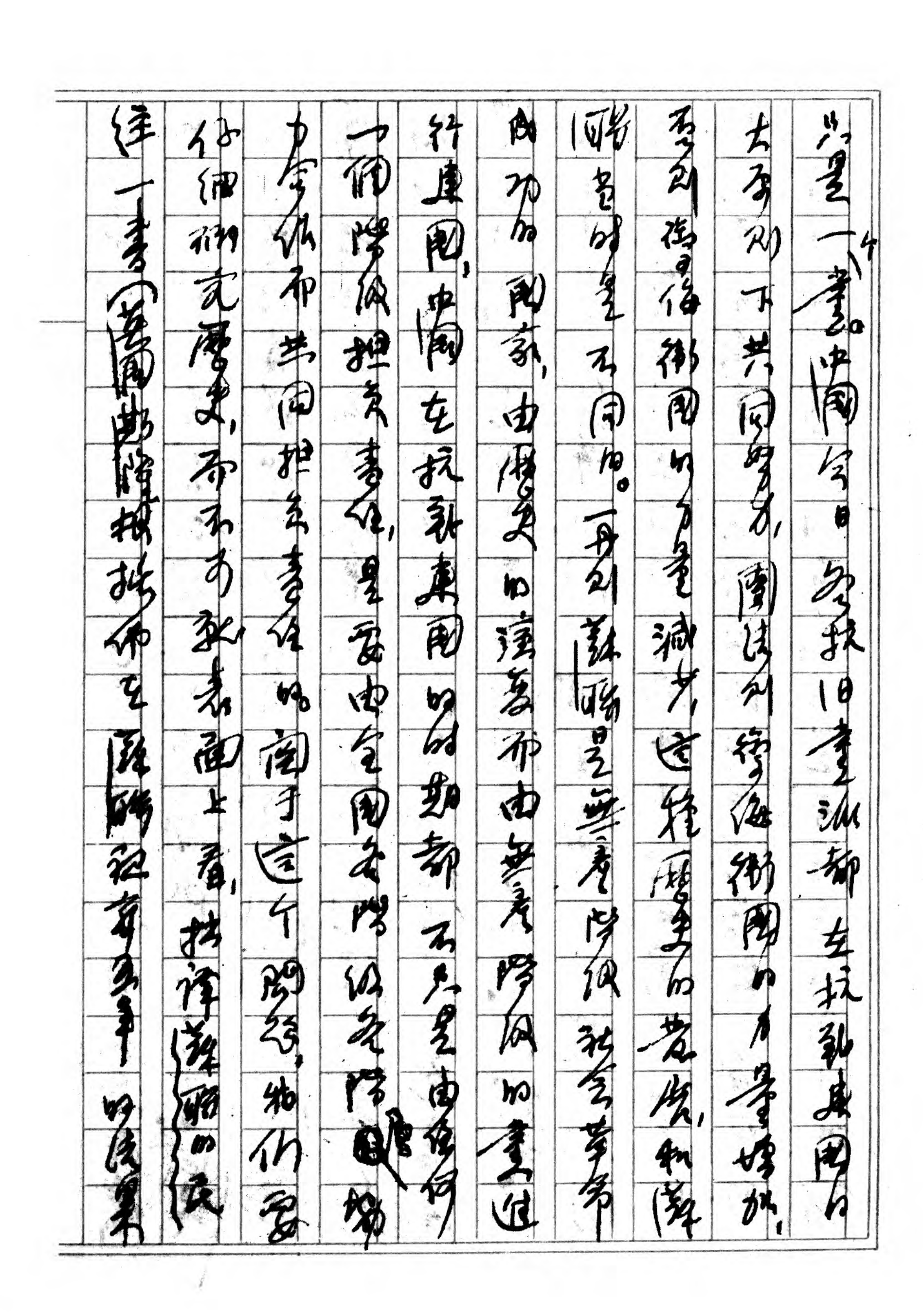


搶著說，大聲疾呼道：「現在有人說蘇聯是最民主的國家，試問現在在蘇聯有的是一個黨，還是多個政黨？」他用盡氣力高聲呼出了這幾句話之後，台下由「三青團」方面的人們大拚命大鼓其掌，即刻也有響應理智的青年們眼看部長高高在上，「三青團」爪牙虎視眈眈，也只有沈默一些僥倖命也。

我知道陳先生個人對我並無惡意，他只是代表國民黨中一部分人發表意見而已。況且我們是在研究問題，並不是在爭辯，所以我心平氣和，繼續發言。

第二个轮到我讲，我上台不慌不忙地先说明哲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研究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大事，哲生先生刚才所说的就是国民党中有一小部人的意见，简单说来，就是要消灭共产党。这是当前中国政治所以不能上轨道的症结所在，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说苏联现在只有一党专政，但是各国有各国的历史，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有中国的历史。苏联本来也曾有几个政党，后来除了布尔塞维克之外，其他党全部陆续背叛革命，其他党中的孟什维克也背叛革命，为大多数人民所厌弃，所以剩下的

只是一个党。中国今日多数旧党派都在抗战建国的大原则下共同努力，团结到保卫国内的力量增加，而到侵保卫国的力量减少，这种历史的发展，和苏联当时是不同的。一开到苏联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成功的国家，由历史的演变而由无产阶级的党进行建国，中国在抗战建国的时期都不只是由任何一个阶级担负责任，是要由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协力合作而共同担负责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仔细研究历史，而不可只就表面上看，据译苏联的民主一书（英国韦伯撰）据称在苏联经过多年的成果



而丟開了對于這个問題去詳細的說明，今後有機會，我在這裏不再多說了。

我站着說我是國民參政員，（不是國民黨黨員，也不是共產黨黨員，）在國民參政會開會的時候，我坐在參政會中向前望，看見國民黨參政員；向左望，看見中共參政員；向右望，看見青年黨參政員，向後望，看見國社黨參政員，他們都是由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延聘而來的，可見團結抗日各黨派共同努力抗戰建國大業，是政府的國策，這國策是適合國家民族的實際需要，是全國愛國同胞所認識擁護的。但是共產黨剛才所說，



國民黨中確有一部分人「幻想」「消滅異黨」，和上述的國策背道而馳，阻礙我們國策所發揮的偉大的力量。

我最後說，我們國[illegible]從實際國內問題的角度看去，是不可否，更有兩點。團結抗戰建國，各黨派須有代表，及國民黨不能置國策於不顧而要消滅異黨，那末即就國共兩黨而論，都有武裝，勢必引起內戰不可，此話說後，全場默然。我認為全場默然，可見大家都默認這話是對的，那末請進一步問，大敵當前，不團結合作而反自相



強敌，它，善于破坏抗战，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此外还有什么可谈。会场又默默。我说会场又默然，可见大家也都默认它话是对的。

大家默认，就有话说，佛之言也，微笑无言。

* * * *

宪政运动的目的原是一齐团结抗日，容纳各党派，同时也就是团结全国以促进抗战建国的力量。成就

提出宪政运动和请求实施宪政，客观情形上是以引起许多青年的热烈和激动抗战建国的勇气，这真是所信者以党员，许以千里，不可不厉于青年的。



但很不幸的是國民黨國民[illegible]

的憲政（憲）政同時，正有華新政協等論調之嘉然使

新學國團民一論而言之，終于流產，而前方的軍事摩

擦，由華北而皖南，至一九四一年的「府后達到所

謂皖南事變的最高峰，後方的「人事摩擦」和

各地摩擦，以致於無所顧忌之舉。

所謂「人事摩擦」，是指國民黨一方面限拉入

黨，否則加以種種壓迫，又打破飯碗等等；一方面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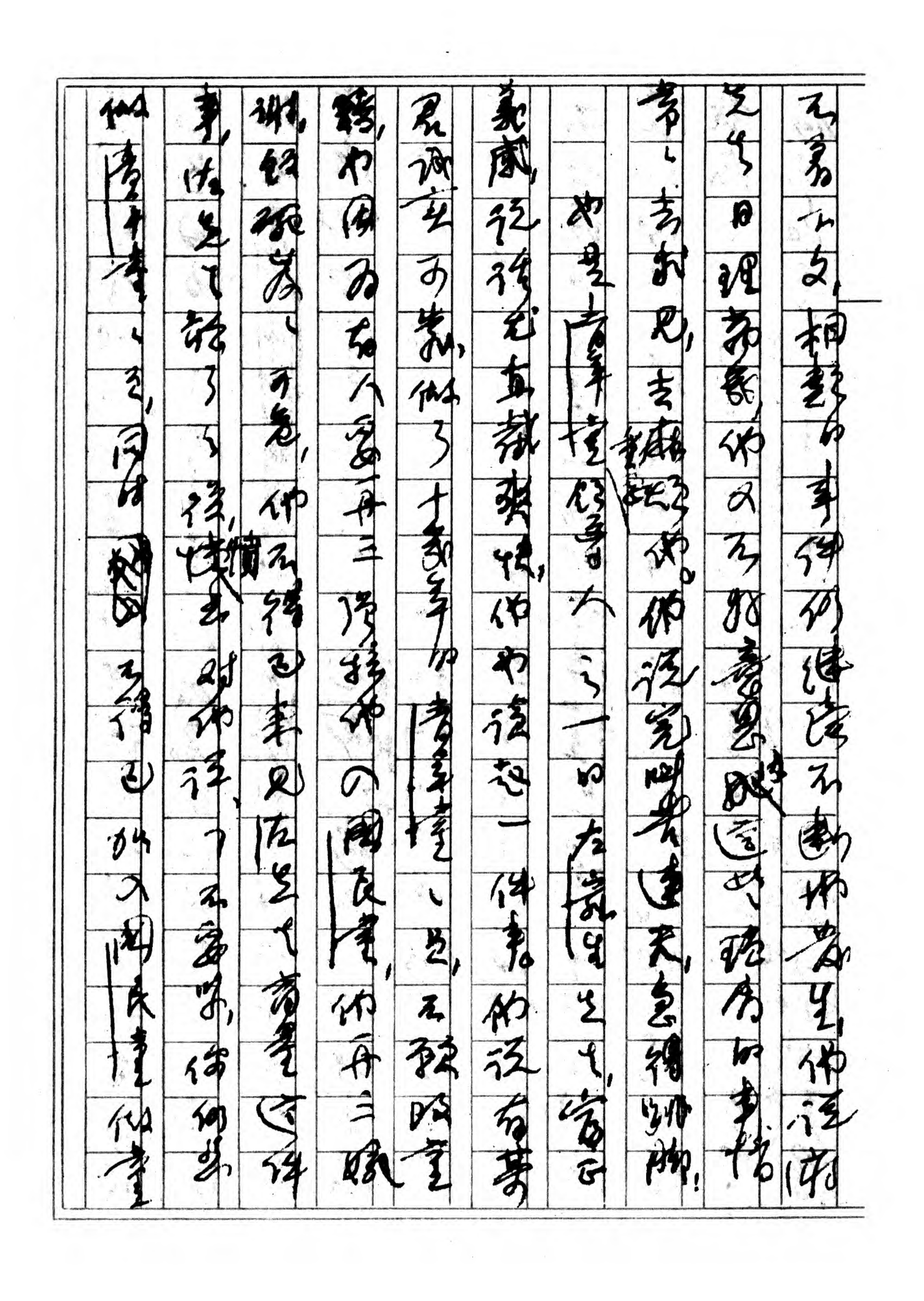
現有其他黨籍者，則加以種種壓迫，打破飯碗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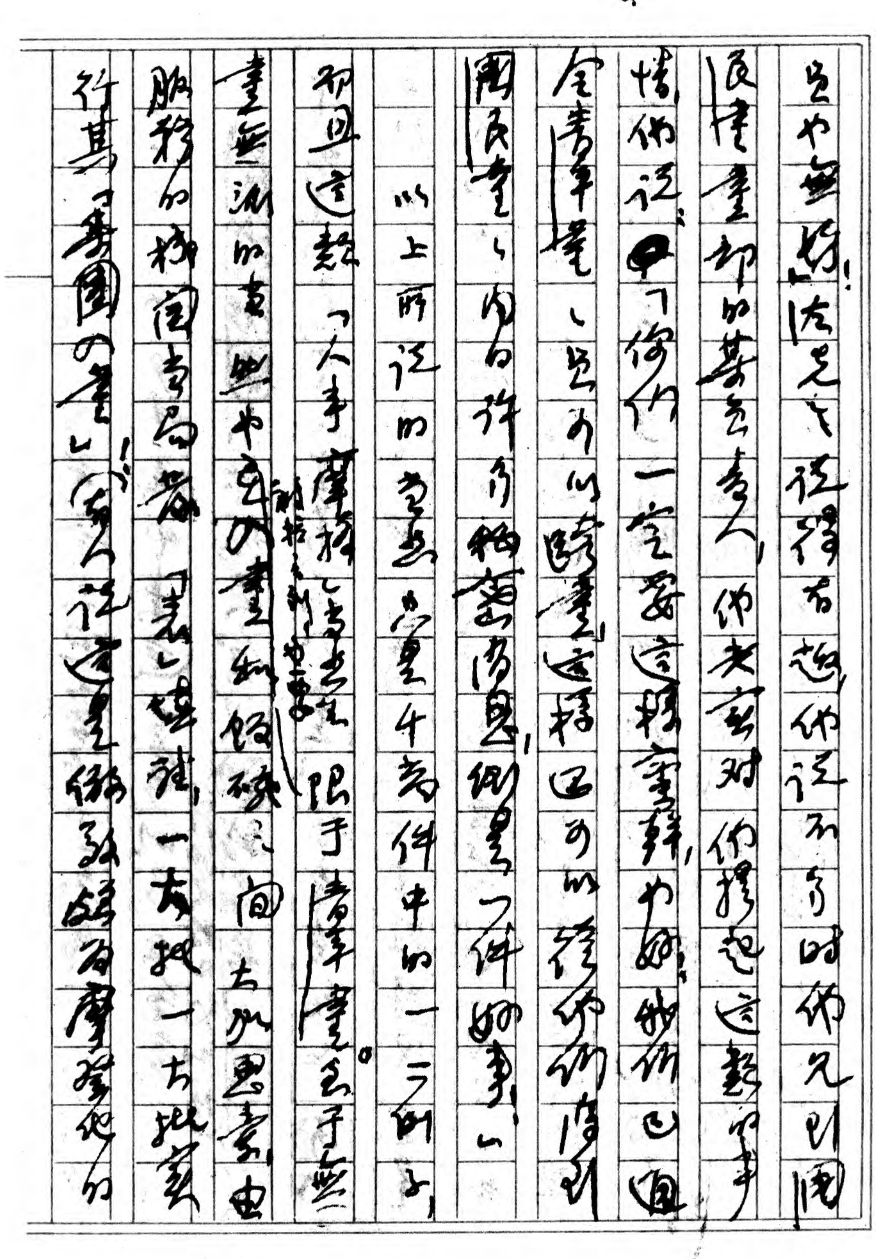
輕擄資產，其輕者由特務分子嫌手一鄉鎮的


嫁,幻一命嗚呼,
中國的政壇,除國民黨外,最有力的要數到中共,這兩「大」「黨派」之外,還有其他像救國會中的有救國的主張和公正的態度,但可無其實施的力量,當然會受廣大民眾的重視,也特別受到嚴重的打擊。國民黨的反動派怕聽到「救國會」這個名詞,硬把救國會叫做什麼「人民陣線」,頗饒趣味,容後再談。此外,青年黨因為在四川頗有「軍系」,也受到嫉視而引起「分子摩擦」或「系統摩擦」。
例如青年黨重要領導人之一的李璜先生也



是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曾對我說起一件事，說有關教員因為有了青年黨籍被發現，便被打破飯碗。使先生對此事甚為常憤慨，他乘着給胡先生見面的機會，把這件事跟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胡先生，並把被打破飯碗的教員的單都給了胡先生。胡先生聽了之後，認為這是不應該的，他說：「我把青年黨的同志當作和國民黨的同志一樣，讓我們他們查明什麼。國民黨的經裁組了這樣有說明的答復，本事還以為不好的了。但是此事並沒有得到正式[illegible]不經此事得





8

只也無妨!總之,說得有趣,仍說不有时仍见到個
民懂畫的甚至于看人,仍未去對付他這些[illegible]
情形說:「倘使一定要这样寫稿,也好,我們也個
全靠筆墨」,只有以讀畫,這樣以後仍舊[illegible]
國民黨的所有許多報紙,便是「一件好事」。
以上所說的事,是千萬件中的一兩件罷了,
初旦這數「个人事業」摩擦(謝[illegible]中[illegible])限于畫家畫于無
畫無派的畫無也是的畫紙破之間,大凡思索,由
服務的標語:「善」「惡」,壞,一大批一大批發
行其「外國的畫」!(?)人說這是偽裝的摩登化的



「集团结婚」、「请客」，这不但要许于各机关甚么单
位许多会议的结论中来这一套，例如安全委员会许
的[redacted]小学教员会议，[redacted]我看到甚至规定
许多会议的书上也有类似之画，像这类书上可以
看到用大字写着这样的标语！但在这种会议里竟也
的新的作风，我们看到了「本年度学校工作」（我自己和
我在许多工作同志所主持的文化事业，要到政
的学习运动，本着且要到那的斩或职这个问题有
关也只是这么个单位中的遗留的一部分开
国民党中不要有错误比较清楚的人，其中


和我們人有誼好的也有，然有一些和一位國民黨
參政員在作密議，一個方面來人對談，接收這件
事，我說作政黨，國民黨也在內，要有得像樣黨員，
這種合理的心理是可以了解的，但是現在國民黨
用錢收買的政客來了山の黨，在各地方鬧得烏煙瘴
氣，怨聲載道，完全人心因為無得其歸。好的政
黨能維持會時，何用熱在某乎像樣作好工作重要，
托孫先生，這樣黨政無甚善，無補於黨何益？徹
使全國人民都個個入黨，那黨的組織也將不擴
上中華民國的招牌，又何必有黨。你承認這種政

法是不對的，但卻輕「於一句話：「總都要這樣辦，有何辦法！」我想諸生之不會免不了此，即是一字說「總就要這樣辦」，若果知道是不對的，大家也應該說話建言，不說只為自身自由空談嘆息而默無言的說話我這段不の耳之言，也只有默無一言而已。我醉中想這還是「鏡神脫殼論」的遺毒要即表現出來罷。

也許有人以為這是「清誠無意」的一種好辦法吧，因為大家都得了「閒良意」，你何「無意見」却沒人做意見，豈不等于「清議」了嗎？這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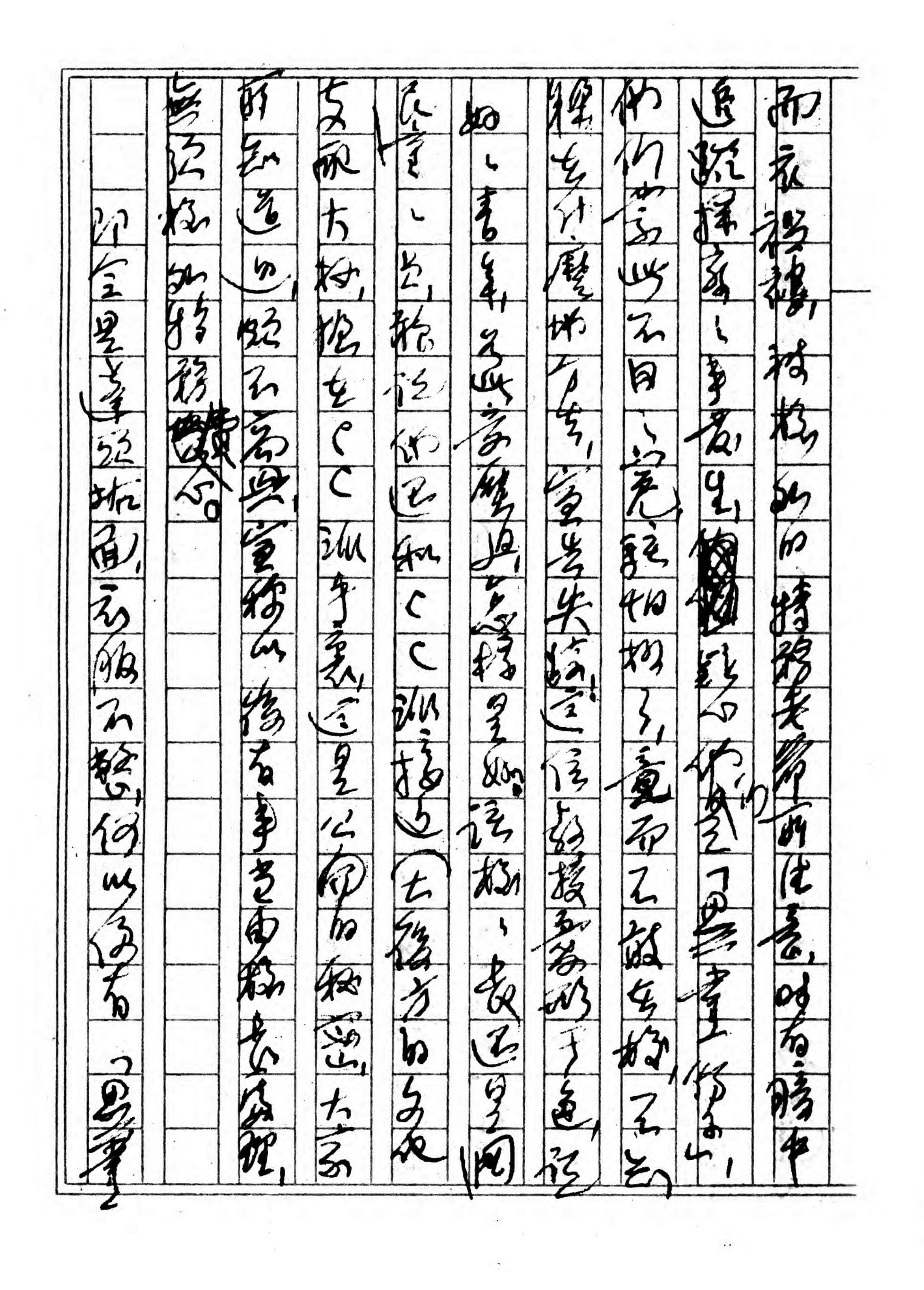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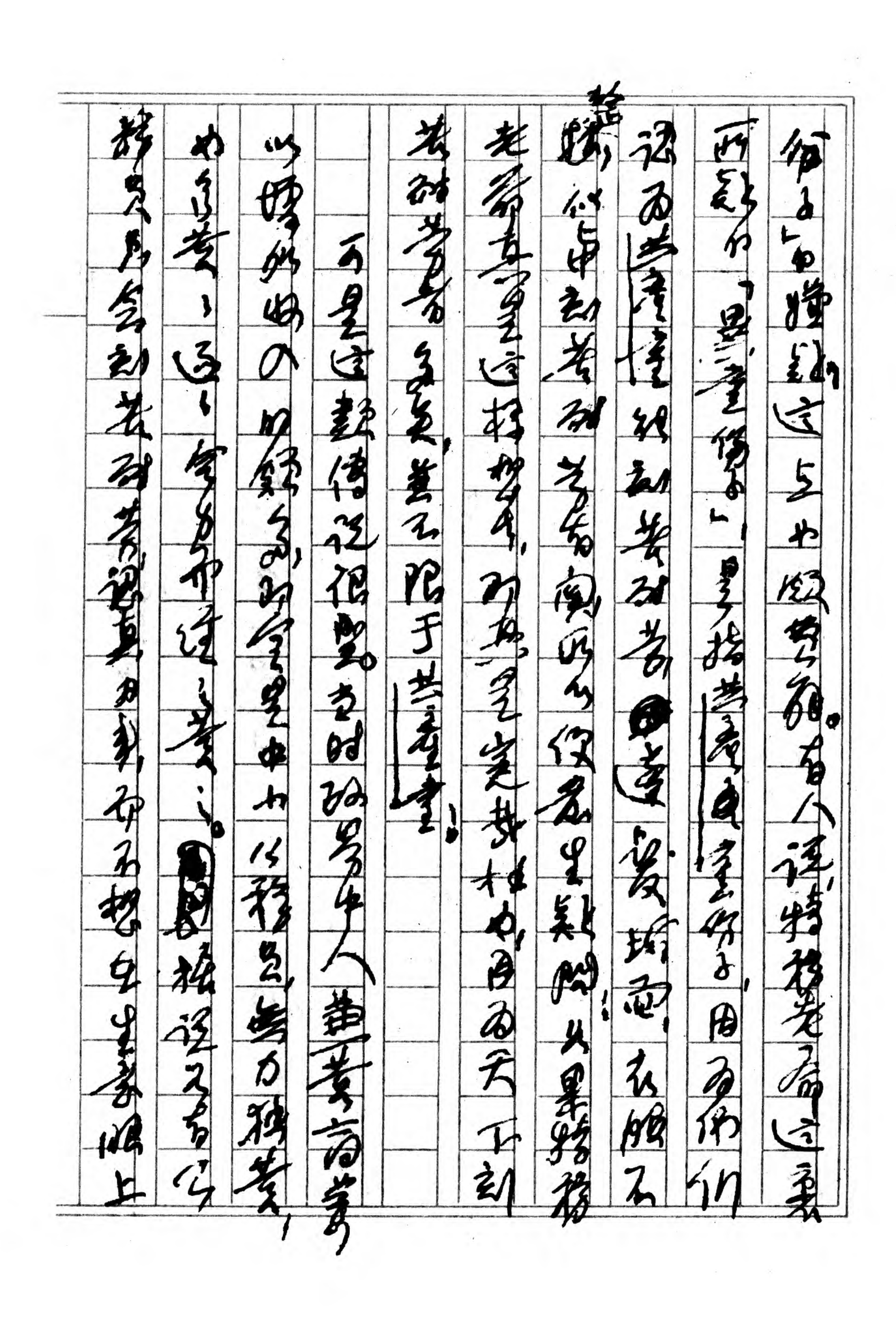
是想入非非之談，事實上的效果不大，不是很明顯擺在人人的眼前嗎？

* * * *

「人事摩擦」是不該有的，也是不好看的，但是由于政府「曲線」的逐漸下降，「人事摩擦」亦隨着愈演愈烈，不但要避免摩擦而且還心生暗鬼，動不動就疑心你是什麼「思想問題」，那就太麻煩對付不了。

「早稻田大學」的某教授告訴我，有個該校的東北籍同學，平日很勤學，但因不修邊幅，常常被警察、





衔子「白猿猴」之上也假安眠。有人说，特务老舍这里所说的「黑奴偶像」，是指共产党分子，用马佛们说为共产党组织者和者所发掘画，衣服不整，以中组者和者有关的役应生疑问！如果特务老舍在这里之种故托，则亦是实在其中，因为天下艺术学者多矣，甚不限于共产党！

可是这题倘说很对。当时路易中人黄黄芳芳以增加的の内容的分别是由中的以将其，无力独黄，如自黄之，道之会分布连之黄之。据说又为公静然为合剧艺术学者说真的为私而不想出来家脉上

講些什麼快，那也要被指稱為謬論而且有「思想問題」

了，禮是非常多餘之之！

陳夢家耐著無言地快著了幾步，他們之也

要住在思想行動。尤其思想，特別注意保持自由書報。

中共政治學校有個湖南學生，因為在地上撿起一張[illegible]

了一張新華日報，[illegible]宣傳用紙而且在冷天隨便

地扔在上面，受到公審判，說他有意侮辱，[illegible]

在黨上作的出了很嚴重的處分，實際上是連累去民代表

言論，那個學生無可奈何，只得向祖國的湖南回家

借些衣服，[illegible]

宗教，但却经国民政府（因文境所限述之外）准予注册登记发行，所登的言论

况且也都经过了（国民党所组织的）审查的案书，都是受控制的。照理它应

向发行，证明是合法的教派，而为人一再且

是偶尔被发现一些教派的人，一部份受到政府严

厉的处分，在法律上言之是说不通的。（以上所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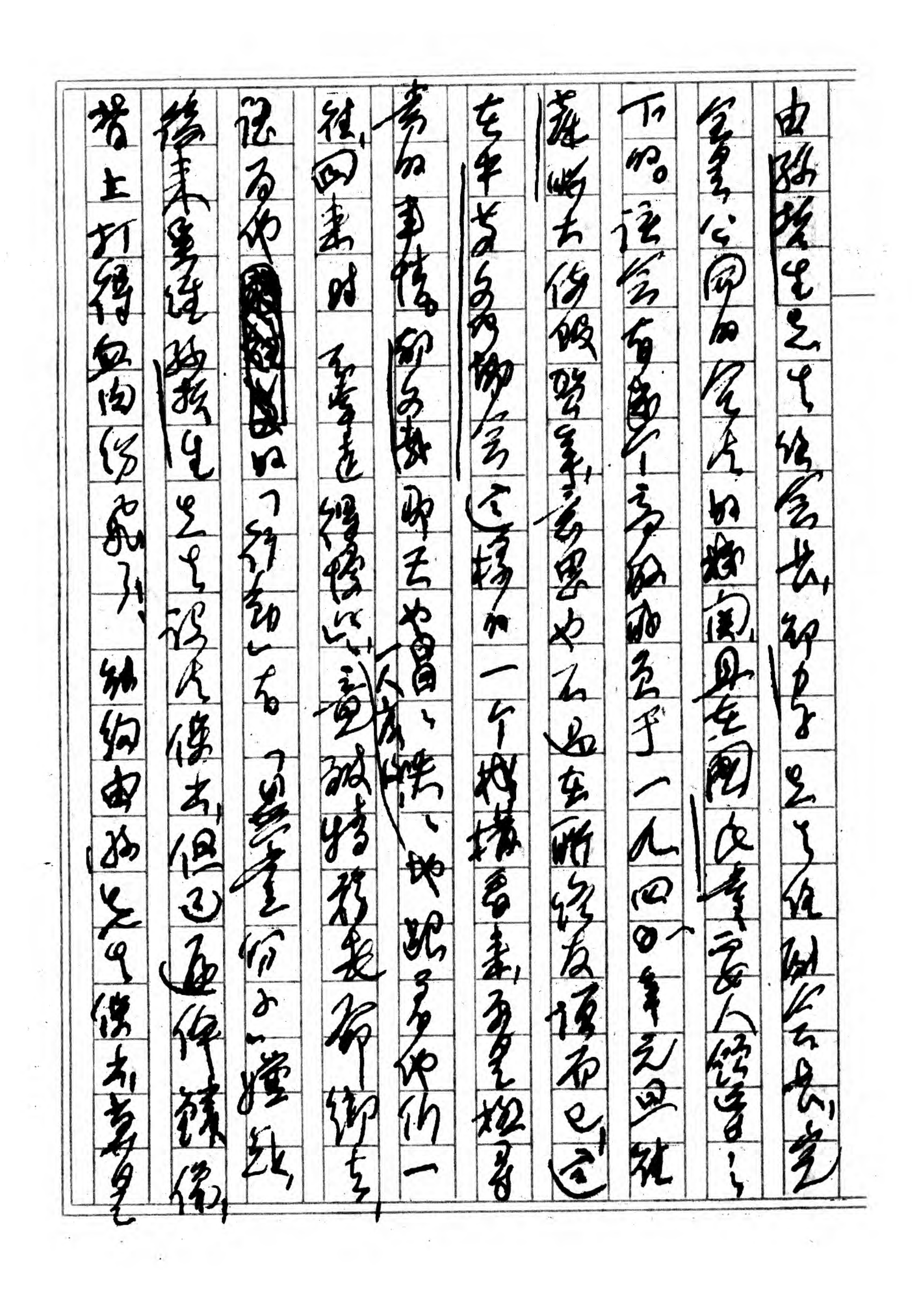
事实，是被御用的青年亲自告诉我的。）

请以行动，去重实专辑传一时的中华文化协

会编译员，却文教事件可作一例。中华文化协会及

同其他国中华心道等的相类机构有同一目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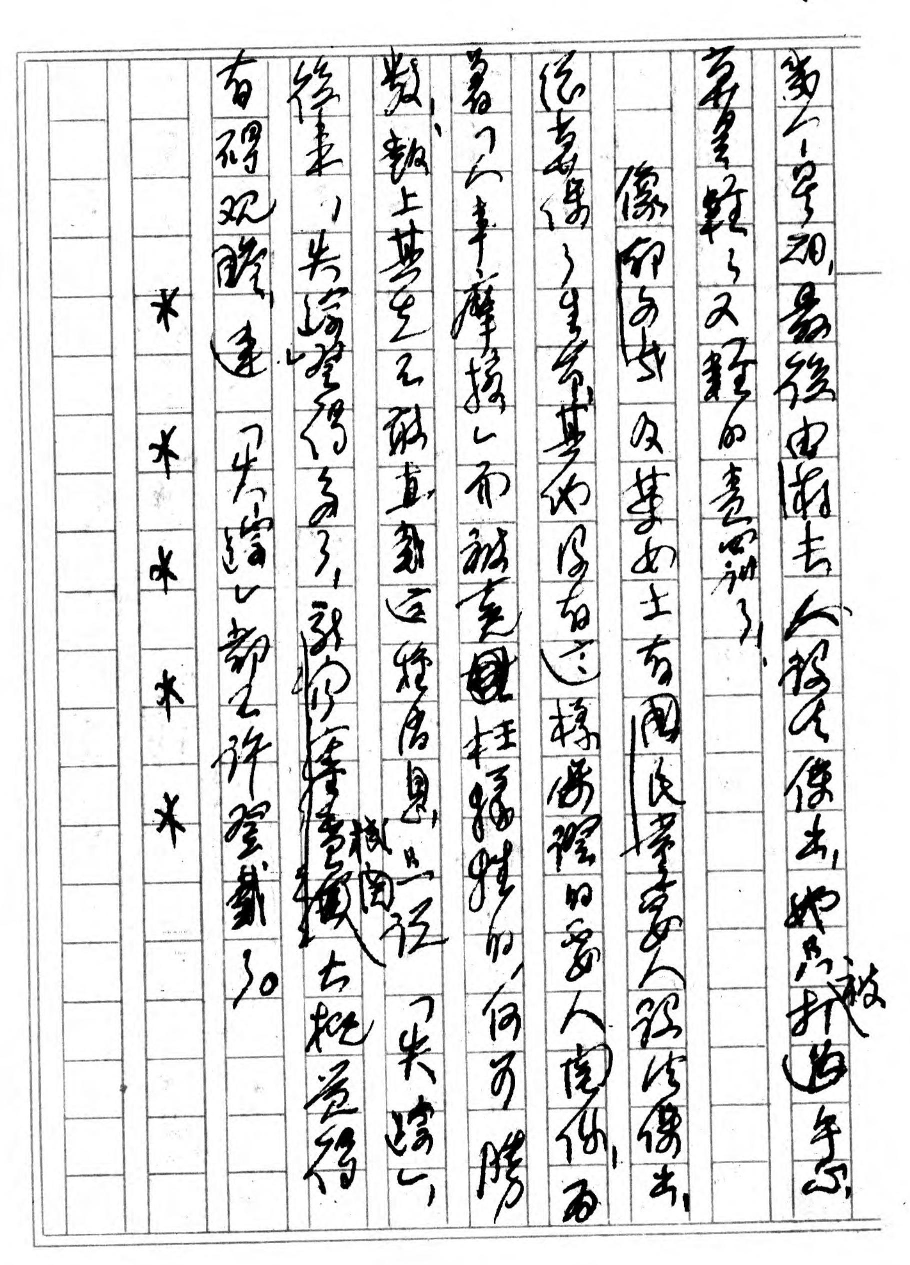
为在沟通两国文化及增进两国邦交的。这会是



由路接生先生給會去，那多多先生往附公去，黨
黨公同的人的辦閑，且在圍內嘉賓人錢等等
下的。該會有無一事的概况于一九四四年元旦就
蘇州去修設聯系，要聯也不過在所修及積而已，
在平望鄉協會之下搞了一个機播音來，否還極有
看的事情卻不多，那是也算一人嘆、地跟了他們一
往，回來時，不要走經綠綠的、盧被搶劫一番，那就去，
說了他[illegible]的行動也有，可無量的小燈籠，
後來黃鎮路接生先生說他僥幸，但這位仁鐵偽，
背上打得血肉狼藉了，結納由路先生僥幸未曾



[illegible]上國不敢望一二消息，他也只得飲泣吞聲，
不敢聲張。但是這件事卻[illegible]
去有去人所領導的[illegible]婦女[illegible]會有一
但青年婦女[illegible]婦女，對於這階段的部分抗屬
（抗戰軍中的家屬）的工作也常出岔子，不甚普遍，[illegible]
說有十分之七八的抗屬都[illegible]她們都有
謀生的技能，她們[illegible]所[illegible]
她的苦處。但是她[illegible]
書[illegible]，有一天，[illegible]她如女
事[illegible]



靠人口學的，最後由幹部去人都不像去，也只被挑出手心，

著書輕之又輕的書而已了。

像郭沫若，及其女士有國民黨要人說像出，

後者像之生前其他以自言，樣樣總的家人說像西

著了人手摩撫之而猶竟國柱棺材的，何等勝

數，數上其它不能直書，這往房是，只說了失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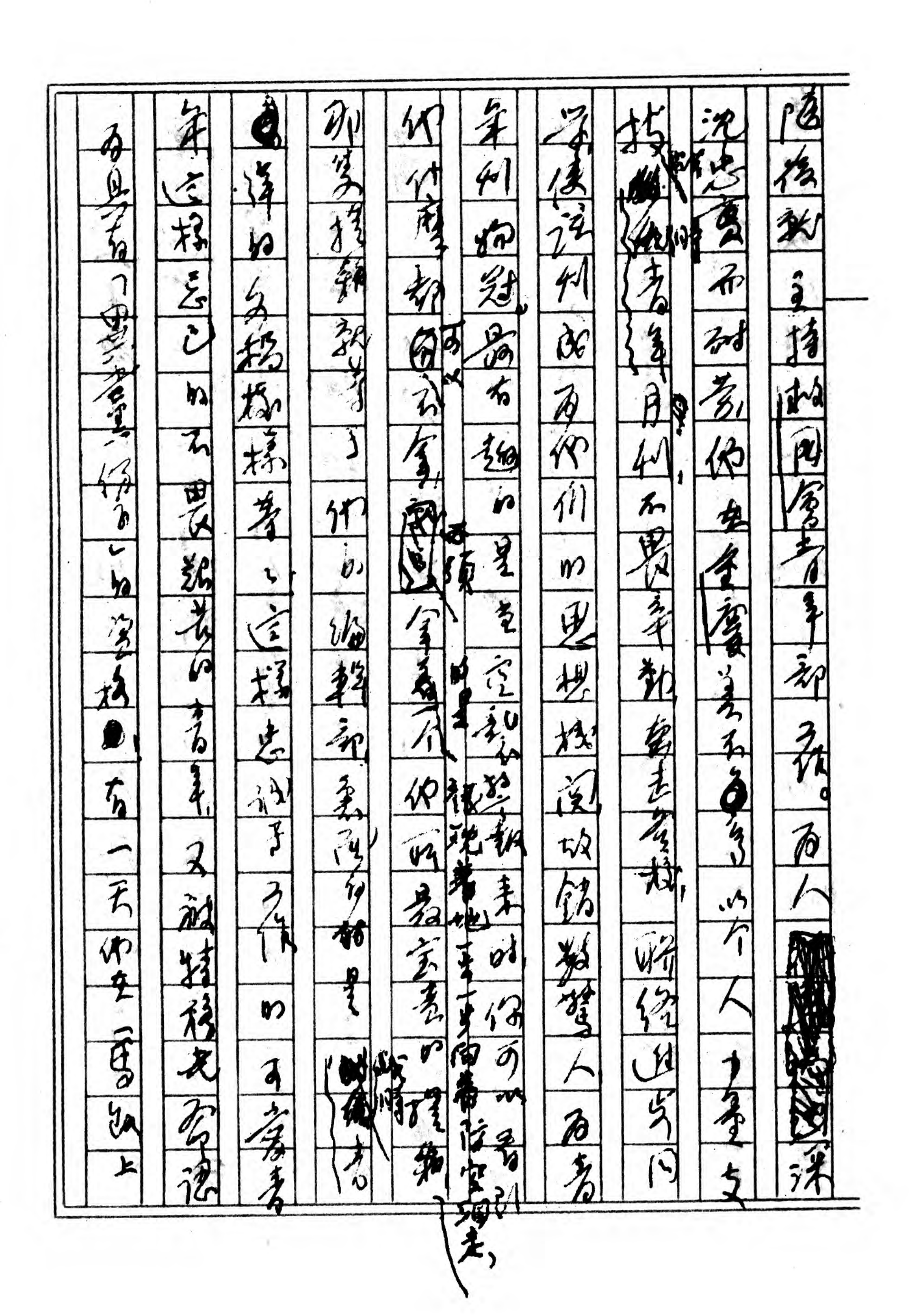
後來，失蹤者得多了，就用樣樣樹圍大概是得

有得觀點，達了失蹤之都去說登載了。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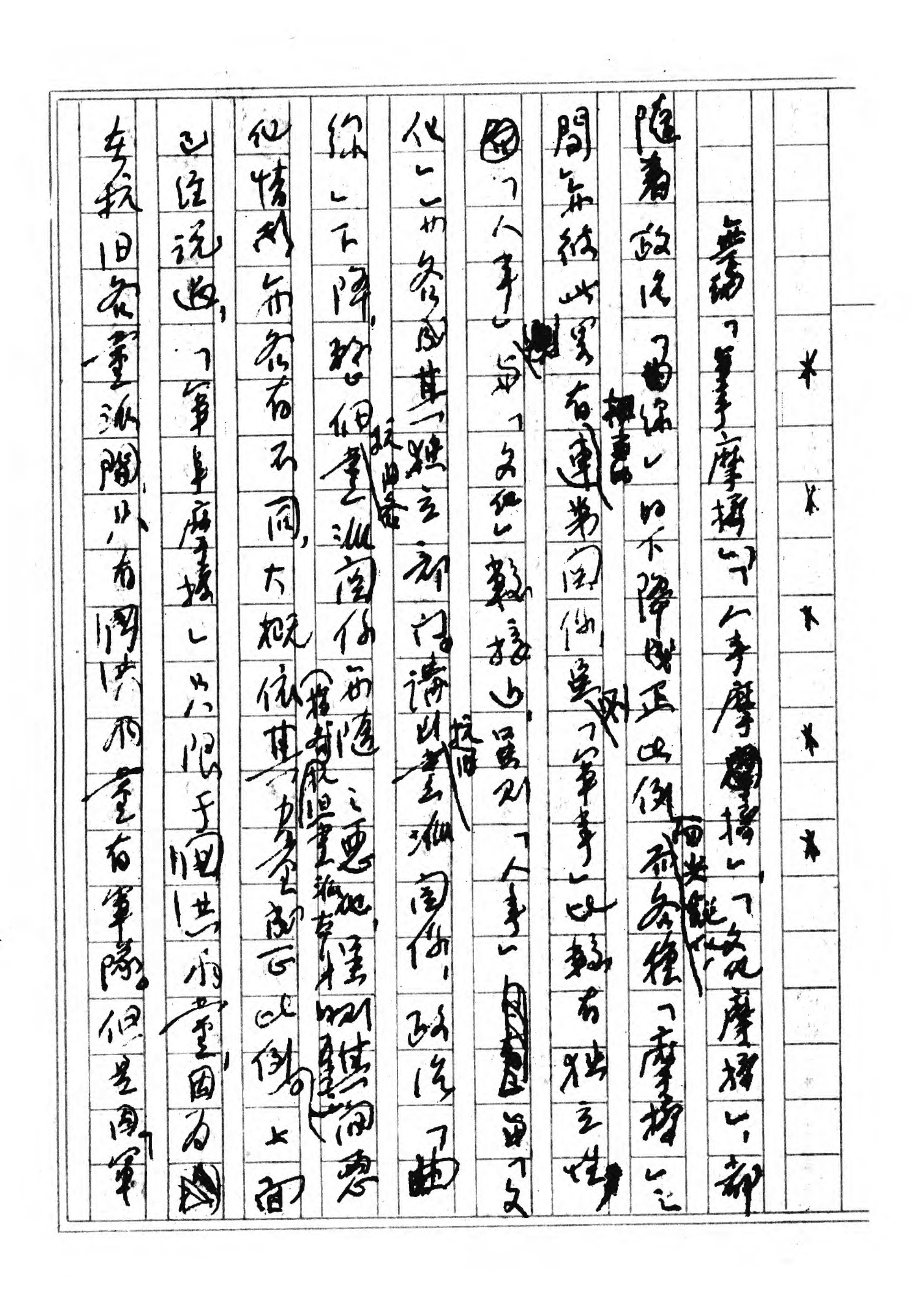
「人事摩擦」似乎比「軍事摩擦」和平，「文化摩擦」似乎比「人事摩擦」和平，其實是同樣地殘酷，而且要普遍化。「人事摩擦」不僅因「意向越軌」而折被致殘，斷絕生路，往往，因「思想」餘之「關聯」而被抓入獄，斷送生命，父母不得而知，妻子無從探問，死得不明不白，其嚴重性往往非「人事摩擦」四字所能形容其萬一。

「人事摩擦」往往和「文化摩擦」連鎖在一起。說到這一點，我想起最可敬愛的一位青年朋友，他叫鄭代鞏，原來是全國學聯的一位健將，


陆定一主持的团会上有干部主张，有人[redacted]深
况忠实而耐劳，他在全靠着不负多，以个人力量支
持[illegible]青年月刊，不畏辛勤，奔走筹措，谢绝过问
学使该刊的面向他们的思想认识改错，数繁人而看
采刊物的，最有趣的是在空气紧张的来时，你可以看到
你什么都可以不管，而须全[illegible]，你所发表的[illegible]
那笑语锦辞等了，他的编辑部里所分析是[illegible]
[illegible]详的各稿样等，这样忠诚于工作的可爱青
年，这样忘记的不畏艰苦的青年，又被特务老爷
看上了，思想上有问题的嫌疑，有一天他在一张纸上



被一个特务老头拿出一枝手鎗瞄着他去，和他
後来闹出一场。那个老特务拿出的时候，他很从容地
總把他傳给相關同志，令人聽了很[redacted]深的話，他
囑同志們放心，他寧願一死，絕對不會做出對不住
同志的事情。聽說特務老爺們也很佩服他的能力，
所謂不論意的，原是他有一點業節子的懷疑，後（我們得了這个消息，都為這位同志而哭了一場）
來他們決定[redacted]把他槍決，可是鄭代華的本領真大，
不知怎樣竟被他逃了出來，我們大家得到了這个喜
信，都高興得說不出[redacted]話來，他自己也為中國保全了
樣一个有為的青年，真是功德無量，可說[redacted]之至，可喜可賀到，



* * * * *

無論「軍事摩擦」、「人事摩擦」、「文化摩擦」，都隨著政治「自由化」的下降成正比例而尖銳化，而各種「摩擦」之間在彼此間有相當的連帶關係，但「軍事」比較有獨立性，因「人事」與「文化」較接近，且對「人事」與「文化」，而各成其「獨立部門」，請比較無關係，政治「自由化」下降，但與其無關係而隨之惡化，但其間惡化情形而各有不同，大概依其力量之正比例上面已經說過，「軍事摩擦」只限于國共兩黨因為在我們舊黨派關係只有國共兩黨有軍隊。但是因「軍



算摩擦」使我從「曲線」全盤下降的惡影響卻不僅限

「于國洪」兩案。例如一九四九年的下半年華北國洪兩

案」，算年摩擦尖銳化的時候，後方「人事摩擦」

隱着白趙兩案，中共的「黑黨份子」固然首當其衝，

青年黨的「黑黨份子」也不見得能夠倖免，自在其他（上面所述 [illegible] 典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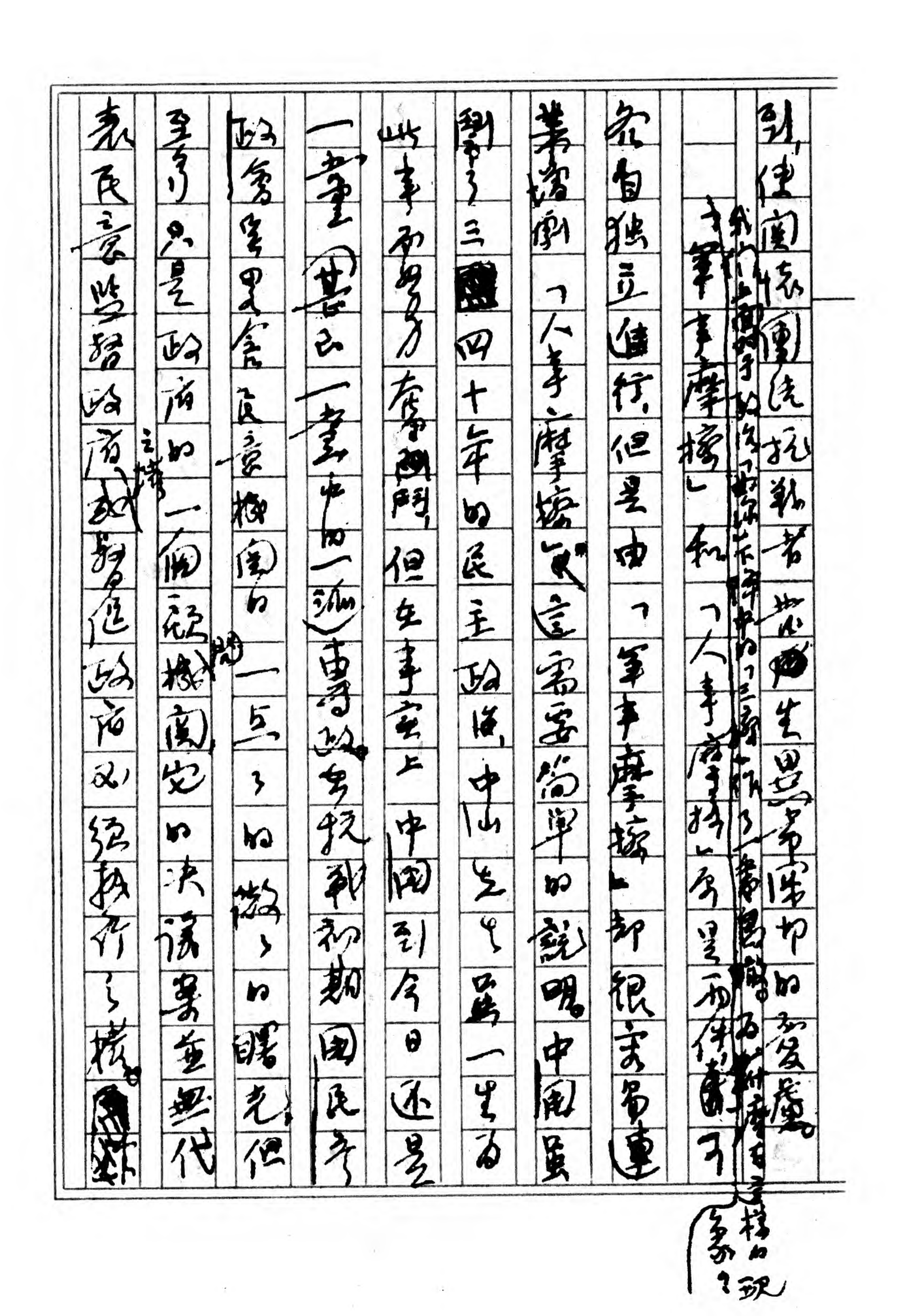
幹着愛國工作的積極份子也被捲入，後乃至無

黨無派被疑為有黨有派的無黨份子，都在強反

逃無可避。這種情形，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皖南事

變發生時，就更甚於厲由「算年摩擦」而變

近為大後方「人事摩擦」，我于隨處可以遇


到，使國家團結抗戰者，共同負其責，實是切的發展。我們上面所說的抗戰中的「三角」關係……
「軍事摩擦」和「人事摩擦」，原是兩件事，各自獨立進行，但是由「軍事摩擦」卻很容易連帶到「人事摩擦」。這需要簡單的說明中國國民黨了三[redacted]四十年的民主政治，中山先生為一生為此事而努力奮鬥，但在事實上中國到今日還是一黨專政，甚至一黨中的一派專政。在抗戰初期國民參政會容界合民意機關的一點了的微了的曙光，但至今只是政府的一個諮詢機關，它的決議案並無代表民意監督政府，或督促政府必須執行之權威。

在抗戰初期，政府延攬全國抗日各黨派若干重要份子加入該會，雖有上述職權所限，但溝通各方意見，主持正義，尚為國人所重視。隨後逐漸演變，至第三屆以後，成為CC派所操縱的御用機關，等于袁世凱的參政院。至於執行方面的政府，那更是單純的一黨專政，即在形式上也沒有其他抗日黨派參加其間。——民盟因出於此，民意機構既有民意可言，政府更不如說由[redacted]國民黨的政府擴大擺脫當時的這一個風氣蘊藏的時期，即周恩來先生任政治部副部長，三得其附到那時的規定

时期已经过去的了。

中央政府既在一党专政之下，军事委员会当然也在一党专政之下，所以何应钦以属于国民党将官而负教育军事的时候，完全推崇国民党在华北的摩擦专家的教育，置其他方面将领的教育于不顾，完全抹杀一字不提，它是根据[illegible]中共八路政治部转述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报告以来实，专门捏造去抗议，想要何民有所偏执，不要我们也不会知道的，是不适性的，因为他在形式上是代表军事委员会乃至中央政府向国民参政会报告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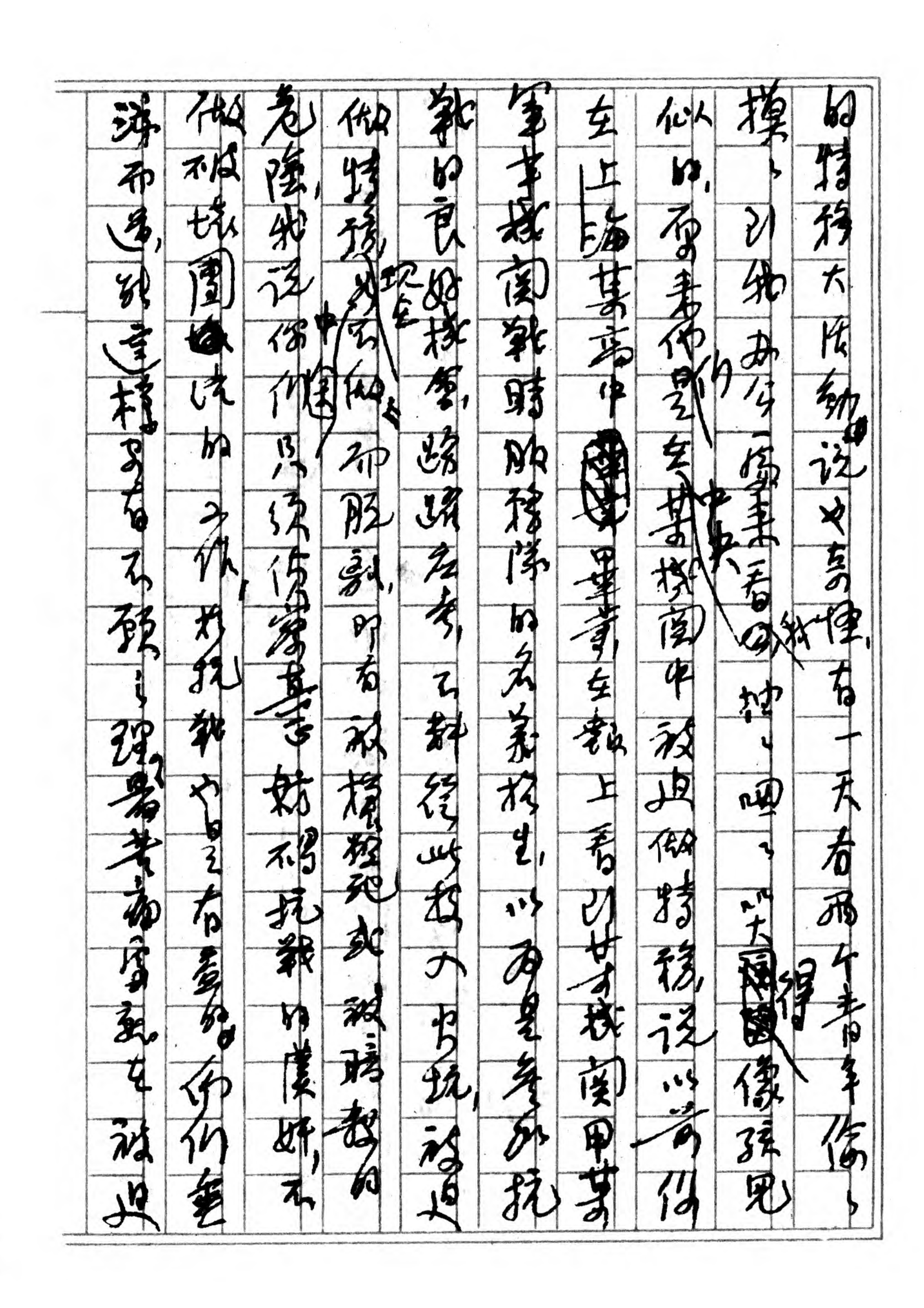
事，而在实际上却是反对国民党的立场。

在这种情形之下，以「消灭异党」为「主策」的国民党及其所领导或支配的一切机构，对于「军事摩擦」的看法当然很简单，那就是万方有罪，罪在对方。在其他方面——其他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在团[redacted]结御侮的立场，看到「军事摩擦」总要审慎判断，详细探询事实，设法追踪，有的还要奔走呼号，设法调解。这样爱护团结抗战救国家立场的实际态度，使共、[illegible]了表面上的

乎日本在民主政府而在實際是在民主國民黨「右派」誠是「黨」政策的某些人！（中山先生遺教青年少進青年的實物，我們不能因這些人的不長進而一概抹殺！）這樣一來，像經上便很容易被人輕輕加上「異黨份子」的罪銜，於是「南方的」大「軍事委員長手擒」便又以快速度，若要追為大後方的「人事麻手擒」，有許多無辜青年年便犧牲在特務老爺的辣手，紛紛「失蹤」！

皖南事變發生以後，戰時首都的「人事麻擒」真是厲害到「極」點。各機關都密佈着的安諜館

「人事麻擒」和「特務偵組」是[illegible]生子。


的特務大隊動說也奇怪，有一天看兩个青年偷偷
摸摸到我办公室来看我，想想，嘿嘿，笑得像孩兒
似的，原来他們是在某机關中被迫做特務，說以前他
在上海某高中畢業，在報上看到某机關甲某
軍事机關執行招聘服務隊的名義招生，以為是參加抗
戰的良好機會，躊躇左右，不料從此被人出賣，被迫
做特務，現在中途不做而脫離，即有被槍殺或被暗殺的
危險，我說你們只須依你們真誠，不礙抗戰的良好，不
做破壞團結的工作，於抗戰也自有益，你們無
須而去，能達到遠揚守在不願之理，暑黄蔚霞就在被迫

路裏碰到一黑衣青年人，被殘無辜青年，若

若求救于我，我說明要脫離黃浦他們目前的情形，除暗地逃亡

外，想不出別法，逃避的話，須相當充分準備，且須另有機

密，否則有喪生命之危。他們談着要求保存秘密，並為

證明起見，還帶了一本千餘頁的特務講義，哀

我無辜青年，不知何時能衝出這黑暗牢獄！、

除校園外，聽說街頭巷尾，也有特務密布，除特

務有外勤還有特務外，還即一個特務監視一人之一系

統後第二系統還有第二個特務接下去

直接監視各系統上部的特務轉接特務監視，保保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 * * *

據可靠報告，我也承認他們不棄，又派有特殊的特務監視。但是後來似乎並沒有收到多大他們所希望的效果。依據犧牲青年的成例，他們所希望的效果，最好的話是發現我有越軌或違法的重大的罪狀，作為他們的藉口，那末一刀兩斷，一命歸陰，還落得個法治精神的美名。但在事實上我並沒有越軌或違法的任何罪狀，所以特殊的特務們對我一天跟到晚，從這條街跟到那條街，也跟不出什



麼來，我不是沒有活動，我對于國家民族的血沒有冷，是滾燙着的。無論在國民黨政府中，（國）的推行大會的時期，在國民參政會外，抗日各黨派（其）中亦有主持正義的無黨無派的人士（都是國民參政員），代表後組的約十六七人，為了調解國共摩擦，（在）國共摩擦最尖銳，尤其是軍事摩擦，如兩方發不言，我不辭擴大，好得國共抗戰未開（述）我無次不參加，無次不[redacted]（自）隨諸着戰之後，竭盡心力，不辭勞瘁，以期有所救濟。（因）所謂調解者為國共摩擦問題，故國共兩方都不直接參加，直接參加者僅為國共以外的其他抗日各黨派



有所建議，為以書面詳述，由全體負責簽字，[crossed out]推代表持與中國民權的路先生及中共在滬代表人周恩來先生徵求同意。

熱心調解國共摩擦的民參政員，不乏其人，抗日各黨派的領導人及無黨無派的公正人士都有，言論家無可否認，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認為抗戰期中全國團結禦侮，但是我一參加調解國共摩擦，國民黨的反動派便振振有詞，說國民黨拉我做參政員，我卻幫助共產黨，他們如隱把參政員看做裝飾品，一旦參政員，便宜感恩圖

教，助著為惡，使盲著眼睛，鼓勵你們「消滅異黨」，置國家民族的命運于不顧！你們自己也許這樣做慣了，為什麼不要眾人睜開眼睛把人看清清楚楚。說得去這樣歌頌的話，騙了全人三日吧！記下來都污了我的筆！

我們行為是光明磊落的，與人以共見的，我們參加調解國共摩擦，和其他十六七位國民參政員共同進行的。在戰時首都，要以調解國共摩擦為罪名而加以逮捕是不可能的，要尋覓其他罪名也無隙可乘，於是製造一件去年[illegible]，一件[illegible]

段一号

奇聞之一：有一天，有一位在軍委會政治部第一廳任事的某女士很憂慮地跑來見我，說她們聽到第一廳會議上討論的將某位[illegible]第一廳、長通商討了何處理我，決定要處死[illegible]的女共黨，要我到附近鄉間偏僻地方閒遊的時候，裝做匪徒出來搶劫，把她刺死。某女士原在文化界服務，為人很忠實，而很多朋友所知道，她再三叮囑而別。我平日少閒，因此也很少到鄉間偏僻地方閒遊，所以在此刻今天未被「搶劫」，未來「刺死」。

奇事是戰時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

（註：一九四〇年秋天）

後會每讓說長何應欽氏通令，謂據報我私沈鈞儒沙千里諸先生將於七七在首都暴動，又云鈞儒再于雙十暴動，慎為防範云云，（誰被誣為罪魁也誰不清楚，常好事者之誣推年高德劭的沈老先生，罪魁未便無君睦推翻尊是那人被誣不妙）！我們三個人親往訪問何氏，他親自接見，說得非常好聽，他說：「我們深信諸位先生決不會這樣，這一定是漢奸的謠言，」他說罷又此說，但後來還是一而再而三發出同樣的通令！（因有此機關亂來的動，朋友通報我們加關于這件事在抗著抗戰策有較詳敘述）



那「學問」的用意很淺顯，但要目擊那個，不可以無從下手。那古的事却存心更辣，異動了罷，分身前無窮不可，此無不一了百了，我和議先生都是奔走呼號團結發起動的一人，在反動派認為在該身首異處，猶可說也，無緣無故指個W先生無先無其然，後來經顛覆「內幕」者道破，說CC派要把漢個人騰黎那裏所將沒經營的生產合作社搶過來，W先生是騰黎最得力的一位助手，所以也想請他身首異處也。

空氣既然放出，後來但有雷聲而無雨下來，

她的说罢，想来想去，大概不会将我们三个人的身首设想为合理的逻辑，还是因为她们自己的利益设想。也许有人知道的会说她们想，这个人竟去社会上有做舞事，不可封锁那样害为斯做，也许将来另当别论。这只是我的猜想，本来还不是事实，事实是说我要为劳动，要锻炼此我的脑筋。

情绪的情形也许没有意见有什么武装，所以但并没有说我要劳动，甚至看得单调，后来我还住惯了，也竟觉得没有意思，也自己反而因此致情绪好见开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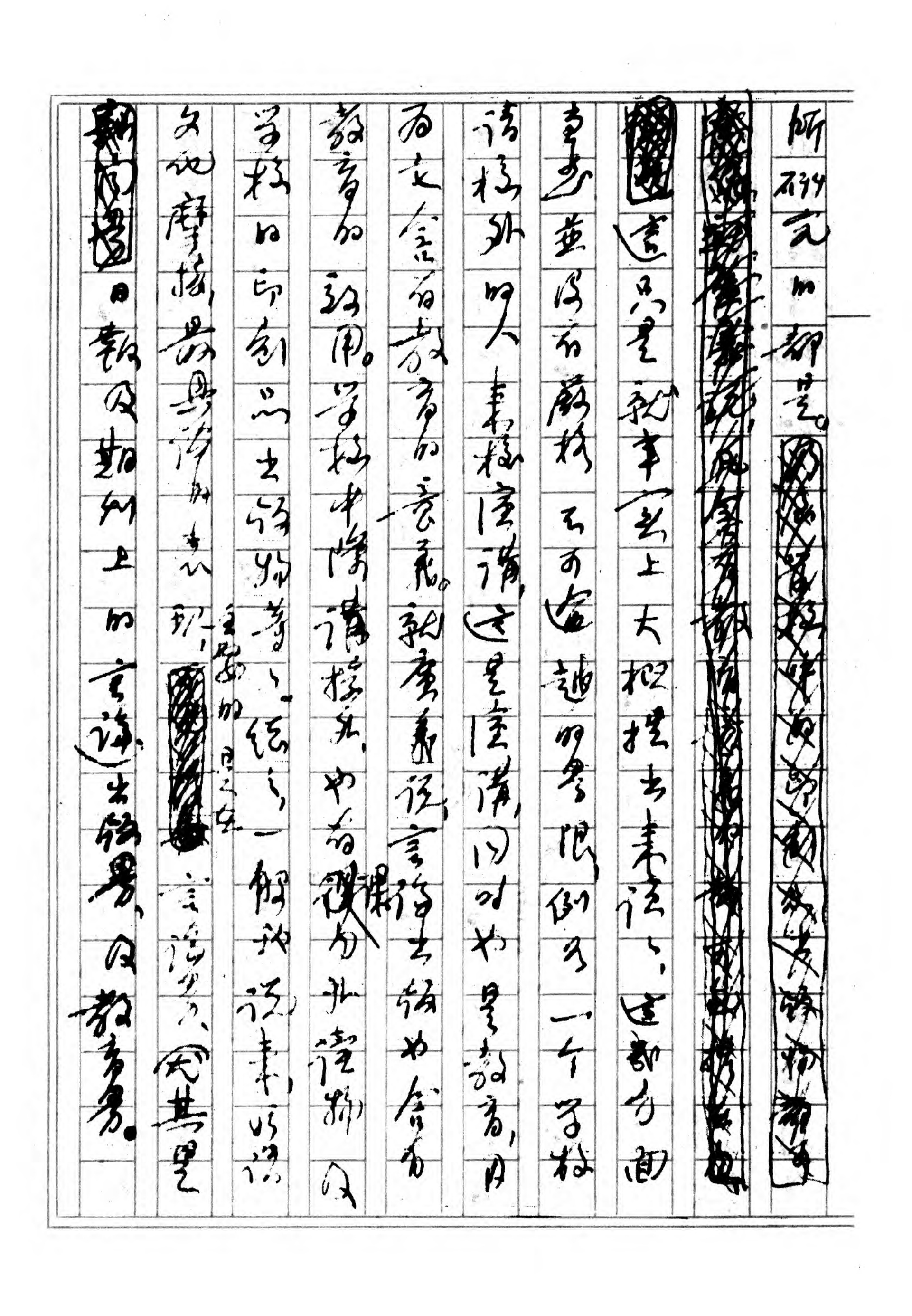
其一是你也怀了情，后来听说你在悲祝我的时候，心每天只有

两块钱的生活费，在你也许不够用，这也许使你对于特工的情绪低落。听说特务要有特殊的报告才有特赏。这在我，你也不易得。说我要暴动，这也许可算是很特殊的罢，但已被高高在上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氏抢先报去了，不但报一次，你自己也很清楚的，过一而再再而三地报去了，那里轮得到你呢，

* * * * *

在路線西係「加速」往下降的情況下，「三摩」的不幸現象也加速增劇起來。關於「三摩」中的軍事摩擦和人事摩擦，上面都已大略地談過，現在想再略談「三摩」中的文化摩擦。

所謂文化，儘管在各專家有或詳或略的定義，但就具體的表現而論，主要的是在言論出版及教育各部門。言論有的是口頭的，以演講、座談、及討論會之類；有的是寫出來的，如報紙雜誌上的言論等。出版則屬於日報、期刊、雜誌、以及書籍。教育則大概私塾、義塾、補習學校教育，在學校中教師所教授，青年學生



所研究的都是。[illegible]

[illegible]

[redacted]这只是就事上大概提出来说说，这部分面

专业并没有严格去分，随时可以限于一个学校

请校外的人来校讲演，这是讲演的时也是教育，且

为文会的教育的意义。就广义说，言语出版物会有

教育的功用。学校中除讲授外，也有课外的外请讲演及

学校的印刷出版物等等，统统一概都以说来的话

文化学校，最好每边加上以外，[包括加上日文等][redacted]言语出版，其里

[redacted]的教及其外上的言语出版界，及教育界。

我在上面曾经说过，"三摩"结合有相互的关系。前方的军事摩擦，是限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可能发展甚剧，影响于大后方的人事摩擦，并不限于国共两党，而是侵入于比较右的其他抗日各党派。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曾说及国共以外的青年党及救国会的故事。讲到文化摩擦，也有相类的情形，最显著的是皖南事件发生后，竟而对于文化摩擦的变本加厉。该事件发生后，国共两党的机关报处于对立的地位是很显然的，一方面是新华日报，一方面是中央日

徽及錯誤（央求的徽）竟是國民黨的機關報，錯誤

徽章是筆會的作家部的機關報。一方面在概述

的環境中努力奮鬥，要把事實真相及真是非

表白於世，以求公判；一方面憑藉執政黨的便利運用畫畫機構

反筆墨畫其作壓迫，不具。最有趣的是它畫其左

右街上亂打亂捕民眾，鼓舞月報的無辜小販。後來

自己也覺得無聊的有趣，因而記勝所禁完竟不大

方便，隱密特好想天開，從用小孩的玩具的小玩具無緣無

故我世樣無辜小孩的耳光，我主張並備受抗大概是人類

天性，尚可引起叫鬧，于是斷然出來彈壓，把他們一

同機提此官書，不管三七二十一，所有報紙全部沒收！這樣既可不致有傷報職（？），又可達到目的。但是事實終究是事實，很難久在隱瞞之中，不但你遇著中國的新聞記者，他們可以幽默而欲藏地告訴你一切，即偶然遇著住在國際宣傳處的 Press House（也許可譯為「記者之家」）外國訪員，他們也會笑瞇瞇地代為告訴你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天下事最難的也許莫過於壓抑正確的消息或言論。事有湊巧，擁護中國抗戰的中國國民都的由新文又發生，以致好將周佛海，住在 Press House

的外國記者訪問（尤其是英美，德國等外）為着他們本國的利益，如若與中國的國策抵觸，所以對此類消息，十分注意，忙于探聽。

（蘇聯記者有自己住所）

克服種種困難之後，把周恩來先生一筆蓋章負責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向江南為國殉難者致哀」十個大字刻出登載之後，外國記者們，譯發電報，何被封鎖，剛巧他們認為有人出境，偷帶出境都是，從外國的大正在人的信件的急電帶來，與此同時，中國的轉化陰為是，本國家負責人最後勝利。聯絡信件未電說出去

封以上。這使當句不僅不精，有所缺乏，使本想不改再行擴大，僅能對于相同的關懷和意識的有故，定去使得我們的欽敬。

但是這一部分（屬于關共產黨）的文化摩擦却不因此就要停止，就算有數執筆之人有千家住啟特老（特羅茨基）的論檢，這名詞不斷從創造精神，似乎順叫）御去，至于動政的暗中組制，意見的暗中操縱，每不可勝說，我在這裏只是因為這一部分的文化摩擦是政治「鎮壓」下降的[illegible]「三操」中的一部分現象，所以連带說明，直是累累又果然其譯有價于

將來的中國史家，其實由前方的軍事摩擦和政後方的文化摩擦，可說是整個的，並不限于國共兩黨而已。皖南事件發生後，便是中間層的日報輿論，有過二三星期的最重視最沉痛的時期，自便是一例。

皖南事件發生後，政府頒令撤出軍令政令之而統馭經，國民黨的機關報要做的事很簡單，大罵一頓之後，將了這好好的帽子，強行戴在對方的頭上。中間層的日報中有自由職業家，他們的了腦袋之都未能這樣簡單，而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政府環境中，又覺

誰說老實話，于是大家在這樣重要事件發生之後，害怕有好多天在社論裏一字不提，但是你們終於躲過這關，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負責人着了慌，把各報館的主筆先生分别請來訓示勸導，指示他們這篇文章應該這樣々々做，那樣々々說，大有以義務國文教師自任之概，有的主筆先生回館之後，急忙明綫一篇敷衍々々，但是第二天又被請去，指出你說得不夠，甚至與宣傳部負責人原來的指示不符，要你再來一下，有的主筆先生只好壯着膽再勉强來一下，有的佯作聰明，老實置之不理。

结果受了严重的注意。有的文章再模仿欧美，被电
话催得没有办法，（情急智生，时）来一篇不痛不痒的短评，塞在报
的末端，这更惹动了指责者的肝火，以为太宽一
些，让你做长篇社论，指示你要详细，你却做了
一篇三言两语的短评，使人寻不着见（的）也上，再不识指
示，即公告请徐周大吉，有一家报请（老配特重加）盖经之了
写一篇，谨之之很长者，心写了一篇短金大会和又
给国民党十足两方面大著，可是他文章表现的
而不通，话却被指责交删得一干二净。
总之那二三星期的重庆新闻界不啻在风雨

飘摇之中，偶然遇到新四军的朋友，他们总是摇头叹息，把这件「新四军皖南事变」做谈资。从表面上看来，我对于皖南事件，并不了解其中含有军令政令的因素，因为新四军是归军委会指挥，在国民政府抗战国策下作战，由军委会发出的命令是军令，由国民政府发出的命令是政令，这是常识，但是在实质上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其中含有党派的问题，因为在事实上新四军是承认中共的传统，而军委会及国民政府也在事实上是由执政的国民党一党所主持的。我们要解决问题，必

经而对事实，不能以军令政令统一表面上的名词抹煞，而忽略其真正内容，而不能根本上加强民主政治，巩固抗日阵线的精诚团结与合作，我有一篇文章很婉转地表达我们这种态度，我自信是很持平的，所据理在全民抗战团结上面，但是全文被审查会机关，在那时期团结上的社论结果是一个大空白！一个大天窗。

关于皖南事件的详细经过及真相，我在文载国内外，在这里只要指出军事摩擦和政治摩擦所本团的相互关系，要谈一些作为一个例证，但这是一件小

手却很有重要的意义，值得附带一提的。有一位我所信任的江苏同乡老前辈告诉我，说沈南平仲先生後，顾祝同氏曾款以重宴，又曾一個江苏同乡谈话会，参加的是在新時当都的江苏重要士绅，他也被邀请。他说顾氏对他们致辞，老实说我们计划是要消灭新四军，後来未能成功，竟被跑到苏北，很对不起云云。这表示僅是军令政令问题，而含有党派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根本解决的办法是要努力实现民主政治，各种旧党派都在民主政治之下和平共存，同心协力，为国家民族前途的光明，

为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幸福而共同奋斗。这一点是根本的，在中国路线问题上，以后有机会还要谈到，在这里只是要指出：我们应该明白了国际摩擦事件的真相，便知道只是用军令政令的表面名词来掩饰一切，当时的言论界并不以这种掩耳盗铃的态度为然，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却因此引起当时人的名称摩擦，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国共表面上看来，上述的名称摩擦是由军事摩擦演变的，但只是表果，进一步探讨、深刻的分析研究，便知道其根本来

原來不是僅僅來自國共兩黨的合作問題，也不是僅僅來自抗日各黨派的合作問題，而是來自有關國家前途的基本政治問題。——具體說來，就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

* * * * *

軍事摩擦可能波及到文化摩擦，但文化摩擦當然不只是由於軍事摩擦，可能由於在基本的政治問題之下對於各種重要問題的態度。倒是上面談道的憲政運動，抗日各黨派認為不要行憲政府已說憲政實行，要想使之提高民權，實行合於

抗战建国需要的宪法，即不在于已适当时的个合时代需要的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等，而且应把宪政运动和民众运动打成一片；一方面使政府的本质真能民主化，一方面使人民真有参政的机会。但是国民大会的某些人，却只要利用表面上的宪政，以维持一党专政的政治局面，而对于民众运动，更加以警戒；所以说只要少数学者去分别来研究研究就够了！

因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有这样的不同的态度，于是在若干言论乃至若干文章各方面，陆续来

者都不免牽扯。本文不是研究憲政問題，所以關于
憲政問題本身，不能多所論述。祇在這裏只想指出
一点，就是在國民參政會中倡議通過憲政的提
案，而在這些提案之中，除了在野的各抗日黨派外，無黨派的民主人士
政的國民參政員也有憲政提案在內，但是有
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實，即偉大的工夫把當時國民
黨的言論（包括日報、定期刊及小冊子等），在言論
上幾乎是完全反對憲政的，和民間的言論站于是
處于敵對的地位，好像是兩个完全不同的陣營似的！
[illegible]例如[illegible]民間言論講到民權，很自由

此處另起一段



地會議到民主政府中人民享有的民權，而且也就是各民主國憲法常調的所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等等自由權利，這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也曾經列為專條，原為中山先生遺教中的一部份，可為國民黨黨史上增加光輝的，但是民權自由的「自由」兩個字卻嚇壞了反民主的先生們，國民黨中央黨部所出的關于憲政的小冊子，開宗明義第一章，一開始就用四号大字把中山先生「反對自由」的話全部印出，好像暗示國父也和他們一樣，一向是「反對自由」的！其實中山

先生所反对的是「一盘散沙」的自由，绝对不是民主政治中的民权自由，这是有中山全书第五可以覆按，不是我所捏造的。我们主张民主政治，谁也不会提倡「一盘散沙」的自由，谁也知道民主政治所争取的是有组织的合秩序讲纪律的民权自由！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政治学，只是常之又常的常识，但是国民党的机关报纸偏偏都用此大骂民主政治的提倡者，不惜一引再引三引四引！他们根本不曾想到反对「一盘散沙」的自由是一件事，反对民主政治中的民权自由又是一

件事。但是反民主者都把這兩件事扯為一談，祇有
無上法寶嗎、不休，不但在憧憬憲政運動期間努
力「表演」，後來在香港的國民黨機關報「國民日報
」以及「用盡陰謀播弄的手段的星島日報」上，仍把
這個「法寶」搬出來大嚇民主政治運動者。[illegible]
那幫政派流亡到香港後，又看到這個「民眾」「演
出」，有一天遇著一位剛到港的國民黨的政客君，
他們私人友誼不錯，於他來訪問，他概然問他，國父
遺教中那樣規定得民權不必恭維天大之篇不少，
何為老此歪曲遺教，令人莫從，他回答得很妙，他說：

小冊子作用於世，撥弄教條嗎、于後，何苦來！！

「他們不以此解釋這段，只作解釋他們支持的行動？」我的情懷，在實際上不僅有着民主政治運動，也是出于愛護國民黨及中山先生，也許這一點感動了這位國民黨朋友，所以他都以此坦白直爽的答覆。所可驚的：這也只是他在方面幾人說話中的態度，出去之後，他也還不是同流合污，加入反民主者的行列中一同搖旗吶喊？

關于我未在香港的時候，民主與反民主明顯的鬥爭，這是後話，再續後敘，在這裏只是因為談起在重慶憲政運動中國民黨的機關報言論一致反民主加



专任职数，附带说及。现在言归正传，还是要回到在宪政运动中「各党摩擦」的实际情状。

因宪政摩擦问题而引起各党摩擦，这在「摩擦专家」隆盛的时代，似乎多少还是意中事可原[?]宪政运动而也要引起各党摩擦，却不免有点[?]太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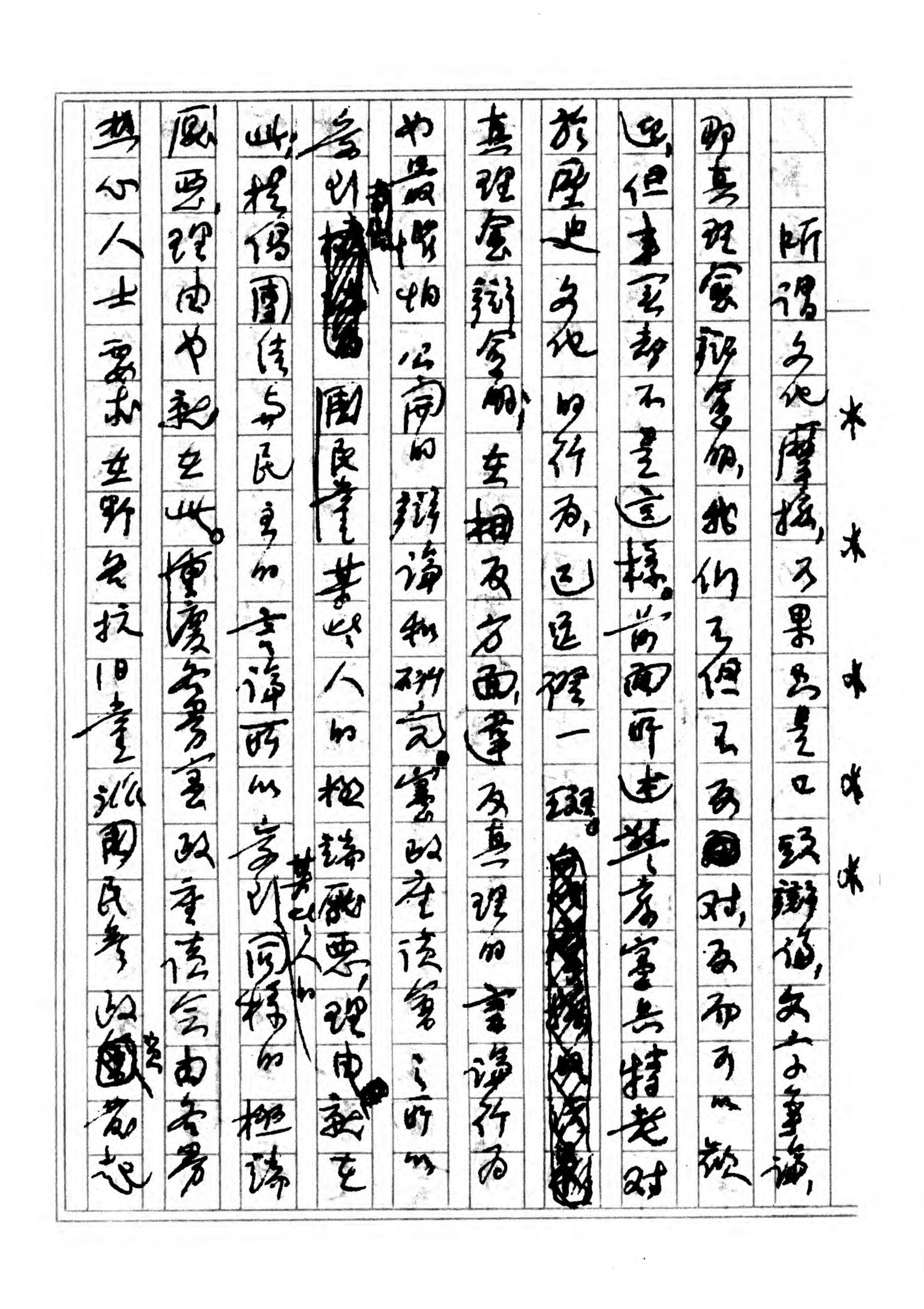
在国民参政会中一致通过实施宪政提案，却在[redacted]国民党中有人大发[redacted]无[?]反对民族自由的高论，这已足令人[redacted]诧异，但是既称为「[?]宪政」，实[?]「[?]」想来绝不致和民间言论发生争执罢；但是在提案[redacted]一致通过以后，却有一位国民党参政员[redacted]某先生在

國民黨機關報上發表偉論，謂要依中山先生遺教，有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分，現在訓政未畢，不宜提前實施憲政，所以憲法僅供研究，至于「實施」，那要等到何時，尚不得而知（這篇名著原文不在手邊，只能述其大意）。于是「黨的言論」提出三個時期的重要性，大有「黨字」遺教的信徒之勢，民主政治以遙遙無期之概，這樣，「黨論」為「民論」之兩又引起了不少的議論。其實，中山先生預定訓政為六年，現在「訓」了一二十年，猶未「訓」成，中山先生所指的軍政時期，是要對革命政府偏向

廣州，北洋軍閥橫行參加，實施憲政，以後如的筆閥，無從着手，現在面對外敵事，外侵民主，正需加於預動員，形勢迫急，豈能遲疑一議。

這種憲政的俳論，無異于無形中把國民參政會中所一致通過的實施憲政提要規章取消，國民參政會並斷，只是一形式，最近已改為已經所操縱，總的說來很周，但在事情，尚有部分生氣，在野的參於舊黨派對此意見不能默無一言，該會議長即為國民黨的領袖（總裁）蔣先生，參政員有機會見到說話時，自便提出疑問，蔣議長大概也覺得太說不過

去。于是由他發表談話，申述根據總理遺教，三个時期不必拘泥。但是蔣議長的申述是一事，國民黨的它的政策又是一事。從此以後，「黨的言論是不再喋喋于三个時期，但却一致認為[redacted]民主與抗戰是不能同時並行的，民主與抗戰是不相容的，民間言論却認為民主是舉國團結、[redacted]發動民衆動員、改革新政府的鎖鑰。所以關于這方面的「文化摩擦」何然是有着遠大的意義；我們看此國民黨最近十一中全會決定抗戰結束一年後實施憲政，可見民主與抗戰不相容的評論何是某些人的偏見。



所谓文化摩擦，不果只是口头辩论，文字争论，那真理会愈辩愈明，我们不但不反对，反而可以欢迎。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前面所述几考学者情苍对于历史文化的行为，已足见一斑。[redacted]真理会辩愈明，在相反方面，违背真理的言论行为也最怕公开的辩论和研究，实政在该会之所以要以[redacted]国民党某些人的极端腐恶，理由就在此。极端顽固传统与民主的言论所以受某些人的同样的极端厌恶，理由也就在此。重庆各方要求政府重庆会由各方热心人士要求在野各抗日党派国民参政会以发起

* * * * * *

並且持其素,宗旨正大,行為光明,而且在野反抗舊黨派要者進

行啊,針對當局國民黨而言的。曾想種種方法拉一位國民黨分

[illegible]員參加其黨,拉不到,拉這個不來,拉那個不夠,後來拉到一

個,也像小學生時常「逃課」一樣,時來時不來;而後由「黨」的領

[illegible]等以用打手若干人搗亂會場,鬧得烏煙瘴氣,詳情我曾在

拙著《抗戰以來》一書中述及,現在不多說了。

「文化摩擦」這個名詞最古「文化」二字,好像怪斯文似的,其實

文化摩擦的結果,不但可使[illegible]壓出者失學失業,而且出步生命[illegible]

[illegible]中國青年學生[illegible]因保衛抗戰的抗戰一度[illegible],被新[illegible]當局者參加[illegible]

像前面說過的鄭代英等因創辦時事青年的新聞事業,被特[illegible]

[illegible]被[illegible]是一個又[illegible]連

[illegible]是[illegible]是一例,又[illegible]通而被綁,[illegible]了,因為在學校[illegible]

（这也是度住宿的因素之一），而尤其重要的还是某些所有余是进步青年的进步意志，例如对于当前的时事问题，抓紧围绕如何安引起广播爱好者的注意，主张民主要安引起和民主者的嬉说。至于研究对当年身的精神方面问题，只要是进步的主张，都是是单纯团结的反动派领导团体及反动派的老爷们自己，知道要在思想上领导青年就争取青年，这并不是为什么人敢于阻止他们在思想上领导青年，却是因为他们自己领导不起来。于是他们只得另开途径，把进步的青年列为「异种人」「卿卿去」！他们说他们素来安于干涉，所谓的就是「思想复杂」分子，其实凡是进步的青年都有「异党分子」的嫌疑，因为他们不知道跟着闭着眼睛随着潮流，反

对民主，这样「识时务」的进步青年，在顽固派（反动派）眼里是他们看

~~这种「不识时务」的傻子，总爱不但是对付者，一种好的~~

~~的，更爱这些由来，如果其他进步刊物的更爱这些书来。出版机~~

~~关的查禁进步刊物，进步书籍也不准出版发行。国民党[illegible]~~

~~[illegible]反动派的特务机关，就更其爱读的禁读书也[illegible]。~~

来，决定检读，真是千读读读读的事情！

这些例子，也可以说是由反摩擦运动引入事摩擦。这二

「擦」是时常可以碰在一起的。在（四川）綦江训练班里出的许多无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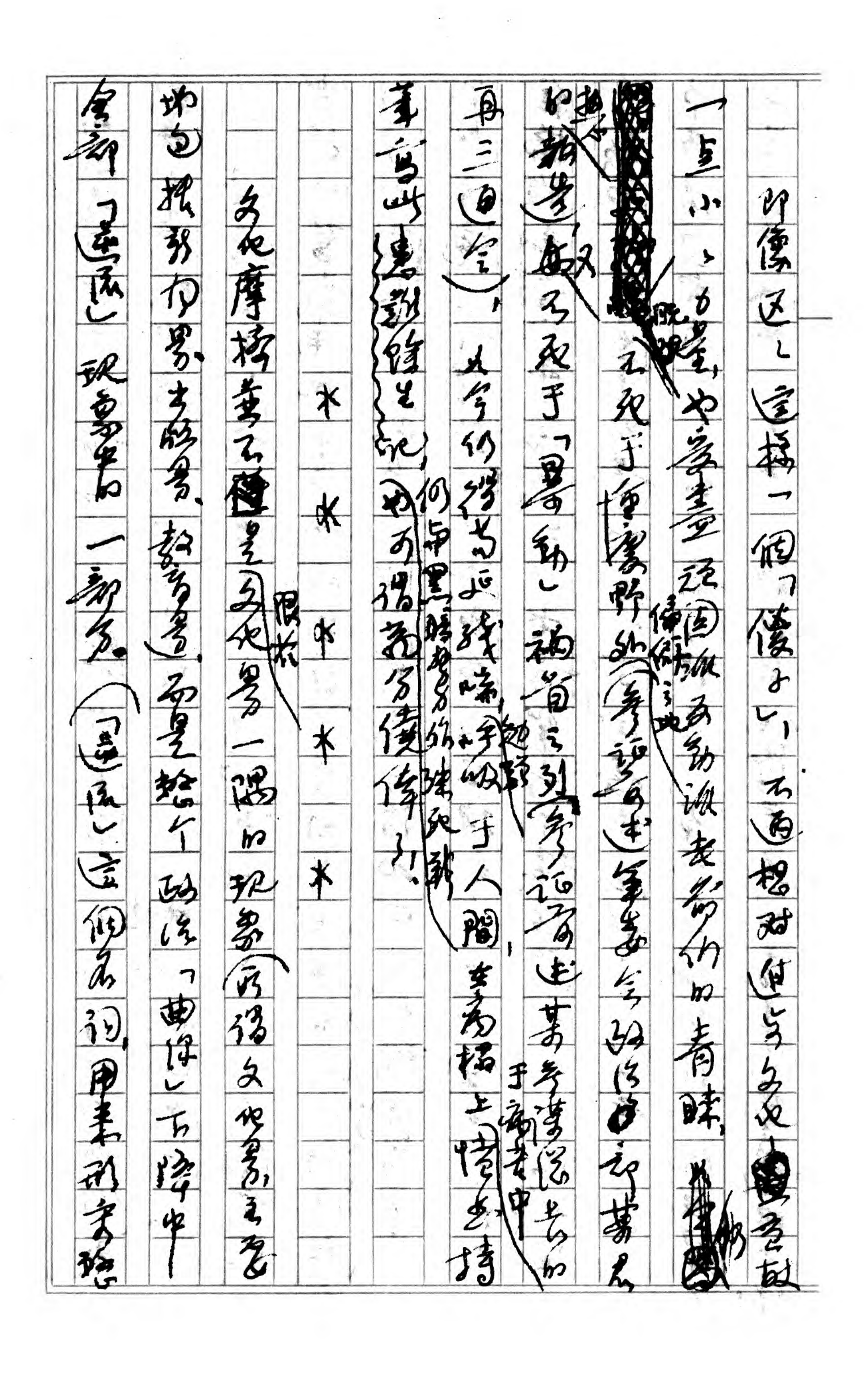
青年遭受酷刑，死于非命，是教育方面反摩擦运动引入者

摩擦的一种极大规模的不幸的例子，其详细研究，抗战以

淶一書中，山頂黑不贊述了。此外，學校教員中有不少為這個派
（反動派）老爺們一一宣揚「帝國主義」的神經理論，竭力打破
破（四年有一位教書詳細地說明），鄧某大學有一個大學生因
被校內武裝的[illegible]三青團某成員將所謂「言論」，誤為他的「膽怯」
有關題，於深夜被叫到校，全附近，廣播站開始向他大吼一聲，一聲斷送了！
學例目，[illegible]某敵誤何！這是我黨五公派之經過廣東某報時，有
華僑青年戴君等去這樣鬥爭，像一年即五大學畢業，當麥會[illegible]
每次會下，情緒本會難學去做生意，由家裏來幾次，在廣東港一
帶經費轉發物，我以為我們所謂平靜的這個故事，我們去檢
的某個医夜，我平能到那位「健將」怎樣叫那個被捕的同學出

去，這樣悶着，這樣發出槍聲，那個無辜同學這樣悻悻而倒，這數年來慘烈，都構成了文化摩擦史上令人憤慨無比的一頁。

這樣看來，像特派若干打手搗亂，意欲在這會之場，僅將能夠這些警察來把十幾個各黨派的參政員（其中有一位被強拉列席的國民黨參政員李中襄先生，可謂兩面做人難，他是我的老友，我很同情他的苦境！）打得頭破血流，幾乎送掉殘年老命（其中有好幾位滿臉長鬚年高德劭的老前輩），可謂「優待」之至；又像分別邀請各報的主筆先生到黨部辦公室「面授機宜」，指示「文章作法」，也可謂「至高」之至了，最可憐的竟也要輪到許多既無「筆政」之權威，又無「主筆」之職位的純樸天真的青年！無辜遭殃，何勝悲憤！！



即使還是這樣一個「傻子」，不過想對這些文化界[illegible]故

一些小小的力量，也寄望於政府和政黨們的青睞，[illegible]不死于[illegible]野外（參謀的手術）筆者不會活得那麼的「熱愛」，又不死于「冒動」，禍首之列（參謀所述某參謀說去的于前者中）再三追究，文學何嘗苟延殘喘，呼吸于人間，去爲墻上情與詩

革命此後遺餘生記，何年黑暗者所作殊死戰，也可謂寫分傳偉了！

* * * * *

文化摩擦並不是限於文化界一隅的現象，所謂文化界至是地自擬新角界、出版界、教育界，而是整个政治「曲線」下降中全部「逆流」現象中的一部分。「逆流」這個名詞，用來形容聽

個政治「關係」工作中的全部狀態，經為簡明可取，並到這個巡政動亂老爺們聽到這個名詞，大為頭痛！）這一點很為重要，因為而總把個政治「道德」中看文化摩擦，（看軍事摩擦或人事摩擦中一樣，這裏不過專就文化摩擦而言。）然後才看得出文化摩擦蘊積所在，然後才能明白文化摩擦的根源都是來自各國中國前進的基本政治問題，」然後「文化摩擦」這個問題才能夠得合理的解決。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夠進一步指出：所謂文化、摩擦除「一方面與其他」二種」（軍事摩擦與人事摩擦）常可被看是連帶關係的，另一方面，就它本身說，是中國整個黑暗勢力

所盡力傳播這個文化與中國總個光明。所要努力者，發揮光大的傳統文化的精華，所以我們承認一個傳統的教條或其主持人遺蹟，以為這只是這個精神的教條或主持人，與某一個派系或派系之間的什麼，這便是最大錯誤；我們要承認一個傳統的學說或其主持人遺蹟，以為這只是這個精神的學說或主持人，與某一個派系或派系之間的什麼，這也是大錯誤；同樣的，我們要承認一個古老教條與其主持人遺蹟，以為這只是這個精神的古老教條與某一個派系或派系之間的什麼，這也是大錯誤。所以在個人的一個傳統的作家或文化工作者，我們要看到他的遺蹟，以為這只是這一個精神的

個人和這兩派反動派之間的什份，那也是大錯誤。為什麼呢？因為無論是進步的報紙，或是進步的學校，或是進步的出版機關，或是一個進步的作家或文化工作者，他們的工作目標與成果，都是整個進步文化的一部分。為著一個進步文化機關的努力奮鬥——無論是報館、學校、出版機關、乃至學術團體——為著進步文化的工作而努力奮鬥，都是為著整個進步文化而努力奮鬥。

文化政策是整個政治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進步的政治政策才能產生進步的文化政策，也只有進步的文化政策，才能與進步的政治政策相配合，文化政策的大致能推行



論我們也可以說進步的文化政策是進步的政治政策的先導，是進步的政治政策所以成功的一個要素。這個派反動派所以痛恨進步文化，也因為進步文化與他們的這個的反動的政治政策不相容，是他們的這個的反動的政治政策的最大障礙，所以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推銷陰謀不遺餘力。在政治上逆流的漩渦中，文化摩擦所以發生，進步文化所以遭到空前的災難，其命運也就在此。

但是我們看看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為保證進步文化的前途，與重視幹勁努力奮鬥到底。

什麼是進步文化？請於下章敘述「進步文化的要點」時作附帶提出來研究。

第三章　進步文化的遭難

在政治「曲線」往下降的不幸情況下，國民黨的頑固派反動派老命們忍心將中山先生所留給中國最可寶貴的遺產三民主義拋諸九霄雲外，而獨津津有味于禍國殃民的「三擦主義」的橫衝直撞。所謂「三擦」，即吾所面嘗絕大累讀過的軍事摩擦、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無論在「三擦」中的那一「擦」，在頑固派反動派方面都是要用倒退來消滅進步：在軍事摩擦中，他們所要消滅的是進步的軍隊；在人事摩擦中，他們所要消滅的是進步的人材；在文化摩擦中，他們所要消滅的是進步的文化。我是一個文化工作者，進步文化的遭難，於我當然要發生

更直接的沈痛的感覺，是使我陷入苦難的更直接的原因。

首先我們要問什麼是進步文化，進步文化和倒退文化有什麼區別，黑暗勢力為什麼要殘酷地摧殘進步文化。

我和四五百工作同志所慘澹經營起來的文化機關是全國同胞及海外千萬僑胞所共知的生活書店。我們對於難新教育也常注意，每星期有油印的店務通訊一小冊，分發到佈滿全國各重要都市以至的五十餘店分發同人公閱，我在每期的店務通訊裡都寫有一篇[redacted]文章，對全體同人指示有關文化的重要問題及工作途徑等等，我記得其中有一篇是專門的解釋進步文化的內容。進步文化經過中國當前的進步時代的實際需

要相配合，中国当前进步时代的实际需要，最扼要地说来是团结、抗战和民主，所以拥护团结、抗战和民主的文化是进步文化，反对或破坏团结、抗战和民主的文化是倒退文化。团结是指全国各党派各阶层都在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之下，精诚团结起来，不再有内战和摩擦的不幸现象发生，一切力量对外则集中于争取抗战胜利，对内则集中于实现民主政治。抗战是民族解放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抗战的发动是建立在团结基础之上，是众所共睹的事实，抗战力量的加强和抗战最后胜利的获得，也必须建立在团结基础之上。

民主政治本来是我们建立真正民国的前提，而在抗战期间尤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必须以民主的

方式和精神来共同进行团结，才能坚固团结；也必须以民主政治来发动民众力量，革新政治，才能扩大民众动员；坚固团结，加强民众力量和动员，才能增加抗战力量，在事实上做到愈战愈强，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同时也达到建立真正民国的目的。根据这种基本的认识，本党主张的条款乃至纲领的条款，都经住去：是要能够促进团结、坚固团结；是要能[redacted]够加强抗战，坚持抗战；是要能够推进民主、实现民主。在相反方面我们绝对不但不制造煽动摩擦，而且要尽力消除和反对摩擦；我们绝对主张彻底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我们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反对一党专政，反对新专制主义，反对排斥异己构陷的有名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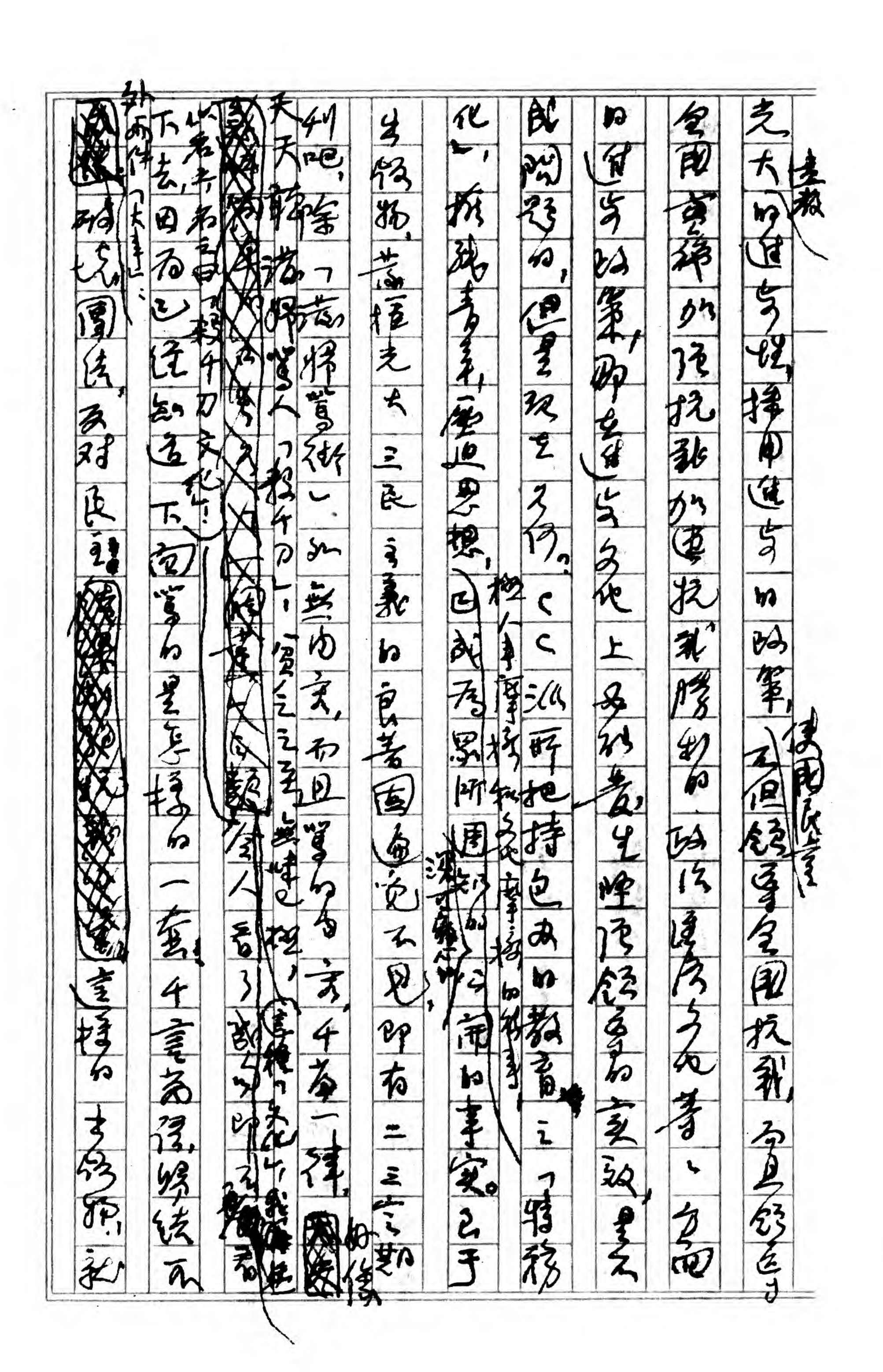
實或徒有形式而缺乏精神的「民主」政治。合乎這個標準的便是進步文化，因為它能配合中國走向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違背這個標準的便是倒退文化，因為它把中國往後拉，使中國人民大眾陷入水深火熱的苦難中。除上述三點外，我還可以加上這樣的一句話：我們所要的是為大眾謀福利的文化，而不是為少數人謀私利的文化，所以在思想或理論上我們積極地注重於大眾有利的思想或理論，反對為少數人保持私利的欺騙或麻醉大眾的思想或理論。

中國的文化事業，大概說來，有這樣的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與政黨有關係的，一部分是沒有政黨關係的民辦的文化事

業，與政黨有關係的文化事業，其本質（和所主張）是倒退呢，還是進步？這要看它所屬的政黨在實際上所採用的政策是倒退還是進步。就中國目前說，在野的各抗日黨派對外都主張團結抗戰，反對苟安妥協或摩擦，對內都主張實行民主，反對一黨專政（若干趨向是對這些都主張說話主義，詳見拙著《抗戰以來一黨專政》一書，這都統成合法國家的進步時代的要求，在政策上可說是進步的，所以它們所主持的文化事業，都可說是在進步的文化範圍以內的。這意思固然在主張上當然也還有程度之差，在事業經營的方法上也還有大小的區別，因此在政治流派之下，更因文化的團派及派（其間還有階級與進步的區別，前進派主張上比倒退的 [redacted] 因此進步 [illegible]）的歷史，其實際的行動的程度，也發展的程度上的意思（[illegible]）

[illegible]

派無關係的民國以來的文化事業，（尤其出版書店，）其間如果有新舊之分，舊的個
來偏重于教科書的出版，在基本知識上是作推廣普及的地
位，但新書方面進步時代的實際運動之接觸較少，起過一點上述[redacted]
[redacted]所含的時代的進步性[redacted]比較地有限，新的偏重于
理論讀物及一般讀物的出版，與書方面進步時代的實際運動較
有密切的接觸，因此所含的時代的進步性也比較地濃厚。
中國政黨當局的要推執政的國民黨，國民黨以及中山先生
最可寶貴的遺產三民主義，[redacted]中山先生[redacted]
[redacted]曾在序文中曾勸國人繼續研究，但其
中並含有豐富的進步性，國民黨中其稱中山先生的信徒者擇



先天的进步性，採用進步的政策，使用民主，不但領導全國抗戰，而且領導全國貫徹於抗戰於建國抗戰勝利的路線，健康文化事業，在西的进步政策，即在進步文化上多所發生[illegible]領導的實效，是在民間的，但是現在又何？＜＜派所把持包办的教育之「特務化」，摧殘青年，壓迫思想，已成為舉國所周知的事實。至于出版物，蓝桓光大三民主義的良善圖畫竟不見，即有二三會期的傳利吧，除「[illegible]帰貫術」，如無內容，而且簡直商業千篇一律，天天轉播[illegible]當人「殺千刀」，實在乏至無味之極，[illegible]全人看了[illegible]以君子，君子自「殺千刀文化」！下去，因為它們知道下面算的是怎樣的一套千言萬語，繼續不

外國件「大事」：破壞團結，反对民主，[illegible]這樣的專制獨裁，我

是值得分送，也引不起读者注意，要在进步文化方面发生坚强领导的实效，更无从说起。我在上面已经提及，把握中山先生之实遗教三民主义所含的真正的进步性，而可在进步文化上建立坚强的领导，现在顽固派反动派闭目掩耳，无视三民主义所含的进步性而专意于「三种主义」，乐此不疲，使中山先生所手创的具有过去光荣历史的党所有的进步文化领导权陷入倒退文化的深渊，实在是一件深可痛惜的事情。

倒退文化和进步文化较量结果当然是前者之失败，顽固派反动派不自反省其失败之所由来，而结怨于进步文化的突飞猛进，以为他们之所以着着失败，是进步文化做了他们的

障礙，于是產生一種幻想，以為只須用全力消滅進步文化，便可達到他們唯我獨尊的目的，結果可以高枕無憂，從心所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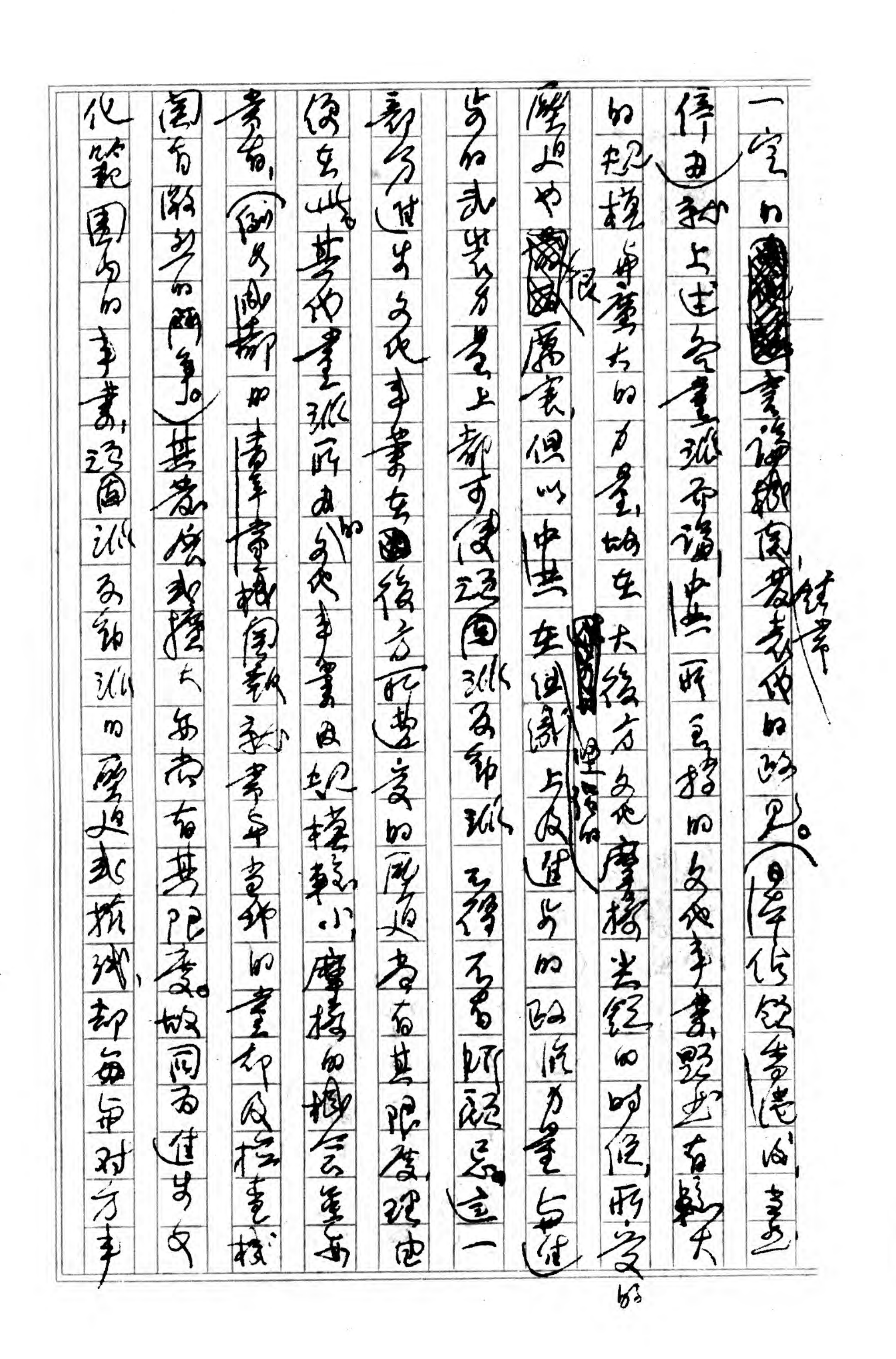
由于這種幻想所產生的結果，便是壓迫進步文化，摧殘進步文化，反動勢力，于是才有進步文化遭難的不幸現象。

* * * * *

進步文化所包含的因素，我在上節已經談過。進步文化是有時代性的，我們在今日中國所提出的進步文化，要連繫到中國當前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我們對于這個因素所共同努力的文化事業，以生活書店為中心，只是全國整個進步文化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戰後逆流中，整個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情況下，它

一部分所遭到的苦難，尤為殘酷，此中也有其獨特的原由。

在野各抗日黨派對于文化事業都各有其相當的經營，而其中的中共，在其中心所在地的延安，及其抗敵範圍的敵後根據地，固有其大規模的文化事業，即在執政首都，亦有其日報、雜誌的刊行，及書店的設立。除中共外，其在野抗日黨派所有的文化事業，規模都較小，如青年黨在成都有一種日報的刊行，此外有國論的刊行，國社黨有再生周刊的刊行，以前曾在香港有國家社會報，而其機關報除三黨而外，有一種在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其似時有時輟。職教派有國訊旬刊及 [illegible] 村治派的思想淵源也是在香港，有民主政團同盟的創刊光明報時，才有



一定的意識形態經常表現的路線。但是作為意識形態的主要
作用於上述各黨派尤其中共所支持的文化事業，既有較大
的規模與較大的力量，始在大後方文化摩擦出現的時候，形成的
歷史的根源。但以中共在理論上及政治上的路線力量與建
步的民族觀點上都可使這個派系及節派不得不當所認定這一
部分進步文化事業在國民後方所遭受的壓迫者有其限度，理由
係在此其他黨派所由的文化事業，因規模較小，摩擦的機會無
黨的，倒反而都以青年黨被國教於當局的重視，卻反被重視
閱有關共方的關係。其發展規模大小亦有其限度。故同為進步文
化範圍內的事業，這個派系及該派的歷史或派系，卻無所對方手

書的規模及力量成正比例，而像生些在路線上又武裝在上面
甚進步的宗旨以代進步文化的保衛那在前線在野舍我舊壽流
中都算例外。

現在要談到我和生活書店同人所努力的那部分進步文
化事業了。關于生活書店的組織和管理，以及生活書店全體工
作同志精神之所在，我在拙著《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一書中論
述較詳，可供參考，我在這裏所要特別指出的，就是生活的組織
上說，它是四五百工作同志在十六年長時期中以
生活周刊創办于一九二五年，已一九四〇年為一一步一步由極小規模而擴充起來，增加到的書店由于事業的擴充始終進步的，而始終被…
段艱苦血汗的結晶品，而不是由任何政黨或政團出

资创刊时，我在这一点上说，我可以毅然决然地说，出版者是没有宗派关系的民族的文化事业。除内部的四五个工作同志外，围绕着出版书局热心支持本书局文化事业的无数的作家，以及海内外无数热心赞助本书局文化事业的无数的读者，对于本书局的权威，书店也尽了绝大的力量，是本书局内部工作同志所永远铭感而永远记为无限光荣的。但是我精神上说，由于我是忠诚坚贞的爱国者，由于[redacted]两夫多数的工作同志都是热烈地诚挚的爱国青年，(女)[redacted]抗战时期的过程中即有一二(例外者)[illegible]一时的，亦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文化机关在救国会以前，我们民族解放的伟大运动实际上连在一起，自从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爆

生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生活书店所出版的定期刊，尤其是大众生活，在青年上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主要的机关刊物。生活书店的书籍期刊，在救亡运动参考者甚被社会重视。如于团结、抗战、民主、在救国会所提的政纲中能占重要的位置，而成为进步文化的内容，生活书店既为进步文化机关，对于救国会政纲的热诚拥护与努力倡导，因为意中事，以致有人认生活书店是救国会派的文化机关，事实上这一点，和救国会的主张而论，我们用不着否认，而且我们对于自己所共同努力的这个文化机关，能在救亡运动中有所贡献，正是我们深深觉得无上光荣的事情。

生活書店是和救國會所出資創辦的，也不是在組織上國直接隸屬于救國會的，但對于救國主張，在爭取上和精神上都與救國會共鳴，甚至說來，就是對于團結、抗戰、民主的積極倡導與推動是和救國會一致的，是和救國會同樣堅決的。這都是事實，我只是很坦白地把事實提它一提。事實勝於雄辯，這樣明顯的事實本來用不着再提，但是國乃談到文化事業機關與黨派有無關係的一般情形，有的說明白的我要再說回頭國民黨以領導派及動派不能以堂堂正正之旗，光明磊落地在文化事業上與人作公開的競賽，往往利用黨派關係的藉口，周內陷害，掩人耳目，而且實際上只是壓迫進步文化事業，摧殘進步文化事業

而已！如今把事實指出，更使魑魅罔兩無所遁形於光天化日之下了。（關于出版書店的組織及其構成歷史，和它的進步性也有關係，以後還要談到。）

我和數百名工作同志所熱烈支持的這一部分的進步文化事業——中國整個進步文化事業的一部分——我以為是無黨派沒有關係的民主的文化事業，因為它的事業是本着進步文化事業，已足招致國派反動派的嫉視，而欲置之死地而後甘心，更加火上添油的，是它的事業突飛猛進，力量空前（至少在他們看來），是刺激他們還覺得欲去之而自適（除中共以外，其他在野的抗日黨派所支持的文化事業，在組織上和事業上都比較的小），于是

在這個反動派看來，這文學藝術中的革命文化，生了是它們的莫大的障礙物，同時因為它除去教團之法上和教團宗派共鳴外，在實際上也並不是任何宗派的機關，而只是與宗派沒有關係的民族的文化事業。反說不出有什麼政治力和組成的武裝力量，使得儘管使這個反動派的勝利，有所顧忌。所以除了法律保障和民眾同情之外，這個反動派可以遠遠地避開法律的保障，任何手段，使得無法保障的民眾但懂得在文化運動，直至的民眾同情只是虛幻而不能言。在短時間內，在表面上，是無從急速地加以撲滅的。

是在政治進展中，整個進步文學受壓迫的情況下，這一部分所

遭到的艰难困苦的独特的[illegible]原因。

谈到生活书店发展的迅速，业务的兴盛，我不是在这里写生活书店的历史，无意作有系统的详细的叙述；我在这里只是要说明生活书店发展的迅速和业务如何引起深切的注意。如果它的规模小，力量小，所遭遇的艰难也许不致于这样残酷。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发生以前，生活书店总店在上海，分店仅广州，汉口两处。[illegible]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鉴于当局在抗战期间全国同胞对于抗战文化需要的迫切，本店特派高级干部数十人分往各地，在重要地点创设分店，由于负责干部的艰苦奋斗，

業務更一日千里，蒸蒸日上，到一年，全面分表已達五十餘種。
一九三八年總表已移至漢口，負責主持業務的同事為着使全
國讀者便于就近購買所需書報起見，特將四散全國各地的
五十餘個分店在一張地圖上用圖點註明，作為報頭之一的廣
告，每隔些時登出。不料有一天送到中國國民黨的機關報
接洽登載的時候，竟被無故拒絕，我們的那位負責同志探
問拒絕登載廣告的原因，據說是「上面」這樣吩咐
的，後來又問他們何以有這樣的吩咐，據說「上面」說這個廣告有着
政治作用！一個公開的合法的出版機關在報上登載分店的
廣告，有什麼「政治作用」可言？如果大家都明白的政治

二二三

是：堅持團結抗戰，實現民主政治，那末這種進步文化機關會發達，於政治目標的加速達到，正有百利而無一害，為什麼要拒絕它發展，分去抑壓的毒害呢？這種奇異現象的解釋其實也很簡單，就在：那個時候，這個進步文化機關發展的迅速，和他的動機已經嚇倒了國民黨中的某些頑固份子反動派！不曉得那個時候的政治「由陸」還未逐漸往下降，頑固派反動派還不敢十分放縱，只想盡方壓抑它的發展，未敢即下決心將它完全關門大吉罷了。

但是在進步時代的進步文化的向前發展是不可能壓抑的，生活書店的事業仍然向前發展；尤顯著的象徵是經常一

個分店都擁滿了書報讀者，自朝至暮，川流不息，清晨趕着開門，晚間趕不及關門，各地讀者熱烈的情緒是十分使人感動的。

白健生先生（崇禧）的秘書某君有一次告訴我，說他有一天陪白先生由桂林乘汽車經過生活書店桂林分店的門口，人山人海，擁擠不堪，白先生以為是什麼戲院的門口，無數觀眾在那裏擁擠着爭先恐後地購買戲票！那位秘書聽了不禁笑了起來，說那是生活書店的門口，擁擠着的人們是要買書報，不是要買什麼戲票。白先生聽了為之愕然，說這正足見抗戰期間民眾求知的熱烈，真是可喜的好現象！白先生當時的這句話，可以說是完全出於愛國的至誠。但是白先生沒有料到生活書店以

後所以會遭受到頑固派及新派的那樣殘酷的摧殘，這種「可哀的現象」時常接觸他們的眼簾，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進步文化的突飛猛進，是有利于國家民族，是有利于人民大眾，但卻是頑固派反動派的莫大的障碍物。他們是津津有味于軍事摩擦、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但是受過進步文化薰陶的人卻不肯閉着眼睛、黑着良心，讓他們牽着鼻子走。所以我們在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時候，常經聽到頑固派及新派宣稱進步文化的罪狀，這樣說着：許多青年一經看過新書報、播讀進步的書報之後，頭腦就堅硬得像石頭一樣，他們的言論與頑固派反動派相反的言論，即他們所攻的「殺千刀文化」無論如何要打倒

進去！因此他們對著進步文化的「偉大力量」發抖，於是審理，加以摧殘。

如上述頑固派反動派所宣傳的進步文化的「罪狀」如果屬事實，我們不禁要問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屬幸，為什麼說進步文化的主要目標是鞏固團結抗戰，民主政治，以會經進步文化的努力，在中國青年中產生了數以千數以萬的團結抗戰的堅持者，產生了數以千數以萬的民主政治的擁護者，使「殺千刀文化」竟無所施其技，這不是為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奠定了堅強不能動搖的基礎嗎？在這裡有一點須鄭重聲明的是：這是中國數個進步文化所努力收穫的成果，而不是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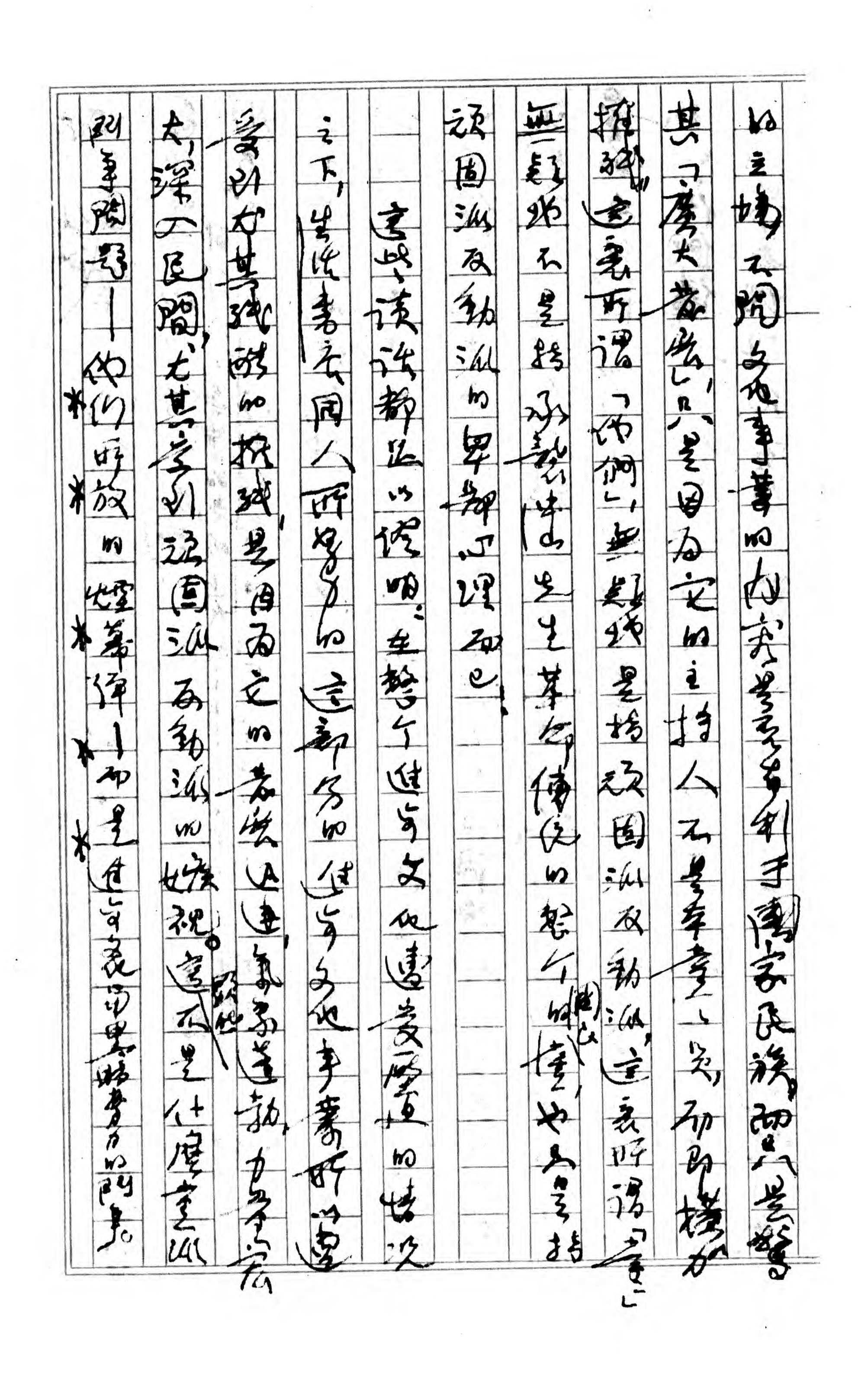
在中國這個進步文化中佔着一部分的生活書店[illegible]的文化事業所推動，但是這個派反動派看到生活書店發展的迅速和蓬勃的氣象，卻把整千整萬的「埋頭於」並他們自己的頭腦和思想的進步的「頭腦」歸咎於生活書店，竟認為要鏟除進步文化，就從摧殘生活書店下手不可！

在政治「曲線」正往下降的情況下，在國民黨當局的五中全會裏面，我們就聽說有人竟公開宣稱「生活書店的書籍，是左傾材料，壞處可怕，可謂無孔不入的，其勢力實在可怕，而本黨的文化事業卻等于零，不能把它發展，所以非根本消滅之不可」，（傳聞的大意如此，是參加該會的友人某君告訴我的。）這個派反動

派不自己想々，所操用的是敵人共產的教條方法，他不自己想想自從國父中山先生去世以後，除了戴季陶寫好的周佛海所著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一本書，竟是出版了幾本甚至一本有擇說理透徹的鉅著，而但的業務限于他人所有的殘缺多說書籍發展的思想，以為是自己所以不能發展而前進，由此生々全未有靈々去不免要病民族長太息罷。

但是他們的「邏輯」無論如何不合理，而他們在[redacted]的政治不良之情況下，是有權有勢的人。所以我和教育同志所手勤努力的還部分的經濟文化事業操于國民，在你們看來不甚努力實在不也中不免慘遭他們的毒手。我們這部分經濟文化事業

在他們事業的過程中，我在十分欣賞之中，要想把該文的生命，也曾經看走訪問在國民黨中委比較清醒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是從前的報界前輩，他很坦白地告訴我說：「以（解釋我們事業的光明與偉大的主張與所處環境的不合理。）文兄，老實對你說，他們認為你們的文化事業的大發展，是他們的文化事業的障礙」，這位前輩的話，證實了上述五中全會中的傳說。其中還有一位是我從前的老同學而現在成為CC派特務的主持人，他很直率地告訴我說：「以這樣一個偉大力量的文化機關放在一個非本黨黨員的手裏，總是不能放心的。」他們儘管一位是報界前輩，一位是我的老同學，但是我為着擁護真理起見，不得不很誠懇地說明：在國家民族利益



的立場，不問文化事業的內容是否有利于國家民族，卻只是驚其「廣大群眾」，只是因為它的主持人不是革命黨，而即橫加排斥。它表所謂「你們」，無疑地是指頑固派及反動派，它表所謂「黨」無疑地不是指承繼中山先生革命傳統的整個國民黨，也不是指頑固派及反動派的卑鄙心理而已。

這些談話都足以說明：在整個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情況之下，生活書店同人所努力的這部分的進步文化事業所遭受的尤其殘酷的摧殘，是因為它的茁壯進步，氣象蓬勃，力量宏大，深入民間，尤其引起頑固派反動派的嫉視。它組織不是什麼黨派的附屬機關——他們所放的煙幕彈——而是進步文化界不嫌費力的成果。

頑固派反動派对于進步文化的壓迫，利用當局查禁關閉，作威作福，原是一條擾亂于（重慶當局書雜誌審查會的）無理取鬧，我在拙著「抗戰以來」一書中曾說出不少的事實，在這裏不再贅述。但將「黨派團結」改為「黨派統一」，他們最怕最恨的是「團結」，但是把「黨派團結」一改而為「黨派統一」，在他們認為聯合「消滅異黨」的意思，得意之至！至於無黨無派者何在，在他們是「管他娘」！將「婦女解放」改為「婦女復興」，他們認為「解放」是中共專用的名詞，至於「婦女復興」如何可通，在他們是不加思索的，鬧了不少笑話，但是無論如何，總不敢公然一提出破壞團結反對民主的主張，強行加入或改換進步作家的

文章表面去，于是另想妙法，利用写出我。特意的检查作造后的破坏。例子如所主编的全民抗战图刊，有一位文艺家出版部
就上问言，新被审查干涉，说是不可以看。这位文艺家提出抗议，说後面明々印着重庆图书审查会审查通过的字样，为什么不可以看，他说重庆审查通过，何不可以看！这位文艺家很气愤，一到重庆，就把这件事实告诉我们。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实，有某先生对算学深有研究，对这门科学的兴趣非常浓厚。他由重庆赴桂林，带着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珠算速成法，途中特设检查时问他为什么要看这本书，这位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诚々恳恳地告诉他这个特设，说他对研究算学特有兴趣，特题目

对他们说了：不管你对研究学者有多少兴趣，生活书店的

书是不可以看的；生活书店是在政府注册的合法的出版机

关，这本书是经过政府审查机关通过的，你一看书名，就知道内容

不会含有任何政治性（印刷）含有政治性的书，经过审查通过，

每本得到合法保障。但是顽固派反动派对于进步文化机关的

违法摧残其合法的事业，无恶不作，可谓已达极点。

但是这在顽固派反动派仍未能满足。全民抗战因刊在停

刊以前每期数万份，实在可观，不可能跟随每个读者作违法的

调查，生活书店所出版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可说每

学一门而论，特地要求，都不可能跟随每一位学者研究者印行

以無理的干涉，于是頑固派及務派又另想方法，用更
我們的手段，決定封店捕人，先將生活書店的各處分店盡行鏟
除淨盡，企圖由此完全消滅這一部分他們所認為丁某擔負的
自己出書的出版的進步文化事業。
書店的出版部的毒計既定之後，一九三九年四月先從西安
生活書店分店「開刀」，不但將店封閉，經理及職員逮捕，而且將
所有生財用具搬得一空，形同搶劫。後來看見精神安置在他們
新聞的論調中國文化界精神分裂中高唱可得而不可言，自居
強盜劫掠之君子自居小偷，則未免聲明，不得不知。自一九三
九年四月起到年底，不到幾個月，由西安而天水、而南鄭而宜昌、

而萬縣、而沅陵、而吉安、而臨川、而南城、而贛州、而金華、而麗水、而建陽、而福州、而南平、而曲江、而梅縣、而蘭州、而衡陽、而貴陽、而桂林，而成都，而昆明等，五十餘處的生活書店分支和書店人說負經理責任的骨幹部被無辜逮捕的達四十餘人之多，遭受同樣的幾乎是全年的出版物書籍，我們四五百工作同志和無數進步作家及忠心讀者所培植的進步文化基礎，由於頑固派反動派的嫉視，嚇得各地書店都[redacted]受到嚴重的（原來應該保障人民的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的）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遭到摧殘，任意蹂躪，這不僅是一個進步文化機關的不幸，也是中國政治史上文化史上最污穢的一頁。[redacted]生活書店是由內部工作同志公推一人出版經理部註冊的商業機關，而內部的組織上之實際上是

採用合作社的原則，內部的管理是採用民主集中的原則。全體工作同志是受着他們自己所選舉出來的理事會的集體的領導，我是全體工作同志所選舉出來的理事會主席，我對于這部分進步文化事業的[redacted]總的責任是應該忠誠担負起來的，所以我現在儘管在流離顛沛、病傷危殆，九死一生之中，我必須一息尚存，必須秉筆直書，將頑固派反動派進行摧殘進步文化的殘酷和卑鄙的手段呈訴于海內外公正同胞之前，並把他們的罪狀宣告于天下後世！我並希望國民黨中能够比較清楚對于中山先生遺教真正忠實的人，去趕快及時採用進步的政策，不要縱任頑固派反動派橫行無忌，喪失國民黨所應有的光明前途。

* * * *

當我們接到西安分店被封經理被捕的消息的時候，我們還以為這也許只是偶然發生的地方事件，並沒有想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已有人決定一個封書的毒辣計劃。我便往國民黨中央黨部去訪問宣傳部長葉楚傖先生，承他出來時談，副部長潘公展先生也參加談話。我說西安的事情既為該處黨部所發動，中央黨部應有所知，究竟為着什麼原因而有這樣嚴重的處分，他們推說不知道，需等他們去電詢問。這樣，我們只得等待他們去電問明了再商辦法。當時潘先生卻接下去談到關于生活書店的整個問題。他說生活書店

事業發達，但總有一部分不肯公開，所以黨對它不放心。我們他有什麼部分不肯公開，他說不出。他既不知道有什麼部分不肯公開，何以武斷說「總有一部分不肯公開」，可見他的話毫無事實根據。我告訴他說：生活書店老早明白，沒有任何部分不可以公開，沒有任何部分不肯公開的。生活書店的人可以公開，經濟可以公開，你有任何疑問儘管提出，而我總可以充分的答復。生活書店的出版物都是公開的，沒有秘密的，而且依照政府的法令，經過審查機關的審查，沒有什麼不公開之可言，就是把政府法令，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可免送審查，但我們的倉庫也是可以公開的，審查會或黨部只要察看，也可以隨時

澀人往各處庫房看。這樣說來，生活書店還有什麼一部分不為公開。

聽了我這一番說明之後，陳潘兩位先生都沒有話說了。幾天，我再去聽回信，知道西安黨部已回電，羅列四個罪狀：(一)售賣禁書；(二)為某方作通訊機關；(三)店內同人有小組織，跡近政治訓練性質；(四)店內出版物誹謗陝西黨部。其實這四個罪狀一個都不能成立。請先談禁書。

國民黨領導下的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原來要各書業將所有已出版的書籍送審查通過後才准出賣，這種辦法無異將使各書業立刻都關門大吉，引起全體書業的抗議，才酌予變通，

規定凡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書，可無須審查，在此時以後出版的書，須將稿件送審查。全體書業都如此做，生活書店是照也沒有例外。依此規定，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的書，都是將書稿送審查，得到審查通過證後，才付排印，生活書店也同樣如理，原無禁書的問題發生。即是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書，如果審查會根據政府所公布的審查標準，發現有須禁止發行的理由，將該書之名及出版者，通知書業同業公會，由書業同業公會通知各同業，以便遵守。事務須檢查的時候，亦應由統一的審查機關根據審查會的統一的標準及審查的結果，加以檢查，也可以免去許多不必要的糾紛。但事實卻不是如此。同

属于同一国民政府和同一国民党领导下的各地图书杂志审查会，中央审查会通过的，各地方审查会可以加以否认，即可认为不能通过而视为禁书；地方审查会通过的中央审查会也可加以否认，即可加认为不能通过而视为禁书；各地方审查会彼此之间也可随意否认，随意即指为禁书；例如岂明通过的，桂林通不过；桂林通过的，中央通不过；中央通过的，桂林也不能通不过。生活书店在桂林有本书叫《新生代》，在桂林审查会通过后，印了五千册，费了许多工夫运到重庆，却被中央审查会否认，作为禁书全部没收。你们的同业想根据中央所公布的审查标准保证事先通过的书，为什么老是遭到否认，使书业于遵照法令送审之后还

要查也這樣處理也可接受，所以無端以查但是如此隨意說是禁書就算是禁書，置之不理。至于檢查書籍的機關更是五花八門，各自為政，有新聞書審查會，有公安局，有憲兵團，有政戰部、駐紮的部隊，有警察部，各機關各有的「標準」，于是可以隨意指任何書籍為禁書。試舉一個尤其突出的例子，生活書店出有一本蔣委員長著的《抗戰到底》，是根據蔣委員長許多領導抗戰的演講詞，而且都是公開在各報上陸續發表過的，不但經過內政部審查通過准許註冊的，而且還經過中央宣傳部審查通過，但是那時有幾個公安局都隨意指為禁書，搜索而去！我向有關機關交涉，都不得要領，置之不理。所以我把這本書，也是根據三

民主義等、原則，但是審查會也隨意予以扣押查禁，其他檢查機關也可以任意以「禁書」名義，這都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這本「抗戰史底」卻經過兩重的審查通過（由內政部審查會），但也完全失去法律保障，我們多方探詢之後，才知道因為該書附錄有載有中共當局的發表之若干宣言，這宣言是在參政上公開登載過的（報上文件也經過新聞檢查），原來這個反動份子也參有其程度不負責[illegible]，中共文件未公布過「這個反動標準[illegible]例」，所以就是經審查通過的書報，只要這個反動份子的特殊青睞，便隨時隨地可以失去法律的保障！

以上還是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以後出版的書報而言，至于

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書報，依然應是可以無須送審的，那稽查機關更可以隨意指為禁書。經過依法送審的書報，得到審查通過證，仍然不一定能夠得到依法的保障，豈是法令無須送審的書報（指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那不能得到依法的保障，稽查機關可以隨時沒收任意扣留，更不待言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西安黨部以儲藏禁止的書為罪狀而封店捕人，我們認為是莫須有的罪狀。我們請中央宣傳部轉令西安黨部指明所謂禁止的書是什麼書，應即查明列舉書報，結果是如石沈大海，並無下文，所以我們斷定這一點是誣陷無疑。而且即退一步說，果真儲藏了禁止的書，出版發行商有明了的內容，先須禁售，禁

告無效，才加以罪證，無不虛構誣害他人，甚至捏造一些，現在西安事變的中國文化的精神的新的權威，被揭發，就是以前陳安先生去作所有的文物，這又是把什麼東西，那一本法律的呢？

（三）我們看了去做物理實驗的同人看的，就是以前提過的張務通訊，我們回查歷期張訊，才知道所謂「誹謗」陳西瀅者，僅是該訊中簡單提及有些書信經過中央黨委會通過而陳西瀅部都隨意指為禁書為不當，指示該地同事應本此意向陳西瀅有個意見說明我的態度而已。我們這種會後會談的主要精神上，對于本處同事的指示，何以能構成所謂「誹謗陳西瀅」的罪狀

這種思想之為莫須有，是有常識的人都能加以正確的判斷。因為中央政府既為整個抗戰中國的中央政府，而不是僅在重慶一個地方的政府，它所公布的憲兵標準條例，其內容是否適合是另一問題，既經公布，就有法令，也可同樣適用于陝西，雖然是一種常識；一個行政機關的經費對于另一同事指出這種理由，作為該地的有關當局說明和提出意見，便得給以困難，雖然也是一種常識。

至于講到為某方作通訊機關，據中宣部負責人的解釋，所謂某方者，是指西安而在陝西的延安而言。延安在西安有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即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在戰時首都重慶也有這[illegible]

事處的,可以處理關于通訊的事務,根本就用不着別的機構越俎代庖。

不過談到此事,我要順便說明:為讀者服務,是生活書店最寶貴的幾種傳統精神之一,是生活書店所以在十六七年中從由很小規模的(周刊社最初由鄒先生外,正式職員只有兩個半人?)突飛猛進,發展到分店布滿全國各重要地點,達五十餘處,全體同事達四五百人之多,最主要的基本原因之一,簡單的說,為「服務精神」,我們把它視為生活書店最可寶貴的八種傳統精神之一。(一曰堅定,二曰虛心,三曰公正,四曰負責,五曰刻苦,六曰耐勞,七曰服務精神,八曰同志愛——指工作同志——以後

当陆续说明，以介绍于国人。

现在先谈服务精神。生活周刊常说它自视是读者的一个好朋友，这不是一句空话，而须在实践上勇为读者解决种种困难，凡是自己力量所能勉力做到的事情，必须尽忠竭诚为读者办到。生活的发展也是在这上面，乃至精神食粮上物质供应上作全国的且同时也作全世界最重要地之一。生活最初就凭藉着这种信仰而得到无数的读者服务。因此我们在报栈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每以的读者信札往还亲自每天必须抽出一部分时间来回答无数读者来的数百封的来信，有的接受这个问题来商量，有的接受那个问题要调查，有的托买

這件東西，有的挑選那件東西，形形式式，樣五花八門，就我們
對每一封信都用赤誠來處理，只須在事上能做得更周到更
滿意一點，就要做到那樣的地步而後肯休，而後肯甘心。這種服
務精神、流動到我們每一個人手的全身。在我們這個機關裏，這種
「服務精神」就是業務的靈魂或靈氣，而身體力行于不自知。我們
往往忙得夜以繼日，汗流浹背，而某一讀者來的一件事，手軟腳
酸，竭盡力量，不但不以為苦，且以能為讀者有所盡力，在道義上
做到「好朋友」，視為至樂。有時很瑣屑的事情，例如[illegible]
有讀者來信囑托我們配購幾尺什麼顏色的什麼布，有因事而
在事務上做些同事奔走竟日，達到目的始已，因其精神氣的熱烈

係蔣老師發現了新大陸似的，和我談起來，簡直手舞足蹈的，
布拉子家去了，來信說顏色淡了一些，或深了一些，于是趁馬路
北京使用之前重新做起，做到既不淡了一些，又不深了一些為
能使讀者心滿意足為止，有時因此餓了一頓，或兩頓，更眼酸
了一夜，在他又覺得是毫無意義的浪費時間，若無其事。
所以我曾說一句笑話，說在我們這個機關，不管編者，
到老大哥，每個人的心的這一顆心，都是滾熱，在我們這裏面找不
出一個半個冷血動物。
由于這種疲而不倦、苦而不厭的傻子似的「服務精神」，
生活最可寶貴的傳統精神之一，生活的讀者也就把它視為最

可愛的最親愛的「好朋友」。



书号 11002·501
定价 1.30 元